

中国共产党广宗县历史

第一卷

中国共产党广宗县历史编纂委员会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广宗县历史

第一卷

中国共产党广宗县历史编纂委员会 编

主编 吕宗庄

主笔 谷华池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共产党广宗县历史/中国共产党广宗县历史编纂委员会编.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1. 11
ISBN 978 -7 - 202 - 06036 -0

I .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广宗县—1927~1949 IV. ①D235.2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232265号

书 名	中国共产党广宗县历史
编 者	中国共产党广宗县历史编纂委员会

责任编辑	王 颖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邯郸市利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51 000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 - 2 000
书 号	ISBN 978 -7 - 202 - 06036 -0/ K · 1025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共广宗县历史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	刘立生	李振军		
主任	张志英			
副主任	李群锁	陈国平	赵凤山	刘丽香
委员	毕铭恕	李太骞	吕宗庄	姜朝广
	王忠献	陈振中	韩文格	王俊杰
	王贵宾	刘廷良	谷华池	王荣超
	史荣欣	陈汀淳	任胜迪	
办公室主任	吕宗庄			
副主任	谷华池			

编辑部

主 编 吕宗庄

主 笔 谷华池

副主编 吕春楼

编 辑 谷华池 吕春楼 高永丽 张国清

插 图 施胜辰

摄 影 侯玉钦 吕宗庄

编 审

顾 问 肖 英(正部级离休干部)

主 审 何立海

副主审 王银翠 南振国 魏善增 史书栋

序 言



刘立生书记



李振军县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广宗县第一部党史专著——《中国共产党广宗县历史(第一卷)》就要正式出版了,这是全县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献给党 90 华诞的一份珍贵礼物。在此,谨向为该书的编纂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和诚挚的谢意!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中国共产党广宗县历史(第一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客观、全面、系统地记述了 1927 年到 1949 年期间,广宗地方党组织创立、发展、壮大和领

导当地革命斗争的艰难历程,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广宗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曲折过程,详细具体地再现了广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甘屈辱、不畏强暴、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非凡岁月,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和县情县史教育的好教材。

修史是为了存真。广宗县是革命老区,是冀南党组织创建最早的县之一,有着光荣的革命史,自1923年广宗产生了第一名共产党员,1927年9月成立中共广宗县委以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宗人民就找到了航途中的灯塔,广宗人民的解放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者,有了胜利的希望和根本保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宗共产党人在中共广宗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农民武装,使广宗县迅速成为冀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并在此诞生了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东征。抗日战争时期,广宗县是八路军115师和129师抗击日寇的主战场,广宗是冀南抗战首府所在地,冀南区委、冀南行署、冀南军区、冀南抗战学院、冀南兵工厂、冀南银行等多所机关、院校都曾设在广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承、徐向前、陈赓、宋任穷、陈再道、许世友、杨秀峰、王新亭都曾

在这里战斗过、生活过。广宗人民在中共广宗县委的领导下,在广宗大地上与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素有“西有太行,东有杜杨”的美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宗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不惜一切代价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先后派出三批干部南下,北上,支援新解放区的建设,参加支前的民兵达 350 余人次,有 4900 名民兵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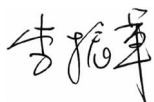
“述往事,思来者。”只有认真学习历史,深入思考历史,科学分析历史,才能了解社会的进退得失之道、政治的兴衰治乱之道、个人品德的优劣美丑之道。回顾党的历史,重温广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奋斗历程,就是希望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紧密团结在县委周围,围绕“富民强县、跨越升位”的奋斗目标和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望,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境界,开拓创新,大力弘扬“开明开放、诚实守信、创业创新、自立自强”的广宗精神,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断增强发展广宗、建设广宗的信心、决心和动力,再谱广宗又好又快发展的新篇章。同时,也希望

党史部门和党史工作者继续加强对广宗革命史、斗争史的研究,拿出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用党的伟大事业团结人,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成功经验教育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用英雄人物的事迹鼓舞人,进一步发挥党史在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广宗县委书记



广宗县人民政府县长



编 纂 说 明

一、指导思想:本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坚持实事求是、存真求实的原则,记述中国共产党广宗县历史,达到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之目的。

二、时限和区限:本书记述上限自1927年9月中共广宗县委成立,下限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22年的革命史。记述地域范围以现行广宗行政区划为界,对历史上属于广宗辖区的历史事件简要记述。

三、体例内容:本书采取以时间顺序为经线,以历史事件为纬线分期编纂的通史写法,内容共设十章,附录附以大事记、组织史、重要文献、重要资料等内容。

四、行文规范:本书采用记述体手法记述史实,兼有评论,做到述而有论,述论得体。文中不溢美,不恶议。

五、年代地名:本书一律采用公元纪年,对旧历时间均换算为公历时间;所记载之外地地名,以当时地名加注现代区划隶属;所记载本县地名,均为现行地名。

六、资料来源:本书所采用史料,分别来自国家正式出版的有关革命史、党史和组织史,革命领导干部和当事人的访问调查笔录或回忆录,以及市县档案馆馆藏档案。

目 录

第一章 广宗县地方党组织创立前的社会状况	1
第一节 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	1
第二节 20 世纪初的直南社会	3
第三节 20 世纪初的社会经济	7
第四节 20 世纪初的学校教育	12
第二章 广宗县党组织的创建及其早期斗争	16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广宗的传播	16
第二节 广宗党组织的创建及发展	18
第三节 党领导的初期革命斗争	20
一、唤起民众,扫除封建余孽	20
二、驱逐奉军县长	20
三、东贺固收枪斗争	21
第四节 县域中北部的建党活动和县委的恢复 ...	22
第三章 开展抗日反蒋游击战争	25
第一节 发动和领导学生运动	25
第二节 冀南农民游击战争在广宗的发展	27
第三节 配合省委中心工作,创建抗日讨蒋 救国军	33
第四节 残酷的镇压,不屈的斗争	34

第四章 广宗党组织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	
斗争中恢复发展	37
第一节 抗战爆发后的局势	37
第二节 恢复壮大党组织,积极发展抗日武装	39
第三节 配合八路军开辟抗日根据地	42
第四节 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基层组织	45
第五节 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	46
第五章 根据地建设全面展开	51
第一节 在日军大“扫荡”中,巩固和发展抗日	
根据地	51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53
第三节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56
第四节 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活动	59
第六章 坚持抗战,根据地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61
第一节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形势与任务	61
一、日军加紧对占领区“治安肃正”	61
二、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65
三、共产党巩固与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67
第二节 开辟隐蔽战线,建立地下情报网和	
交通网	69
第三节 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对“摩擦”	71
第四节 开展反投降斗争,粉碎汪派分子	
武装叛乱	74
第五节 邢济路以南党组织的恢复与广曲县的	

建立	75
第六节 配合百团大战,开展“破路”运动	77
第七章 战胜严重困难,坚守抗战阵地	81
第一节 敌后抗战进入困难时期的形势和党的 斗争方略	81
一、侵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	81
二、赵一叛变后广宗县的抗日形势	84
三、严重自然灾害,根据地雪上加霜	86
四、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政策	87
第二节 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意志	89
第三节 武工队深入敌后净化抗日环境	92
第四节 以武装为核心,开展对敌斗争	93
第五节 党政军民同甘共苦,战胜严重灾荒	96
一、坚守抗战阵地,与人民生死与共	96
二、领导人民群众战胜灾荒	98
第六节 输送抗日干部,保护抗日首脑	100
第八章 开展攻势作战,夺取抗战胜利	105
第一节 大反攻前的国际国内形势	105
第二节 开展大生产运动,壮大抗日力量	106
第三节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减租减息	108
第四节 开展政治和军事整训运动	111
第五节 日伪军的垂死挣扎	113
第六节 展开全面反攻,迎来抗战胜利	115
第七节 接管县城城防,追歼逃亡之敌	118

第九章 保卫胜利果实,开展和平建设	122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122
第二节 调整行政区划,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124
第三节 争取民主和平 选举国大代表	127
第四节 开展反奸清算运动	128
第五节 大力发展解放区的经济	130
第六节 大力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	134
第十章 开展整党与土改,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136
第一节 党组织的公开与整顿	136
第二节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37
第三节 壮大民兵队伍,开赴境外作战	139
第四节 开展献金支前参军活动,支援解放战争	141
第五节 抽调干部南下,开辟和接管新区	145
第六节 组织人民群众迎送四野过境南下	146
第七节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迎接新中国成立	148
附 录	
附录一 大事记	155
附录二 组织史	175
附录三 广曲县史料	223
附录四 重要文献	242
附录五 南下干部名表	268

第一章

广宗县地方党组织创立前的社会状况

第一节 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

广宗,地处河北省东南部黑龙港流域,境内黄河故道迤邐南北,向以沙丘著称。地跨东经 $115^{\circ}06'$ 至 $115^{\circ}17'$ 、北纬 $36^{\circ}51'$ 至 $37^{\circ}18'$ 。北依南宫,南承邱县,东与威县毗邻,西与平乡交界,西北与巨鹿接壤。20世纪20年代,县域面积475平方公里,辖222个村镇、21000余户、101000余人,其中,城内500余户、2800余人。县内较大的集镇有李怀集、葫芦集、板台集、件只集、核桃园集、西召集、红龙集、小柏社集、魏村集、张魏集、三杏村集、杜家庄集、盐场集、公村集等。地理位置较为重要的村庄有东贺固、北杨庄、东董里、大辛庄、李磨、大平台、高家庄等。

县域属暖温带大陆性半干旱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热同季。年平均降水量485.7毫米,年平均气温 13.3 摄氏度,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366.4小时,年平均无霜期224天,年平均太阳辐射总量 121.3 千卡/平方

厘米。土壤以潮土为主,占土地总面积的79%,适于农作物生长。成土母质为古黄河、古漳河冲积物。域内有老漳河、西沙河两条天然河流。

县域内生长有野生植物160余种、野生动物130余种。长五谷、旺六畜、产水果,向以“花封”(花果之邦)著称。早在虞舜时期,所缴贡赋即“上上,错”(《禹贡》)。春秋战国时期,以盛产千里马而闻名诸侯。隋唐时期,张果老菜园所产蔬菜远销邢州、太原。明代,沙丘紫枣、沙丘鸭梨均为贡品。清代至民国,民间所织土布远销山西、张家口和京津地区。

广宗,历史悠久,有3500年的城市文明史和2200多年的建县史,曾两度建都,三次封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域内平台、柏社一带就有人类渔猎稼穡、繁衍生息。夏禹之前为子契封地,殷商时期名“庇”,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建都于此,商末至秦称“沙丘”。作为正式行政区域始于汉高祖所置的平台县,作为地名始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四月平帝为“广汉家宗庙”而置的广宗国,作为县名始于东汉建初八年(83年)分巨鹿郡地所置的广宗县。北魏升格为广宗郡,隋为宗城县,唐置宗州,元宪宗五年(1255年)复置广宗县。明清时期,广宗县隶属于直隶省顺德府。1913年,广宗县隶属于直隶省大名道,至1927年9月未变。

第二节 20 世纪初的直南社会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直隶(今河北)水旱灾荒频发,其灾荒年数之多位居全国之首。其中,中部地区多水灾,西南地区多旱灾。中部地区的保定、河间、顺天、天津四府地处永定河、南运河、滹沱河等流域,地势低洼,往往泛滥成灾;而西南地区的大名、广平、顺德三府除黄河经过的大名府三州县外,多处于河流的上游地区,多高地,加上直隶干旱少雨之气候,易形成旱灾。

据李文海主编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记载:1899 年入秋以来,顺直一带天时亢旱,田禾枯萎,大地龟裂,“被灾之区甚广”,总计全省有 36 州县遭受旱灾,“穷黎困苦,户鲜盖藏”。1900 年直隶旱情愈益严重,南部地区春夏秋三季亢旱。据李鸿章奏报:献县、曲周、高阳、沙河、平乡、广宗、永年、肥乡、磁州、元成、大名、隆平、宁晋、饶阳等 15 州县各有数十乃至数百村庄“成灾五六七分,及歉收三四分不等,民情困苦异常”;安州、青县、沧州、南皮、邢台、南和、巨鹿、任县、邯郸、成安、鸡泽、威县、新河、深州等 15 州县也大面积受灾,“歉收三四分不等”。大名、顺德、广平三府属,自春入夏,雨泽延期,“二麦收成减色”。持续差不多两年的亢旱之后,直隶大部分地区的灾

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出现了“畿辅荒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直到1901年春夏间,灾旱依然威胁着直隶许多地区,“贫民无计谋生,岌岌不可终归”,尤以“大名、顺德、广平三府灾情最重”。

在直南旱灾肆虐的同时,1901年直隶其他地区又遭水患,受水灾县达103个之多,为晚清以来仅次于1883年的第二个大灾年。这样,在水旱灾害双重夹击之下,直隶民生愈加困顿,民众生存条件急剧恶化。灾荒下的农民或居无定所,或无处觅食,或坐困绝境,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他们经常“以野菜为食,甚至连野菜都找不着而成群饿死”。

频繁严重的灾荒,产生了大量的难民、饥民。灾荒不仅直接伤害了人的生命,破坏了农业生产,而且给灾民的精神和心理上带来了沉重的创伤和压力,人心惶惶,从而孕育着社会诸多的不安定因素。灾荒的发生使人的心理世界失去了平衡,导致了心理的异常,失去了正常的生活信念和行为规范,从而在他们为饥饿所迫濒临绝境之时,就可能会越轨犯禁,或为盗为匪,或揭竿而起,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时人曾不无忧虑地指出:“民有依则安,民无依则变,其势然,其理然”,“民饥变乱,势甚容易”。可以说,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于今直隶多饥民,纷纷学习逐成群。”义和团运动及随之而来

的“扫清灭洋”斗争就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在直隶社会灾荒频发的同时,中外民族矛盾也因直鲁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而走向激化。义和团运动失利后,八国联军以征服者自居,给清统治者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命令官兵对义和团“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当八国联军四处扩大侵略时,驻扎在直隶境内的清军大多按李鸿章的命令,一面大肆屠杀义和团,一面步步后撤,将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敌人。这样,直隶乡民对统治者的失望达到极点,阶级矛盾急剧上升。

另外,外国传教士也神气十足地重返教堂,恃强专横,讹诈乡里。一些教民还依恃洋人,大张旗号,声言奉命报复,以搜捕“团匪”为名,到处借端讹诈,“甚有带人挨家搜掳,到处扬眉吐气,比洋人尤为可畏也”。无数善良的群众被诬为“团匪”遭到报复,“轻则勒榨巨款,重则捆送洋营,性命莫保。良民隐忍,无可如何”。教民每每控告良民,仅直隶清苑一县被教民控告者不下数百名,“其中确有凭证者百无一二,其他州县可知”。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直隶乡民敢怒不敢言,但无疑直隶社会必将蕴藏着无限危机。与此同时,清廷还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不仅将四亿五千万两的巨额赔款转嫁到人民头上,而且还有赔偿教堂、教士的“地方赔款”。直隶是义和团运动开展最广泛的省份,也是负担各

种赔款较多的地区。经办赔款的贪官污吏趁机搜刮民脂民膏,人民所负担的实际赔款数额大大超过了议定的数目,此种情形直南三府尤为突出,广宗人民除负担清政府所摊派的条约赔款数额外,还需负担京钱两万吊的“教案赔款”,广宗人民万难支付。正如时人所说:“既无事之秋,已难筹集巨款,况浩劫奇灾惊魂甫定,更何从出此巨万金银。”而办事官员“积亩勒派,按户严追”,加以“教民要挟强求,良懦田庐多难自保”,迨及“民穷财尽,老弱待毙,壮者逃亡”,难保“不铤而走险”。再加上直隶南部的广宗、威县等县富有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荣传统,所以尽管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但该区人民的反抗精神并未泯灭。一旦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便会迅速走上反抗道路。由此,景廷宾领导的“扫清灭洋”斗争便应运而生。

“扫清灭洋”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使得帝国主义侵略分子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瓦德西在给德皇威廉二世的奏报中说:“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赫德也说:“五十年以后,就将有千百万团民排成密集队形,穿戴全副盔甲,听候中国政府的号召,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扫清灭洋”斗争同样震撼了腐朽的清王朝。清政府满以为出卖了义和团,就可以换得帝国主义的保护,就可

以照旧统治下去。殊不知他们联合帝国主义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彻底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只能激起人民的更大反抗。景廷宾再次发动反抗中外反动势力的革命斗争,使清政府深感“其患不可胜言”。封建统治阶级不仅怀着义和团的风雷又将出现的余悸,而且感到比太平天国更为激烈的革命风暴正在威胁着他们,因而“日夜忧惶不能已于烦渎者也”。四川总督岑春煊给清皇的奏折惊呼:“一有首倡发难之人,遂成燎原之势。”

第三节 20 世纪初的社会经济

辛亥革命前,广宗县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统治之下,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清廷的腐败,人民群众负担的赋税愈来愈重。1903 和 1905 年,清政府两次修改《集物税章》,课征对象和税率大幅提高。消费税种有厘金、土药税、渔税、酒税、盐税;收益税种有注册税(含契税)、营业税(含牙税、当税)、田赋;人头税种有差徭、丁赋等。1901~1911 年,广宗县每年征收田赋和各项杂税银均在万两以上,除上解之外,或被地方政府挥霍,或被贪官污吏据为己有。

1911 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

级共和国,但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袁世凯所攫夺,政权性质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此后,经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重大政局变化,广宗县一直为北洋政府委任的官员所统治,县内政局动荡。1912~1928年的17年间,广宗县知事15次易人,其中,1926~1927年更迭了6次,1928年更迭了2次。这些过客执行北洋政府的政令,大力扩充地方武装,依靠土豪劣绅、地痞恶霸控制地方警务和乡村政权,对民众巧取豪夺,以中饱私囊,并为其军阀主子效劳。处在最底层的广大民众,遭受着多重的政治压迫和日益加剧的经济剥削,在贫穷落后和动荡混乱的深渊中挣扎。



北洋政府时期广宗县知事印印模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和支配下,皖、直、奉三派军阀为巩固和扩大所占地盘,并争取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穷兵黩武,频繁开战,广宗县虽然不是主战场,但过境军队络绎不绝,他们拉夫派兵,催粮要草,县公署被迫设立后方兵站,向过境军队供应车辆、粮秣等,年需经费28万元,均由全县地亩摊派。1925年,直隶省长褚玉璞以军费无出为名,加派“讨

赤”捐,令各县每地丁银 1 两附收“讨赤”捐 2 元 3 角,解省备用。自是年开始,直隶省连续 6 次发行善后长期公债,按各县地丁数目摊派,每地丁银 1 两摊公债银 2 元 3 角,其用途尽充战费,虽有按期付息、分年偿还之议,但褚玉璞败走后,无人负责。1925 年 4 月 25 日,张宪率部由大名向北撤退,驻扎城内及李怀、件只等数十村,沿途抢掠一空。11 月,国民第三军大名镇守使梁寿恺遣营长梁某多次到广宗县公署催要粮秣,由县公署派大车 100 辆送往大名。是月,国民第二军骑兵连过境,在县城驻扎 20 多天,一日三餐由县公署招待。1927 和 1928 年,北洋政府又加征“军事善后特捐”,按每亩地丁银 1 两附收 2 元 3 角解省备用。1927 年,张宗昌、褚玉璞还为“抚恤”阵亡兵士,向各县摊派“抚恤金”,按每亩地丁银 1 两附收 1 角解省。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连年不断,造成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其结果是:一方面穷苦百姓走投无路,被逼成“匪”;一方面一些社会渣滓乘机“发迹”,公开为匪。时广宗森林茂密,易于隐藏,为土匪四处窜扰创造了便利条件。于是,在民国初年,广宗境内票匪丛生,多如牛毛。1920 年,广宗大旱,土匪骤起,一股土匪盘踞东、西石井疃村,焚掠前后旧店,绑票人质,勒索巨额赎金,造成乡民流离失所。是年 11 月 6 日,百余名土匪持枪闯入金塔寨,

烧毁民房 80 余间,杀死村民 8 人,掳人票 40 余口。次年又在谷常相抢走乡绅谷天祥家骡马 4 匹和大车 1 辆。9 月,匪首崔福彦盘踞漳逮一带,县警备队第二队队长程云灿率队进剿,被土匪打败,伤亡 9 人。1922 年 5 月,匪首崔福彦网罗百余土匪盘踞新立村教堂。同月,陆军第一补充团团副田勋及营长李典荣、王昆生率部击溃盘踞谷常相、王常相之土匪。次年 6 月,匪首胡老起纠集千余名土匪,自威县窜入伏城、盐场、牛里庄、洗马等村,掳去人质几十人和大批车辆、牲畜、财物等。1926 年 9 月,匪首陈刚纠集千余名土匪在西贺固吃喝 7 天。此后广宗境内土匪愈演愈烈,胆大妄为,甚至堂而皇之地坐进县衙。

为了防盗匪、卫身家,一种联村自卫、守望相助的民众武装——大刀会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全县大部分村庄。县域南部的大刀会以张老卜(白家寨人)为首领,县域北部的大刀会以张景斋(清村人,外号张大牙)为首领。大刀会成立后,在维护地方治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军阀政府的统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全县仅有两座近代化意义上的工厂,一座是位于城内的织布厂,由长芦盐运使公署开办,有工人 40 余名;另一座是位于南辛庄孤儿院内的织布织袜厂,由本村人张修治创办,有工人 30 余名。

全县有自耕农 16000 余户,占有耕地 41 万亩;半自耕农 3200 余户,占有耕地 6000 余亩;佃户 200 余户,租种耕地 8400 余亩。小麦亩产 8 斗左右,每斗约值 7 角,另外麦秸、麦糠约值 1 元,每亩产值不足 7 元;高粱亩产七八斗,其他附种黑、黄豆,可收二三斗;谷子亩产四五斗;黍、玉米、苡麦等亩产七八斗不等;唯红薯亩产达千斤,产值也只有七八元;花生亩产 300 斤左右,产值约 10 元;棉花亩产百余斤,每斤值 1 角左右,产值 10 元上下。农民生活十分困苦,衣服全用粗布;食以高粱、小米、豆类为主;住房多为土坯房;行路多徒步。农民生活费每人每年约 20 元,每月不足 2 元;雇工由主人管饭工资以年计者 10 元至 40 元不等,以日计者又分管饭和不管饭两种,管饭者日工资 1 角,不管饭者日工资 2 角。匠人收入微薄,一个棚糊房屋的纸工日工资 5 角;一个木匠的日工资只有 3 角。手工业十分落后,城北仅有数十村织棉带,城西只有马井村编苇席,城东只有大辛庄编柳条器具。商业更是萧条,全县年消费(获鹿产)铁器 2 万元、(高阳产)布匹 1 千元、煤油 4 万元、机织布(俗称洋布)2 万元、卷烟 1 万元。年外销花生 5 万元、水果 1 万元、柳编 1 千元。年财政收入只有 4 万元,其中国库拨补 4000 元。佃户租种地主耕地,由地主负责种地资本,佃户出劳力,收获按比例分成。县内地主向农民放高利贷利息分 4、5、6 分不等,

甚至还有“借一还二，借二还三”的，如不能按期偿还，则实行“驴打滚”计息。借粮一般是春借1斗秋还1斗3升，借贷时还需有保人，或以房屋、土地作抵押。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军阀混战、土匪骚扰，人民群众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时大名道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大名数十县，连年遭干旱。
秦晋直鲁奉，先后来侵占。
民间无米吃，官家偏要面。
民间无柴烧，官家偏要炭。
寅年支了卯年粮，辰粮又要支一半。

.....

这首歌谣真实地记录了北洋军阀各派系轮番践踏和操纵官府，横征暴敛，欺压人民的历史事实。

第四节 20 世纪初的学校教育

1903 年底，清政府颁布《学务纲要》，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目标、年限、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相互衔接关系，明确了“无论何等学堂，均以中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一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备实用”

的教育宗旨,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而又完备的新式教育制度,他突出体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从此,西方的先进思想开始逐步渗透到学校,并为学子们所接受。以此为标志,中国的近代教育走向全新的发展阶段。

1904年,广宗县将位于城内东街的凤台书院改建为(县立)高等小学堂,延续138年的书院教育宣告结束,学校教育正式拉开序幕。不久,广宗县在城内创办(县立)初等小学堂1所,在乡村创办初级小学校4所。此间,广宗县还先后选派教育家张鹤鸣、杜之堂等赴日本考察学务,他们回县后都为广宗县学校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06年,县高等小学堂将位于城内北街的宏泰布店收购,并改建为分校,县高等小学堂因之增加了1个班的招生规模。到1909年,县高等小学堂在校生达到了3个班。同时,初级小学教育也有了较大发展。1909年,全县公立初等小学堂(校)达到50余所。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设立办学奖,调动了地方官绅办学的积极性,学校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12年9月,广宗县借用城内北街杜姓民宅创办女子初级小学,首次招生即招到20名女生。不久,广宗县又在儒学旧址创办模范小学。1913年,广宗县分别在董里集、件只、西召和西贺固创办4所高级小学,至此,县内公立高等小学堂

(校)达到5所。到1916年,区立初等小学校发展到130所,在校生3000余人,县知事耿薛标、劝学所长李舒园因之被民国政府授予“嘉禾章”,劝学员牛可久、卫守中、谷天祥等均获得金质奖章。为了壮大师资力量,广宗县还于1916年创办师范讲习所1所,招收1个班的师范生,次年毕业后全部充任教师。

20世纪20年代,由于北洋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学校教育进入缓慢发展阶段。1920年春季,县财政停发了县立高等小学堂的经费和教师工资,全校师生咬紧牙关,硬是坚持了下来。1922年,县高等小学堂改称县立高等小学。1924年,李磨村创办高级小学。是年,县模范小学与县高级小学合并为县立完小(时称县高级初级小学)。1925年,先是大名镇守使张宪设后方医院于县完小内,后又有国民第三军的两个连进驻校内,学校被迫放假半年之久。1927年,自卫团两次进驻校内,并将书籍、仪器、教具焚掠殆尽,学校被迫关闭一年之久。大部分乡村小学也因经济萧条,生源不足而勉强维持。

新式学校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扩大了受教育面,提高了县人的文化水平,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脱颖而出,自觉地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县高级小学毕业生张福堂、西贺固小学毕业生梁宝森、县模范小学毕业生张箕南等以

优异成绩分别考入省立保定育德中学、山西太谷铭贤中学和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并成为广宗籍早期的中共党员。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乔晓光、肖一舟、王含馥、王祝光、王振江、肖英、国鹰、姜化民等也受教于这一时期。

第二章

广宗县党组织的创建及其早期斗争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在广宗的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省在全省重要城镇陆续创办高、中等学校,同时在各县普遍开办高级小学、完全小学、简易师范学校等,这些新式学校在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大量传播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加快了西学东渐的步伐。新文化运动中,一些进步书刊传到广宗,新思想、新文化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广宗县的知识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广宗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一大批革命的知识分子迅速成为共产主义者。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指导地位,使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此后,在外地求学的一批广宗籍进步青年,陆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先后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为马克思主义在广宗县的传播和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马克思主义在广宗的传播过程中,东张魏人张福堂、西街人张箕南和东贺固人梁宝森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福堂(1904 ~ ?),学名荫亭,又名张仞光,化名王寒星,15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立高级小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带头响应,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在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于1922年下半年由王锡疆、安志诚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夏转为中共党员,历任保定育德中学团支部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保定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和书记、中共保定支部书记等。1924年暑假期间回到家乡,积极向青年学生介绍《向导》、《觉悟》、《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不遗余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并与其老师张箕南(又名王林,1901年生,1921年毕业于直隶第四师范学校,之后先后在本县高小、直隶四师附小任教。1927年4月,在邢台由王子青、刘玉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议发展青年团员,得到县立高级小学学生的响应,一批进步青年加入了团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力量和马克思主义在广宗的传播者。

梁宝森(1908 ~ 1982),又名梁雨辰、梁浴尘,曾化名老甄,1923年7月考入山西省太谷铭贤中学,1926年3

月由纪秀川、张维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为了领导和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当地党组织指示梁宝森和同学张庆云(曲周县人,中共党员)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梁宝森在广宗、威县、曲周交界地带广泛宣传“男女平等”、“平均地权”、“改造社会”等革命思想,积极向农民群众灌输反压迫、反剥削、寻求光明前途等革命道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深深地吸引着青年学生和贫苦农民,他们以怒涛排壑之势走到革命道路上来。

第二节 广宗党组织的创建及发展

1927年7月,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中国革命转入低潮,革命的处境十分艰难,为了使中国革命走向复兴并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于8月1日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走向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为了总结经验,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设立了北方局,不久,北方局改组了中共顺直省委。改组后的顺直省委立即派人到各地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

神,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9月,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王子青来到广宗,与梁宝森、张庆云接上组织关系,王子青考察了广宗县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以及党员关系的现状,认为建立地方党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遂指示梁宝森建立起中共广宗县委,并由梁宝森担任县委书记。

梁宝森利用说书唱戏等时机广泛宣传南方农民运动的开展情况,启发农民的觉悟,不久便发展雇农出身的李志明为中共党员,随后又发展梁凤岭、梁寒镜、梁化成和梁宝真为中共党员,并于是年冬建立起中共东贺固支部,由李志明负责。东贺固党支部成立后又陆续发展梁德庆、梁福禄、梁儒林等为中共党员。次年春,梁宝森又在曲周县槐桥村发展冀汇川(冀良俊)、陈河清、陈渭清3名党员,并建立起中共曲周县特别支部。梁宝森还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参加国民党县党部的活动,发展王亚平(威县人)、袁勃为中共党员。1929年秋,梁宝森在小柏社介绍闫择三、王緘三、逯春风、闫楚珍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底,大名七师学生、中共党员潘笑圃(威县人)持中共大名县委给中共广宗县委开具的介绍信找到梁宝森,经梁批准又建立起中共威县支部,至此,中共广宗县委上属于中共顺直省委,下辖东贺固、曲周和威县3个支部,主要活动范围包括广宗中南部、威县西部和曲周北部地区。1930年1月,因遭反动当局的通缉,梁宝森被

迫离县,中共广宗县委中断。

第三节 党领导的初期革命斗争

一、唤起民众,扫除封建余孽

中共广宗县委成立后,县委成员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思想,他们利用田间劳动、场院乘凉和走亲戚、赶庙会等机会,向人民群众讲述南方革命运动的形势,从而不断提高劳苦大众对黑暗社会和反动统治的认识,激发劳苦大众的革命热情。县委书记梁宝森还利用担任中国国民党广宗县党部组织干事兼宣传部长的公开身份,组织创办机关刊物《半月刊》。积极宣传劳工神圣、自由民主、劳工解放、禁赌禁娼、剪发放足、提高女权、扫除文盲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对中国国民党党员进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教育,迫使县政府下令剪除男子所留长辫,并设“天足会”(俗称放脚会),严令妇女放足,号召僧尼、道士还俗,尽一切之能势,唤醒民众,扫除封建残余,为开展革命斗争扫清障碍。

二、驱逐奉军县长

1927年,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中国共产党指示北方的党组织,团结民间进步武装,骚扰奉军后方,破坏奉军的补给线,策应革命军北伐。是年6月19日(农历五

月二十),中共党员梁宝森、张箕南组织广宗民众防匪武装——大刀会成员数千人,攻占广宗县城,驱逐奉系军阀委任的县长郭鸿逵,并收缴了县警备队的武装。梁宝森、张箕南以国民党名义,成立国民党县党部,还成立县财政清理委员会,拟清算地方捐税的收支情况。7月,郭鸿逵在奉军的支持下,再度回县视事。郭到任后,私自招兵买马,吸收兵痞、恶棍扩充警备队,伺机报复。9月,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王子青与中共广宗县委书记梁宝森召集“大刀会”首领开会,准备组织民众武装,再次驱逐奉军县长。经过充分发动和准备,11月18日,部分大刀会成员携带武器秘密潜入城内,午夜时分,另一部分隐蔽在白家寨、五里庄、李家庄等村庄的大刀会成员逼近县城南门。大刀会里应外合,迅速占领了县城,郭鸿逵携数万公款潜逃,作恶多端的警备队头目刁老贵被斩首,警备队解散,奉系军阀统治广宗的历史宣告结束。

三、东贺固收枪斗争

中共广宗县委成立后,即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县委领导深入农村,发动贫苦农民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在贫苦农民普遍觉悟的基础上,县委书记梁宝森组织成立了以中共党员为核心的东贺固农民协会,骨干成员很快发展到三四十人,县委决定以此为基础,向驻守东贺固的民团局发动进攻,经过充分准备,以

中共党员和农民协会骨干成员组成的收枪队，一举收缴了民团局的全部枪支，接着，收枪队又一鼓作气乘胜收缴了东贺固几家地主的枪支。农民协会有了自己的武器，与土豪劣绅斗争的情绪进一步高涨。1928年秋末冬初，武装起来的农民协会发动雇工开展了增资斗争并取得胜利，不久又夺取了村政权，选举中共党员梁寒镜为村长，使东贺固的村政权掌握在广大贫苦农民手中。党组织和东贺固农民协会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斗争，在直南地区的广宗、平乡、威县、邱县和曲周等地产生了巨大影响，为直南地区人民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起到了示范作用。

第四节 县域中北部的建党活动和县委的恢复

1930年1月，中共广宗县委中断，但党的活动却没有停止。是年，槐窝人栗曼晴、吉兴古人赵锦一分别在省立四师和广宗县立高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县域中北部开展建党活动。1931年，在外地读书的中共党员肖凤鸣（肖一舟）、乔金亭（乔晓光）、王常珍（张玺）、牛秀玲（女）、邱玉琪、任永寿、李品三等积极在家乡传播革命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县域中北部的传播。1932年，赵锦一在董里完小创办流动图书馆和青年读书会，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

刊,向学生宣讲《共产党宣言》、《列宁在苏维埃》、《莫斯科印象记》等,与此同时,中共党员任永寿(张尹村人)也在其家乡办起流动图书馆,向进步青年推荐《血影》、《经济学》等,并介绍张德庆、张登明等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冬,栗曼晴把他先后发展的吴先文、吴先德、吴西华、吴玉印和苏卜光(威县前马庄人)等中共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共槐窝村支部,先后由吴先文、吴玉印负责。1934年,北李庄建立起中共支部。鉴于广宗县党组织不断壮大的现实,中共直南特委于1934年秋决定恢复中共广宗县委,并由直南特委巡视员郭森兼任县委书记,吴西华任组织部长,吴先文任宣传部长。这一时期,中共广宗县委除负责县内党的工作外,还辖威县西部和邱县北部地区的党组织,所属支部共有4个,党员50余人。1935年初,小柏社人阎海燕在本村建立中共支部后,迅速把党的活动扩大到史柏社、乔柏社、大柏社、洗马和三清村等村庄。2月,为了直南农民游击战争的需要,中共直南特委决定撤销中共广宗县委,同时组建中共巨鹿中心县委。8月,由于直南农民游击战争的中心已转移到广宗,中共直南特委又决定将中共巨鹿中心县委改建为中共广宗中心县委,县委书记仍由郭森担任,刘栋任组织部长,李同安任宣传部长,县委机关驻槐窝。这一时期,中共广宗中心县委领导广宗、巨鹿、南宫、威县和邱县部分地区的党组织。中心县委下设广宗北部

区委、巨鹿东部区委、威县西部区委和威(县)南(宫)工委、威(县)邱(县)工委。是年底,县内共有中共党支部 50 余个,党员 400 余人。

第三章 开展抗日反蒋游击战争

第一节 发动和领导学生运动

1931年春,各地学生运动纷起,邢台四师、冀县六师、大名七师等学校的学潮直接影响到广宗。邢台四师学生王常珍(张玺)等共产党员经常携带一些马列主义小册子到县高小,让学生们传阅。高小学生牛尽善(牛亚夫,东牛里庄人)在他的姐姐牛秀玲(大名女师学生、共产党员)的影响下,经常在学生中间宣传革命思想,鼓动同学们起来革命。王常珍等人的宣传,牛尽善的鼓动,为县高小学潮的掀起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1931年4~5月间,县高小学生们请求校长赵式禹撤换经常打击进步学生的反动教师冯某。赵式禹不仅不允许,相反却压制学生。学生们找到县公署,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仍无济于事。因为县教育局长靳新波、督学张续吾,以及国民党县党部等5个机关中的一些人都是他们的换帖弟兄。县里不仅不答应学生的要求,反又串通

一气压制学生,排挤、打击进步教师王益斋、申景尧。

校长赵式禹以不遵守校规为由,宣布开除学生牛尽善、卫之统、郭成检、梁纪文。同学们严正要求不能开除4位学生,但未获答复。第二天,两个班的80多名学生集体罢课,上街游行。学生们高喊“打倒赵式禹”,“打倒靳新波”的口号来到县公署、县教育局及国民党县党部,要求撤换赵式禹。第三天学生们准备再次上街游行,当局出动警察包围了学校,不准学生出校门。最后学生冲出校门,扑向警察。看到气势如潮的学生,警察急忙退走。



国民政府时期广宗县印印模

于是,学生们来到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公署,县长仓促接见了学生,并答应了学生们提出的条件。此时,当局派员将教师王益斋、申景尧抓捕到公安局。学生们闻讯后,又高呼口号来到公安局,要求释放两位教师。学生们还列举

了赵式禹的十大罪状,印成传单向社会团体、商号散发,在大街上张贴。出于压力,当局释放了两位教师,并撤换了校长。但当局却又策划在学校门口枪毙4个学生代表,来震慑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一些家长是“大刀会”

成员的学生悄悄回家,向家长求援。“大刀会”立即向其成员发出“鸡毛帖”,准备围攻县城。同时新任县高小校长李朝忠支持学生运动,向北平(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学生同乡会发出函电,同乡会表示大力支持家乡的学生运动。在内外压力下,当局忙请农民协会进行调解。结果当局答应了学生提出的所有条件,并向学生们赔礼道歉。持续40多天的县高小学潮,以学生们大获全胜而平息。

广宗县立高小的学潮,突破了只有爱国学生孤军奋战的圈子,逐步发展成为由贫苦农民参加的革命活动,促进了农民阶级的觉醒。此次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苦农民,一场暴风骤雨式的农民游击战争终于在冀南爆发。

第二节 冀南农民游击战争在广宗的发展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群众开展反帝运动,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严重打击的号召。而国民党政府置日本的侵略于不顾,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疯狂聚敛“剿共”经费,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对立。

在直南地区,国民党政府为垄断食盐,强行禁止农民淋卖小盐,引起以熬硝淋盐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广大盐民的强烈反对。1933年6月,国民党长芦盐运使公署派1个团的机械化部队进驻广宗,准备用武力禁盐,事先得到消息的广宗县长姜谧荣,对盐池采取了“先毁后建”的对策,勉强支应了过去,而平乡等县地方政府与国民党的禁盐武装沆瀣一气,派出盐巡和盐警捕捉盐民,捣毁盐池,戳坏盐锅,激化了盐民与政府的矛盾,广大盐民争取淋盐自由的斗争此起彼伏。

1934年春,广宗、平乡一带的盐民开始以大刀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同盐巡进行斗争。为了维护广大盐民的利益,加强对盐民斗争的领导,中共直南特委派阎海燕(广宗县小柏社人)担任盐委书记,负责盐民工作。由于党的及时领导,使这场争取淋盐自由的斗争很快转向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为目标的武装斗争。7月,盐委组织7000盐民包围了平乡县城,强烈反对推销海盐,要求淋盐自由,平乡县政府无视盐民的要求,下令向盐民开枪,盐民武装进行了抵抗。此次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有力地打击了反动当局对广大盐民肆意压迫和掠夺的反动政策,为贫苦盐民争得了一定的生存机会。

据此,中共河北省委认为直南地区具备了开展农民武装斗争的条件,遂于1934年9月27日发出《给直南党

的指示信》，要求直南特委“千百倍努力地去在加紧领导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实现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并把这一任务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和反对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红军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的指示，中共直南特委于1935年3月召开会议，制定了以“抗日讨蒋”为旗帜，以“分粮吃大户”为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五月暴动”计划（史称“冀南暴动”或“冀南农民游击战争”）。

为了落实特委的暴动计划，直南特委书记李菁玉和特委委员张霖之、郭森等，于1935年5月2日（农历四月初一）傍晚，在槐窝村组织80多名群众，携带20多颗手榴弹和十几支手电筒，准备偷袭位于件只镇的国民党警察局，槐窝村的向导因家庭矛盾未能按时脱身，李菁玉在向导家劝解时发生骚乱，惊动了国民党警察，袭击计划落空。随后，刘文忠（刘子厚）在滏阳河以西的暴动计划，也因情况变化未能付诸实施，“五月暴动”流产。

1935年5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就发动直南游击战争再次做出“游击运动的开始，必须是在党的工作最有基础、群众斗争最尖锐发展的区域……必须依据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提出具体的口号与纲领……游击队的武器，无疑地是要从敌人手里夺取得来”的指示。是月底，根据

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河北省委的指示,中共直南特委总结了第一次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积极准备发动第二次暴动。7月,《何梅协定》签订,华北地区民众抗日反蒋热情急剧高涨。7月底,在中共直南特委的领导下,广宗县组建起不脱产的贫雇农游击小组,他们以土枪土炮或大刀长矛为武器,白天务农,晚上掩护群众组织——“布袋队”进行分粮斗争。邻近广宗的巨鹿、南宫也组建了农民游击小组。在农民游击小组的支持下,广宗、巨鹿、南宫交界地带的分粮吃大户运动迅速掀起高潮。

为加强对农民武装的领导,1935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军事干部王光华亲临广宗。不久,王光华将活动在广宗、平乡、巨鹿、南宫交界地带的几支游击小组分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第四支队(支队长王宜臣)、第五支队(支队长郭玉怀)、第十二支队和三杏村分队(分队长肖凤岭)。9月,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在广宗开展了收枪分粮斗争。10月,游击队智取了冶村民团局,收缴了团丁的枪支。经过游击队的工作,冶村地主史宗信,主动把自己的枪支献给了游击队。11月初,王光华率领游击队掩护“布袋队”分掉了东董里村3户地主的余粮和浮财,并张贴标语进行宣传。12月2日,中心县委书记郭森和军事干部王光华率领游击队收缴了核桃园大地主黄连房的1支手枪、4支大枪和数百发子弹,为下一步

的分粮斗争扫清了障碍。12月8日,中共广宗中心县委发动杜家庄、北杨庄、刘家庄、槐窝、柏城、陶辛庄、毕家庄、七斗店、司马庄、邱家庄、邢家庄、三杏村,以及6个湾头、3个董里和威县古城、尹村、马庄等20多个村庄的“布袋队”分掉了黄连房家的余粮和浮财。核桃园收枪分粮斗争的胜利,锻炼和鼓舞了贫苦农民。不久,民游击队又相继收缴了北杨庄大地主王济五家的两只手枪、一个手榴弹及刘家庄村大地主刘老增的武器,并分掉了他们的余粮和浮财。与此同时,王常相、王家庄、魏村、板台、洗马、李磨、红龙等村庄也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分粮斗争。为了更加广泛地发动群众,中共广宗中心县委还指示威县西部区委(驻槐窝)组织了一次以农村妇女为主体的分粮活动,分掉了威县马庄和窑洼两户地主的余粮。分粮过程中,她们高呼“姐妹们,放下剪刀,起来革命”等口号,号召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参加革命斗争。

分粮运动的开展,引起了地主阶级的恐慌,部分地主开始扩充武装,准备与游击队进行武力抗衡。1935年冬,广宗县司马庄的几户大地主筑起土围子,购买步枪5支,成立“联防队”,公开对抗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为打击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王光华决定派红军游击队三杏村分队消灭司马庄“联防队”。1936年1月17日(农历腊月二十三)晚,游击队员带着5支步枪、10支独角龙、10

挂鞭炮和2个煤油桶,由分队长肖凤岭率领悄悄将司马庄土围子包围,寨门外一阵激战,游击队的火力压住了对方,肖凤岭率部分游击队员迅速冲进村内,攀上民房占领了制高点,并在煤油桶里放起鞭炮,肖凤岭大声命令:“联防队员们,你们也是贫苦出身,不要替地主老财卖命,红军游击队已将你们包围,我们的政策是缴枪不杀,抵抗必死!”联防队员不知虚实,纷纷缴枪投降。隐蔽在村外的几百名贫苦农民蜂拥而入,砸开地主的粮仓,分掉了他们的余粮和浮财。

在党的领导下,农民游击战争的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以槐窝为中心,纵横近百里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中共广宗中心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紧了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凡是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并自愿献出武器、主动缴纳抗日救国捐的开明地主,由中心县委发给其抗日救国保险证,游击队保证不动其财产和土地,并保证其人身安全”的重要决策,许多地主在了解了党的政策后,主动找游击队商谈,表示愿意出钱、出枪、出粮,以换取抗日救国保险证。不长时间,中共广宗中心县委便征得抗日救国捐8万多元,抗日救国捐除一部分留做自用外,大部送交省委和北方局。上级用抗日救国捐购买了一批武器,扩充了游击队的装备。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游击战争中,党的组织得到空前的发

展,到1936年初,全县党员发展到450人,党支部达到55个,并建立了分别以槐窝、红庙和庞村为中心的3个区委。

第三节 配合省委中心工作,创建抗日讨蒋救国军

通过领导和开展收枪分粮吃大户运动,各级党组织进一步认识到军事干部和“枪杆子”的重要作用,开始建立正规武装,以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5年底,省委书记高文华来到直南,向直南特委传达了省委关于直南游击战争的指示,并提议把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扩建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以便更加广泛地团结、吸收、联合各种抗日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广宗中心县委的积极配合下,1936年1月28日,1100多名游击队员齐集广宗县北李庄,宣布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正式成立,由刘文忠(刘子厚)任师长,王光华(化名张杰)任副师长。下辖两个团,刘文忠兼任第一团团长,王光华兼任第三团团长,中共广宗中心县委书记郭森兼任第三团政委。第三团有400多人、300多支枪,下设4个连和1个特务连。其中,1连由原四支队改编,连长王宣臣;2连由原五支队改编,连长李老范;3连由原十二支队改编,连长于某某;4连由十五支队改编,连长韩春

诚;特务连由原特务队改编,连长刘文信。至此,冀南地区第一支师级建制的正规抗日武装正式诞生。誓师大会上,救国军全体将士庄严宣誓“以我们的头颅和热血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救国军驻地各村的人民群众,鸣放鞭炮以示庆贺,同时,地方党组织还张贴了布告,广泛散发印有救国军誓词和党的抗日主张的传单。救国军成立之后,直南地区的广宗、威县、巨鹿、平乡北部、南宫西部、任县、内邱东部、隆平南部的游击区和革命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革命根据地内党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或半公开,北李庄、司马庄、三杏村、槐窝等村公开操练队伍,有的地方党组织公开征收抗日救国捐,并公开发放抗日救国保险证。

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的成立,牵制了国民党3个主力师的兵力,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东征,也为抗战爆发后,八路军129师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第四节 残酷的镇压,不屈的斗争

以广宗为中心的冀南农民游击战争,不仅轰动了整个冀南地区,同时也震动了全国,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安,蒋介石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元,要他限期剿

灭“冀南赤祸”。1936年初,宋哲元调集29军、32军和63军各1部约3个师的兵力,纠合地方反动武装,对冀南反蒋抗日武装进行血腥镇压,他们采取“长期驻扎,由点到面,驻村围剿,反复清乡”的办法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的反动方针,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和游击队员。1936年2月1日,29军伙同地方反动武装包围了董里、吉兴古、北卫庄等村庄,抓捕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28人,杨振明、孙元杰等10名中共党员惨遭杀害。同一天,29军还包围了李怀一带村庄,抓捕中共党员和暴动骨干几十人。2月17日,29军又包围了杜家庄、北杨庄和桃园等村庄,抓捕了一批中共党员和游击队员。3月30日,29军和32军分别包围了尹村、板台、魏村、西召和洗马等村庄,张德庆、刘起云、尚须娥、李培仲、崔新生等数十名中共党员及进步群众被捕,仅后魏村1个村就有7人被捕。4月6日拂晓,29军又派出重兵包围了北李庄、三杏村、七斗店等十几个村庄,李仁德、邱玉其等中共党员被捕。面对敌人的“围剿”和屠杀,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毫不屈服,他们利用多种形式同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4月下旬,中共广宗中心县委书记李同安在开会途中被捕,敌人把他吊在梁上用皮鞭抽、棍棒打,打得他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后来又逼着他赤脚走过12盘烧红的铁熬子,滚烫的熬子把李同安脚掌上的皮肉全部烧焦,露

出了骨头,但他毫无惧色,坚贞不屈,泰然自若,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企图用封官许愿诱降,遭到李同安的痛斥,敌人费尽心机,终未能使李同安屈服。5月21日,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将李同安杀害。此间,广宗县有320名革命群众被捕,33名中共党员和33名暴动骨干被害。整个冀南地区惨遭杀害的中共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达2000余人。驻南宫的国民党“剿共”专员刘必达更是杀人如麻,逢单日杀单数,逢双日杀双数,并将人头挂在城门上或村镇街头示众,对中共党员和暴动骨干则张贴布告“悬赏缉拿”。

为了应对残酷的斗争局势,中共中央北方局于3月底指示中共直南特委:“在敌人大规模镇压,处于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有计划有组织地退却,以保存力量,等待时机。”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和中共直南特委的安排,中心县委主要成员和部分已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以及暴动骨干陆续转移到外地,游击队员则化整为零,“插枪”隐蔽,党组织的正确决策为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历时一年多的农民游击战争就此结束。

冀南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却把革命的火种洒遍冀南平原,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经过严重斗争考验的优秀领导干部,从正反两个方面取得了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经验,为即将开始的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四章 广宗党组织在创建抗日根据地的 斗争中恢复发展

第一节 抗战爆发后的局势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拉开序幕。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号召全体中国人民、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并积极促进实现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此为标志,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战伊始,由于国民党政府乞求和平而坐失战机,在日本侵略军增兵并大举进攻之时,又实行消极片面的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致使正面战场上屡战屡

败。日军在侵占平津之后,又以 20 万兵力沿平汉、津浦、正太、平绥等铁路向华北各地进攻,于 9 月 24 日攻陷保定。10 月 10 日,国民党第 29 军军部撤至广宗县郭里庄,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流亡至广宗县洗马村。次日侵华日军派侦察机 1 架飞临广宗县上空侦察,并在县城上空投掷炸弹 5 枚。12 日 10 时,又派 6 架飞机飞临广宗上空,至件只即开始向地面扫射,至县城又投掷炸弹 1 枚,当场炸死平民 10 人。13 日 9 时,又派 3 架飞机轰炸后平台村,炸死 29 军军法处士兵 3 人、平民 1 人,炸毁民房 2 间。广宗县城遭轰炸后,国民党县长逃亡,狱中囚犯蹦出,全县陷入无政府状态,一时间土匪四起,社会秩序大乱。以王英七、王协山、王争贵和杨老憨为首的四股土匪杀人越货,抢掠民财,疯狂一时。匪首王英七在大三周一带寻衅滋事,骚扰百姓,烧毁民房 417 间;另一股土匪窜至前平台村,吃掉 1 头牛和 5 头猪,挖走洋钱 1 车,抢劫衣物无数。曲周一带的土匪百余人,窜至大平台村,欲行抢劫,被民团堵在村外,经过激战,杀死土匪几十人。匪首王协山、高西林纠集二三百人在清村骚扰 4 天,并将村民的粮食、衣被抢掠一空,后又在槐窝抢劫了 3 天,在件只吃住 11 天,吃掉耕牛 2 头、猪几十头,抢去大枪 20 余只、骡马 30 余匹,以及商户的绸缎、布匹等,还劫持群众到地主郭仲印家挖元宝、银元。以王争贵为首的一股土匪,胆大妄

为,进入县城后,竟堂而皇之地坐进县衙,向城内百姓要吃要喝。匪首杨老憨(杨修善)纠集邱县一带土匪 50 余人,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在邢济路两侧抢掠过往客商和沿路村庄,成为城南大害。

沿平大公路南撤的国民党 29 军官兵每到一处,就疯狂抢掠民财,强迫村民用马车运送辎重和家眷。县境内平大公路沿线村庄无一幸免。仅在邱庄村就抢走骡子 3 匹、驴 1 头,鸡蛋 200 多个和大批衣被,在塘疃村强征马车十几辆;在城内万福林车铺,推走自行车数辆。国民党军队的溃退和土匪的猖狂活动,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群众的灾难,在这内忧外患与日剧增的情况下,抗日救国救民的神圣使命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

第二节 恢复壮大党组织,积极发展抗日武装

早在 1936 年冬,中共直南特委即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负责联络冀南暴动失败后广宗、南宫、威县一带隐蔽起来的党员。“七七”事变后,中共平汉线省委书记李菁玉与直南临时特委取得了联系。1937 年 8 月 17 日,李菁玉听取直南临时特委的汇报后,指示临时特委抓紧恢复党的组织,组建抗日武装,在民众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9 月,临时特委书记马国瑞来到广宗县董里集村,找

到冀南暴动后就地隐蔽起来的部分党员,宣布成立中共广宗县北区委员会,并任命李警湘为区委书记,同时给区委部署了恢复党组织和宣传抗日等工作。李警湘以跑乡邮为掩护,到附近村庄秘密开展工作,先后恢复建立了董里集、邢家庄、卫家庄、吉兴古等 15 个村庄的党支部,并恢复了东董里、北董里、冶村、陈湾头、赵湾头、红庙、七斗店等村庄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不久,县内党员达到 217 人。与此同时,马国瑞还与原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连连长李老范取得联系,以参加过冀南暴动的红军游击队员为骨干,组建起冀南抗日联军。10 月间,这支抗日武装就发展到 3 个连共 200 多人,有长、短枪百余支。由李老范担任连长的一连是冀南抗日联军的主力连,该连有 100 多人,八九十支枪,主要活动在槐窝一带村庄。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一连连的领导,冀南特委派刘铁之负责该连的连队建设,刘铁之结合军事训练,给干部战士上政治课,进一步提高了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性,坚定了他们听从党的指挥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11 月 3 日,直南临时特委主要领导马国瑞、李仁德、于更森等在北李庄李仁祥家召开会议,史称“李家庄会议”。会议就发动群众及恢复党员组织关系等做出部署。当晚,会议转移到于更森家中继续举行,主要讨论组建抗日武装的问题。李家庄会议后,广

宗县的党组织在董里集村组建了广宗县抗日防匪自卫团。与此同时马国瑞、程玉林、李仁祥等积极在广宗、南宫、威县交界地带恢复和发展党员,到1938年初,县内党员恢复发展到400多人。1938年1月,中共直南临时特委改建为冀南特委。为加强对广宗、威县一带的领导,中共冀南特委决定成立中共广(宗)威(县)中心县委,负责广宗东部和威县西部村庄的党组织。2月,又成立了巨(鹿)广(宗)中心县委,广宗县西北部村庄的党组织归其领导。同时,在董里集高小筹建“广宗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广宗县的党组织还在杜杨庄一带组建起一支名为沙行游击队的抗日武装,由杜家庄人杜泽民任队长,不久这支抗日武装被上级命名为冀南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并编入正规军。1938年3月,巨广中心县委撤销。6月初,中共广威中心县委撤销,是月5日恢复建立中共广宗县委,并成立广宗县抗日民主政府,王抬风任县长。县抗日政府成立后,陆续改编了一些“保安队”、“联防队”、“自卫



队”、“联防队”、“自卫

队”等武装,组建起广宗县抗日游击大队。7月,县抗日政府将农民武装——大刀会改造为抗日武装。以此为基本组建起广宗县武装抗日自卫队,县设大队部,区设支队部,数村设1小队,县大队部有大队长、教导员、副大队长、巡视员、通信班等共20余人,主要领导人均由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委任。抗日自卫队建立后,主要负责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维持地方治安,带路送信,拆城破路和支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任务。到年底,广宗县北、中、南3个区分别有95%、70%和20%的村庄建立了党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700多人,县、区、村陆续建立人民抗日武装,中共广宗县委领导的县农民救国会、县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以及文化教育救国会等群众性抗日救亡组织相继成立。至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完整的抗日救国体系正式形成,为八路军129师深入敌后开辟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第三节 配合八路军开辟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上旬,太原、安阳相继沦陷,标志着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正式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阶段。八路军开始实施战略展开,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129 师和 115 师一面派遣以营连为单位的战斗部队与地



方党组织结合,发动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一面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分散到各地开展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29 师骑兵营(后改骑兵团)经内丘、临城等地开赴冀南;385 旅一部组成先遣支队进入邢台、沙河一线;385 旅 769 团 8 连和冀西游击

队配合深入冀西地区;129 师东进纵队开赴冀南腹地。

1938 年 1 月,陈再道司令员率领由 769 团 4 个步兵连、1 个机枪连和 1 个骑兵连组成的 129 师东进纵队开赴冀南,会同先期到达冀南的孙继先、胥光义支队消灭了冀南地区的土匪和伪军,为冀南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扫清了障碍,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月 1 日,东进纵队到达广宗县七斗店村,帮助该村建立起抗日自卫队,帮助广宗成立了半政权性质的“广宗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委

会”)。战委会成立后利用集市庙会召开群众大会,号召各界爱国同胞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长城,为驱除日寇而战斗到底;号召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农民救国会;号召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妇女救国会;号召青壮年积极参加抗日自卫队,战委会为动员各界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3月30日,八路军129师骑兵团政委邓永耀率部收复广宗县城,并处决了“维持会”俩头目,震慑了抗日动摇分子,坚定了广宗人民群众积极抗战的决心。5月,杨秀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的身份和冀西游击队政训处副主任杨克冰(广宗人称之为“冀西娘”),率领冀西游击队之一部进驻广宗县城。11月16日,冀南行署机关转移至广宗县槐窝、杜家庄、北杨庄一带办公。随之迁来的还有冀南抗日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冀南行政干部学校、冀南兵工厂等。1939年1月24日,冀南行署在广宗县件只村召开第一次由全区抗日政府、民众救国团体和士绅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的行政座谈会,并讨论通过《冀南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大纲》。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到来,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广宗县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第四节 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基层组织

抗战爆发后,由于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到来,抗日根据地内党员和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发动全民抗战的斗争中,基层党组织起到了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得到了充分发挥,但由于党的基层组织刚刚恢复,新党员的比重较大,加上过去党的组织处于地下秘密斗争的环境,部分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缺乏系统的了解,基层党组织的战斗还不够坚强。为了使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迅速适应抗战环境,进而领导人民群众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中共中央于1939年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要求在党组织大发展的基础上,以整顿和巩固党的组织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随后,冀南区党委召开各县委组织部长联席会议,对如何巩固党的组织作了部署。

根据冀南区党委的安排,中共广宗县委于1939年9月在冶村小学举办了有100多名党支部书记参加的党员训练班。党训班开班之前,由县委组织部长肖英主持召开了座谈会,目的在于了解情况,摸清底数,以便确定培训内容。经过座谈,发现不少党员对党的纲领、性质、任务、奋斗目标、组织纪律原则以及党员的权利、义务等缺

乏了解,入党的动机也多种多样,非常有必要对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进行培训。

根据党员的思想水平和认识程度,县委研究确定了党训班的主要教育内容:一是讲党的性质和任务,讲党的最低和最高纲领,讲社会发展规律;二是讲入党的条件和党员的标准;三是讲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四是讲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五是讲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六是讲党的团结;七是讲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1939年9月至1940年,中共广宗县委通过党员训练班的形式,先后培训支部委员350多人、党小组长320多人、党支部书记100多人、党员2300人次,极大地提高了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党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带领人民群众坚持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广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在动员抗战、建设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讨石反汪斗争以及反“扫荡”、反蚕食等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经受住了严峻斗争环境的考验。

第五节 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

193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颁布《冀南区减租减息办法》,规定:“地主土地收

入,不论租佃半种,一律照原租额减少 25%”,“钱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不得高过一分五厘”。史称“二五减租、分半减息”。为了取得减租减息斗争经验,冀南区把广宗县确定为减租减息试验县,中共冀南区委民运部长李亚光带领 20 余名冀南区抗日联合会会员深入广宗农村,领导和发动减租减息工作。

在李亚光同志的亲自指导下,中共广宗县委、县抗日政府广泛宣传减租减息政策的重大作用,启发农民的觉悟,帮助群众算细账。同时,动员开明士绅带头响应政府号召,自觉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对顽固不化、抗拒减租减息者,则组织群众与其进行说理斗争。迫使他们遵守政

府法令。件只村大地主郭仲印拒不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县委、县抗日政府组织 1000 余名雇工同他进行斗争。郭仲印被迫按照《冀南区减租减息办法》之规定,退还应减之租和应减之息。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使广大雇工受到启发和教育,并获得了实

广宗县抗日政府呈文

际利益,部分雇工进而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受到广大

雇工的拥护。由于雇工增资不仅涉及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涉及大部分富农阶层的利益,县委、县抗日政府审时度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决定由雇工同雇主自愿协商,雇主可根据承受能力增加雇工的工资。这样,既满足了雇工的合理要求,又不会使地主、富农以此为借口解雇雇工。经过协商,郭仲印为其雇工增加了工资,55名雇工每人得到白布4匹,25家佃户共分到粮食3万多斤。对郭仲印的斗争取得胜利后,不少开明地主主动按照政府法令之要求,积极减租减息。县委、县抗日政府及时总结经验,领导全县人民群众广泛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不久即取得彻底胜利。接着,广宗县又开展了“合理负担”运动,按照1938年冀南主任公署发布的《冀南公平负担暂行办法》,统一按每人平均所有地亩划分等级,实行累进负担法。即每人除去一亩半地之外,人均3亩地以下为第一级,每亩按1亩计算;3至6亩为第二级,每亩按1.2亩计算;6至9亩为第三级,每亩按1.4亩计算;9至12亩为第四级,每亩按1.6亩计算;12至15亩为第五级,每亩按1.8亩计算;15亩以上为第六级,每亩按2亩计算。每村应负担总数,按等级累进计算后的地亩平均负担。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土地越多负担也相对多些。这一政策的实施,大大减轻了贫苦少地农民的负担。“公平负担”也称“合理负担”,是中国共产

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税赋政策,是对农村封建税制的重要改革。这一改革,从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的需要出发,既减轻了占绝大多数的少地无地农民的负担,激发了他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地主富农的利益。合理负担政策,是推动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措施,为夺取反经济封锁斗争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推行“公平负担”之同时,根据地广大农村还开展了其他两项重要工作。一是清理隐瞒土地,即查清“官地”和“瞒地”。瞒地多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而广大贫农、雇农或因地少,或因没有土地,根本谈不上隐瞒问题。清理隐瞒土地,按实际占地情况合理负担战勤和公粮,符合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仅三杏村一个村就查出瞒地 400 多亩;二是改革出战勤的办法。抗战初期,出战勤“按劳力负担、按土地负担”,按照这一办法,谁家劳力多谁家出战勤就多,谁家土地多谁家负担就重,战勤负担极不公平。为了满足群众的愿望,县委、县抗日政府按照“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原则,对出战勤之办法进行修改和完善,修改后,按劳力和土地相结合出战勤。即一个劳力算一个工,一亩地折算一个工,各户的劳力数、土地亩数之和为该户应出战勤数,由村公所依次轮流派战勤,经过改革,满足了群众愿望,实现了合理负担。

1939年开展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是一次发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斗争。经过这场斗争,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农民生活,为发展生产创造了条件,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

第五章 根据地建设全面展开

第一节 在日军大“扫荡”中,巩固和 发展抗日根据地

1938年11月15日,日军出动独立混成旅第二旅团及114旅团各一部约3700多人,对冀南地区施行第一次“扫荡”。次日,日军向南宫发起进攻,刘伯承、徐向前率129师机关和冀南行署机关转移至广宗县北部农村。刘伯承、徐向前等129师首长和129师机关驻柏城,冀南军区和冀南行署机关驻槐窝、杜家庄、北杨庄一带。冀南抗日军民按照刘伯承、徐向前确定的作战方针,坚壁清野、化整为零,在广宗以东、清河以西、南宫以南、威县以北的广大农村开展反“扫荡”斗争。经过16天28次的浴血奋战,冀南抗日军民毙俘日伪军600余人,迫使日军撤出包括广宗在内的冀南中心地区。

1939年1月,敌华北方面军开始实施所谓“肃正计划”,按照“先控制平原,后进攻山区”的既定方针,再次

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日军调集第10师团主力和第14师、27师、110师、114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人分11路向冀南推进夹击，企图消灭或驱逐八路军，进而控制冀南平原地带，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战略企图，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将驻守冀南的八路军主力分为6个集团，分区游击，独立作战，互为策应。1月19日，陈赓率领的386旅集团到达广宗县南部马房营、旧店、高家庄一带。2月1日上午10时，盘踞在曲周县的侵华日军纠集300余人、汽车12辆、炮数门，偷袭后旧店八路军营地。陈赓、王新亭、许世友指挥115师344旅688团由石井疃、贺固、南营（属邱县）突袭日军右侧，敌人顿时大乱，向西逃窜。129师386旅补充团截击该股敌人于马房营、南张葛一带，激战数小时，敌又由西面增援汽车数辆、炮1门，汇合残敌猛击八路军营地。688团突击失时，敌乘黄昏突围西窜。是役歼灭日军100余人，击毁敌汽车两辆，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2月10日，陈赓又在香城固地区设伏，消灭日军200余人，击毁敌汽车8辆。与此同时，徐向前、刘志坚隐蔽在广宗农村指挥抗日军民与日军周旋，利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地方武装亦严阵以待，寻找战机，打击日寇。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广宗县抗日游击大队得到情报，6日将有一个中队的日军由威县护送张云亭

到广宗县城并出席伪县公署成立大会。中共广宗县委指示县大队在南寺郭西北、杨家庄村东南一带设伏,消灭这股日军。14时20分,约有70余人的日军步兵和4名骑兵持3挺机枪、3个掷弹筒在前,1辆小汽车和6辆大汽车殿后,出威县西门杀气腾腾开往广宗县境。15时30分,日军进入我县大队预设伏击圈,副大队长孙长锁、教导员张半农命令一连和三连同时开火,日军中队长平泽慌忙命令汽车队掉头后撤,在机枪的掩护下,日军分南北两路向广宗县城逃窜。是役系广宗县抗日游击大队首次独立对日军作战,打死打伤日军多人,并缴获不少武器、弹药,戳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为开展和坚持游击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积累了宝贵的斗争经验。

2~3月,冀南抗日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毙伤日伪军5300余人,生俘日军5人、伪军799人,缴获步枪300余支、轻机枪10挺、炮5门,击毁敌战车49辆,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和消耗,粉碎了日军的战略企图,巩固和发展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第二节 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运动,大大提高了农

民生产和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和手工业产品产值出现恢复性增长,桃、杏、梨、枣、瓜年产量分别达到50万斤、12万斤、100万斤、5万斤和500万斤;油类产量达到15万斤;土布、粉条、白酒、柳编等手工业产品产值分别达到18万元(银元,下同)、10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为提高粮食产量,广宗县抗日政府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发放贷款,奖励耕织,帮助农民改良种子,更新农具,最大限度地提高耕作效率,保护和繁殖牲畜等,使根据地的粮食产量迅速提高,不仅满足了军民需用,还向太行根据地输送了大批粮食。根据地农业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根据地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冀南四分区先后创建了工具制造厂、印刷厂、电池厂、皮革厂等生产企业。发展较快的是土布纺织业,到1940年初,广宗、巨鹿等12个县就有土布纺织厂202个。根据抗战的需要,兵工厂也迅速发展起来。抗战初期设在广宗县核桃园和杜家庄、北杨庄一带的冀南兵工厂,由于设备简陋,只能制造炸弹和手榴弹,修械所也只能修复枪支,皮革所和被服所只有几十名工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冀南兵工厂逐渐发展成为有工人400余人的大型工厂,不仅能够制造手榴弹、刺刀,还能制造子弹、地雷等,基本满足了武装抗战的需要。为维护根据地经济秩序,中国共产党还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货币金融斗争。1939年10月

15日,冀南银行开始发行冀南货币,作为根据地的本位流通币流通。四分区设立了分行,广宗县设立了支行。分行和支行都兼代抗日政府的财政金库工作,用以调剂农村经济、扶植生产、发展贸易、繁荣市场。在根据地内排挤以至肃清敌伪货币流通,对各种地方流通券逐渐由政府收回或禁止使用。冀南银行的建立健全和冀钞的广泛流通,澄清了根据地的金融市场,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利用伪钞对根据地实行经济掠夺的企图,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抗战物资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必需的供给,根据地特别注意发展物资贸易,建立健全了贸易机构,各地陆续建立起一大批合作社和贸易局。广宗县所在的冀南四分区,有各种合作社845个,拥有会员75128人,资金达2119万元。贸易局团结了大批爱国商人,在敌占区如天津、临清、邢台、石家庄等地都设立了秘密商号。根据地军民越过敌人的层层封锁,购得西药、纸张、煤油等大批急需物资。贸易局沟通了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交流,互通余缺,促进了市场的繁荣。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发展,稳定和增强了抗日军民的信心,为坚持持久抗战提供了必需的物质保证。

第三节 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抗日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广泛动员和鼓舞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抗日斗争中来。中共广宗县委、县抗日政府和驻广抗日武装通过发展根据地抗日的、健康的宣传教育，鼓舞广大干部和民众，推动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斗争的发展。



早在抗战初期，中共直南临时特委即指示各县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编印《大冲锋》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八路军 129 师挺进冀南过程中，每到一地即首先向民众广泛深入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让广大群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号召他们参加到抗日工作中来。与此同时，抗日根据地军民还利用“屋顶广播”进行宣传（即站在屋顶上，将广播内容用铁皮或硬纸制作的喇叭筒进行广播）。广宗县抗日政府和二区战委

会利用缴获敌人的收音机定时记录新闻,把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发的消息油印成册,发给干部群众,使根据地军民能及时收听收到党中央的声音。党组织和部队的宣传工作,对唤起民众,迅速打开抗日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地创建后,广宗县先后创办《战斗报》、《黎明》和《五一旬刊》,及时将抗日政府的声音传播到社会的不同



阶段,指导广大党员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1939年9月18日,由冀南文化界抗日救国协会主办的《冀南日报》在广宗县杜家庄、北杨庄、刘家庄和槐窝一带创刊。1942年8月,四地委机关报《群众报》创刊,冀南第四军分区出版《铁流电讯》,收编新华社电讯

稿件。这些报刊紧密结合党的中心工作和抗战形势,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广泛地宣传贯彻到基层和社会各阶层,进一步增强抗战必胜的信心;把地方工作情况、基层工作经验、广大人民群众呼声及时总结报道出来,

成为党与广大群众密切联系的有效途径,是党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心声,对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和各项建设事业,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人民群众在战火中创造了崭新的抗战文化艺术,反过来又宣传鼓动了群众,丰富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精神生活,使根据地到处洋溢着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抗日气氛。1938年6月,广宗县战委会和妇救会发起成立“火线剧社”,以动员群众参加抗战为目的,编排一些鼓动性较强的短剧到乡村巡回演出。他们先后排演了深受群众欢迎的《卢沟桥》、《枪毙活不久(和梦久)》等剧目,对扩大抗日救亡宣传、鼓舞人民群众抗战热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卫建中、马德全、王云章、薛中光、鞠英士、张登明、孔金三、贾秋文、翟同庶、贾步霞、史随三、魏庆霖等演职人员,为广宗县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艺术事业贡献了才智和力量。在八路军129师的带动和扶植下,县、区宣传队也陆续建立起来,以教唱革命歌曲为先导,《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保卫黄河》等响彻在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打鬼子去》、《打不走鬼子不回家》等,反映了的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生活和火热的抗日情绪,产生了较大影响。抗日爱国歌咏活动把革命的道理融入健康的娱乐活动之中,进步的男女青年被抗日气氛所感染,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抗日热情,推

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四节 抗日根据地的教育活动

抗战爆发前,广宗县的学校教育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1937年6月,全县有小学142所、完全小学4所、简易师范1所。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到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25年中,全县有18人考入大学,读过专科或中专的有25人。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加上连年战争和灾荒的摧残,学校教育几乎瘫痪。

抗日根据地创建后,基础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38年,八路军工作队陆续在东董里、件只、核桃园和县域南部一些村庄建立起抗日初级小学70余所,在校生2800多名。还在董里集和宋村创办抗日高级小学2所。1940年,创办了旧店抗日高级小学。

抗日政权建立健全后,为提高根据地广大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从思想深处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民众教育运动。1939年初,冀南主任公署制定了详细的《民众教育实施纲要》和《民众教育暂行规程》,要求各县每村都要建立民众学校,凡8至60岁的农民都要接受教育。民众学校

系短期训练班,分3期进行,每期3个月。第一期以16至45岁青壮年为主,第二期以妇女和未入学儿童为主,第三期以老年人为主。学习内容是抗日知识、时事分析、党的抗日民主政策和各种抗日法令法规,以及简单的语文和算术知识。各村民众学校以祠堂、民房或村中空闲地、大树下为教学点,以农村教师、救亡工作者以及进步士绅为教员。民众教育运动的兴起,把农村各阶层的民众普遍发动起来,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政府的政策深入到农民心中。他们学习了文化知识,掌握了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抗日斗争方法,把根据地全民抗战的战略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1939年以后,以夜校、冬校等方式组织民众教育,成为广宗县抗日根据地经常性的活动。通过开展民众教育,使大批青壮年农民走上脱产的抗日救国道路,使更多的农民群众增强了反抗敌人封锁和“扫荡”的能力。

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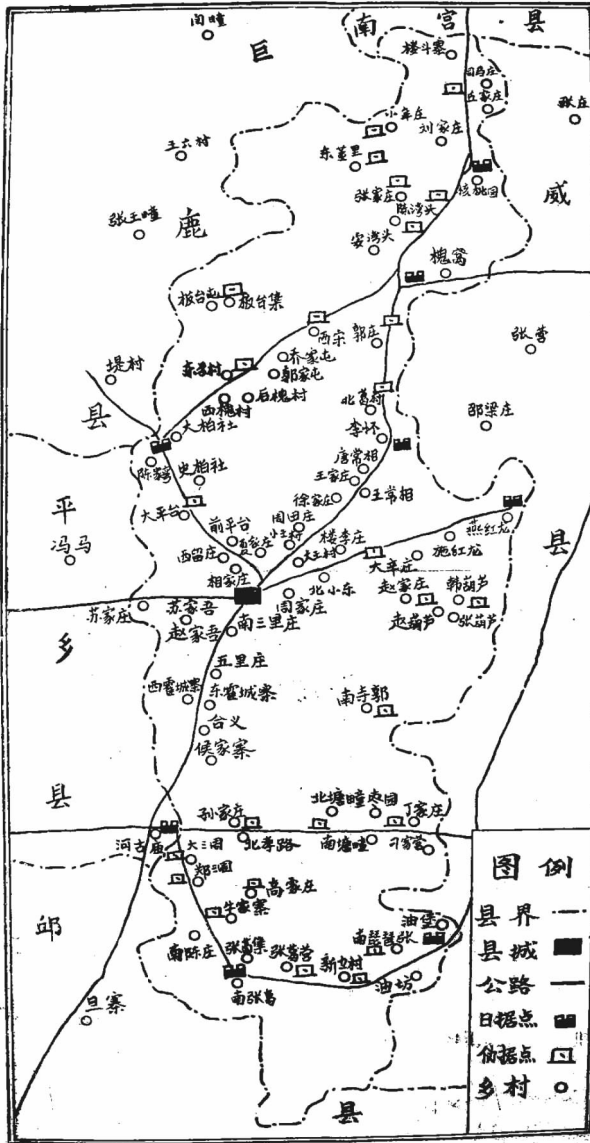
坚持抗战,根据地在斗争中巩固和发展

第一节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形势与任务

一、日军加紧对占领区“治安肃正”

中国人民的团结抗战,粉碎了侵华日军企图速战速决的亡华计划。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由于战线拉长,人力物力消耗过大,侵华日军兵力出现不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侵华日军的后方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日本开始调整侵华政策,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而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措施。另一方面加紧对占领区的统治和掠夺,提出“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方针,并将注意力用于打击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的抗战由此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早在1937年底和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即先后成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河北省公署”。1938年6月,在邢台成立“伪冀南道公署”。1939年3月,成立伪“广宗县公署”,

委任张云亭为伪知事。后又相继组织成立“新民会”、“劳工协会”、“妇女会”、“教育联合会”、“合作社”、“借款处”等伪民众组织和伪经济组织,以配合伪政权实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推行汉奸理论,宣扬“中日亲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等。各级伪政权执行日本驻华北方面军的“治安肃正”计划和《治安肃正纲要》,通过“讨伐”作战,分散部署兵力,进而依靠分散的据点,对抗日军民“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同时进行各项治安建设工作,培植、整顿亲日武装团体,发行伪币,掠夺粮食、棉花等战备物资,发展特务网,挑拨国共关系。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于1938年3月在北平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大量发行伪钞,控制金融,掠夺物资。在农村,把粮食定为军用物资,实行“统制”,强行征购和配给。1939年1月~1940年3月,驻华北的日军先后进行了三期“治安肃正”作战,以“奇袭加快速奔袭”的方式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讨伐”、“扫荡”。1940年2月22日(农历正月十五),侵华日军“扫荡”巨广路重镇——陈家湾,杀害村民9人,打伤村民2人,烧毁民房百余间。为实现“治安肃正”计划,从1939年9月起,日军还推行“囚笼政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等,从敌占区向抗日根据地构成网状“囚笼”,企图达到分割、封锁抗日根据地和包围、消灭抗日军民的目的。



日伪据点示意图

在上述侵略政策的指导下,1940年,伪顺德道在其统治的15个县内部署伪军1883人,配备步枪531支、手枪82把;组织特务371人,配备枪支206支;部署伪警备人员3001人,配备步枪2420支、手枪125把、轻机枪7挺、手榴弹1420枚;在广宗县城部署日本宪兵队30人和伪治安军1个团,在广宗境内部署伪警备队2个中队、6个小队,共计183人,另还有特务队30人。此后,又陆续在全县修建炮楼35处,并不断增加兵力。到1940年底,核桃园炮楼驻有日军50余人、伪治安军300余人、伪警察30余人,小辛庄炮楼驻有伪治安军20余人,三杏村炮楼驻有伪治安军22人,东董里炮楼驻有伪警备队员30人,张家庄炮楼驻有伪治安军20余人,陈湾头炮楼驻有伪治安军20余人,件只炮楼驻有日军200余人、伪治安军500余人、伪警察20余人、伪警备队员50余人,西宋炮楼驻有伪警备队员30人,板台炮楼驻有伪治安军20余人,东召炮楼驻有伪治安军20余人,北葛村炮楼驻有伪警备队30人,郭庄炮楼驻有伪治安军20余人,李怀炮楼驻有伪警备队60人、日军20余人,盐场炮楼驻有一个伪警备小队,大柏社炮楼驻有伪治安军50余人、日军20余人,大平台炮楼驻有伪治安军58人,韩葫芦炮楼驻有伪治安军20余人,赵葫芦炮楼驻有伪警备队30人,燕红龙炮楼驻有伪治安军20余人、日军30余人,南寺郭炮楼驻有伪警

备队 30 人,孙家庄炮楼驻有伪治安军 24 人,霍城寨炮楼驻有伪治安军 20 余人,北塘疃炮楼驻有伪治安军 20 余人,张葛集炮楼驻有日军 20 余人、伪警备队 30 人,新立村东北炮楼驻有伪治安军 20 余人,新立村西北炮楼驻有伪治安军 20 余人,油堡炮楼驻有日军 20 余人、伪治安军 20 余人,马房营炮楼驻有伪治安军 1 个连,丁家庄炮楼驻有伪治安军 20 余人,牛家寨炮楼驻有伪治安军 20 余人,南琵琶张炮楼驻有伪警备队 30 人,大三周炮楼驻有伪治安军 20 余人,郑三周炮楼驻有伪警备队 30 人,高家庄炮楼驻有伪警备队 30 人,前张家驻有伪安抚军军部,共 300 余人。各炮楼的日伪军昼夜监视抗日军民的抗日活动,抗日环境严重恶化。

二、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

抗战初期,国民党采取联共抗日方针,虽然战局不利,但主观上还是比较努力的。武汉会战结束后,在日本侵略者的政治诱降和英美对日妥协政策的影响下,国民党发生了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也发生动摇。加之惧怕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因而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对抗日的态度日益消极,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日益加强。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宣称要“抗战到底”,但按蒋介石的解释,所谓“抗战到底”就

是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会议秘密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确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决定成立防共委员会。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蒋介石集团由联共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一个转折点。此次会议前后,为了削弱以至逐步消灭共产党在华北的抗日力量,夺取对华北敌后的控制权,国民党顽固派开始以抗日为旗号,向华北敌后伸展力量,以部分主力和大量游杂武装返回华北,公开限制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在敌后的发展。1938年6月,国民党重新建立河北省政府,委任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委任张荫梧为河北省保安司令、河北民军总指挥、河北省民政厅长。9月15日,鹿钟麟率领河北省政府机关经太行进入冀南。11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派60个师回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由各省主席兼游击司令,对敌后游击队进行“整理”,同时决定设立冀察战区,由鹿钟麟任总司令,提出“撤换县长,驱逐八路”的口号,阴谋建立第二政权,并命令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从此,河北省部分地区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国民党政权与日伪政权三种政权并存的复杂局面。国民党军队进入河北后,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鹿钟麟、张荫梧等大力收编反共武装,袭击八路军和其他抗日部队。进驻冀南的国民党十军团石友三部与抗日政府的“摩擦”不断升级,由横征

暴敛,掠夺勒索民财,到公开杀害抗日干部,甚至袭击抗日政府机关和抗日部队。此时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处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两面夹击之下,抗日环境十分恶劣。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又将五中全会制定的“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的政策,改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蒋介石指使朱怀冰、石友三等向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使反共“摩擦”发展形成了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

三、共产党巩固与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在抗战新阶段到来之际,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和教训,确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任务,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



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全党要独立地、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提出把工作重心放在战

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要求全党自下而上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奠定了基础,推动了党的各项工作。12月底,参加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129师政委邓小平返回冀南后,立即召开冀南军政会议,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根据冀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农村,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抗日民主阵地的战略方针。通过对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贯彻,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提高了在抗战中的责任感,明确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打破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束缚,从而推动了抗日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全面发展,也为反“摩擦”斗争做了思想准备。

193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指出:“河北之摩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钟麟)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并强调:共产党、八路军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对非理性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面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动员全党为克服国民

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这些指示,给抗日根据地军民指明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和巩固、建设与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向。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县委号召全县抗日军民继续发扬党的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确实地深入工作,埋头苦干,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以坚定的政治立场,去克服一切困难,粉碎日军围攻,打退顽军的“摩擦”。

第二节 开辟隐蔽战线,建立地下情报网和交通网

1938年,中共广宗县委恢复建立后,县委组成人员通过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充分认识到抗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为适应斗争环境,县委一方面积极发展壮大抗日武装,与敌人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建立地下情报网和交通线,与敌人开展隐蔽斗争。1939年2月,广宗县沦陷后,县委、县抗日政府派遣一大批忠诚可靠的地下工作者,潜伏在敌人内部,开辟隐蔽战线。吕老恒、吕兆科、吕月秋、邢永章、黄俊刚、肖彩勤、师玉影、鞠济申等分别打入城内、大柏社、件只和核桃园的日伪办事处或据点,他们不仅及时向县委、县抗日政府提供敌人的活动动向,还瓦解了大量伪军,并且为抗日军民

提供了部分武器弹药。韩德振(西关人)打入敌人内部后,利用伪小队长的特殊身份,先后为县大队提供子弹2800余发;在驻防核桃园据点时,放走抗日干部赵济川、刘代品、郭笑言等;在驻防北葛村据点时,成功策动了全队伪军携带大枪32支、子弹1600多发和1支驳克枪反正。蒋全中、乔贵林、王新贵等隐蔽战线的工作者分别向抗日军民提供子弹900、1500、200余发。县委、县抗日政府还在城内建立了两套互不隶属的情报机构,分别派韩泽玉和肖毕长期隐藏在敌人戒备森严的县城,搜集情报。韩泽玉先后发展乔福同、乔福其、乔福有、乔福禄、李美善、王文珍、王书存和乔凌章等建立西关情报站。不久,西关情报站又建立1个分站,由于光泽负责。韩泽玉还吸收乔贵林、蒋全中、乔凌霞、崔永梁和韩泽斌等在楼李庄耿志华家建立情报传送站。肖毕以孙老代(东董里人)馍馍房为掩护,建立东街情报站(后移至张海清家)。韩泽玉、于光泽、肖毕等领导的情报站,为县委、县抗日政府提供了大量准确的情报,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任务,为广宗抗日军民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县委和县抗日政府还建立了两条地下交通线,一是以杜家庄西南沙行杜登荣(绰号四狗熊)菜园为中心交通站的沙行交通站。沙行交通站距杜家庄和槐窝各有四五

华里,周边果林茂密,沙丘连绵,非常隐蔽。中心交通站日夜有专人值班,各区交通员每隔五天到中心站联络一次。县委规定:区交通员必须按时到交通总站联络,不得延期,到站不见人不走。如一小时内见不到中心站的人,即去事先约定的大树下,取出用石头压着的写有二次联络时间、地点的字条,按要求进行联络。抗战期间,联络地点用的最多的是距杜登荣菜园4华里远处的一个水井旁边和槐窝村吴元根的棺材铺。二是设在杜家庄杜才忠家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传递党内重要文件。该站有7名交通员,每人负责一个区。交通员隔日往返一次,保证地委、县委和各区委的联系。这条敌人摸不清、看不见、摧不垮、炸不烂的地下交通线,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斗争的深入和持久开展。

第三节 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对“摩擦”

1938年9月15日,鹿钟麟带着国民党向共产党“收复失地”的使命到达冀南。为了争取和团结鹿钟麟共同抗战,18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组织各界群众5万余人,召开纪念“九一八”抗战7周年和欢迎鹿钟麟大会,表达了欢迎鹿钟麟到河北领导抗战的意愿和与国民党共同团结抗战的诚意及决心。陈再道代表冀南军政提请鹿钟

麟,承认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冀南地区唯一政权机构,现任的正副主任及各地专员、县长可由鹿钟麟名义正式委任。鹿初到冀南,无军队、无枪炮作为其“反共”的资本,即表示抗战要多依靠八路军,大家同舟共济,遇事共同商量,但对抗日政权的确认和委任等实质问题均不予答复。不久,鹿钟麟即开始搜罗反动武装,扩充反动势力,将游杂武装赵云祥、胡和道、王子耀等拉拢过去,并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结成“冀鲁联防”,与共产党、八路军公开对抗。1938年底,鹿钟麟请求蒋介石,将国民党第39集团军石友三部由山东调到冀南,鹿还指示所部,连续在广宗、巨鹿、威县、任县等地攻打八路军所在县城,袭击抗日部队,抢夺枪支、财物,杀害抗日干部。在所控制区内,强迫群众实行保甲制和摊派制,不许群众参加抗日组织和开展抗日活动,不准给抗日政府送交公粮,不准使用抗日政府的冀钞,各学校不准使用抗日政府编印的教材,不准选举村长。1939年7月初,石友三委任辛海岭为广(宗)、清(河)、威(县)、邱(县)、曲(周)5县保安司令,公开与驻守冀南的八路军制造“摩擦”。石友三所部在小辛庄将冀南区战委会主任捕杀,赵云祥部在刘家庄将八路军青纵及东纵工作人员11人全部杀害。他们残害抗日军民的办法极其卑劣,主要有“盖紫花被子”(活埋)、“下饺子”(投入井内)等。石友三还配合日军对广宗县进行

“扫荡”。鹿钟麟及其追随者在冀南的所作所为,严重地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坏了团结抗日的大好局面。当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共产党打,国民党看,石友三在冀南胡捣蛋”的顺口溜,贴切地揭露了石友三集团假抗日,真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广大抗日军民强烈要求对破坏抗日的反动分子进行严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局部冲突须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立场,冀南军区于1940年2月9日发起讨伐石友三的战役。根据战役部署,中共广宗县委组织部长李良田率领县大队指战员,摧毁了石友三设在董里集、李怀集、大柏社等他的征粮、征税处,并将其首恶分子处决。在北宋村,县大队配合八路军某部将第39集团军第四营的抢粮队击垮。县大队还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贺固一带俘虏石友三部队多人。中共广宗县委、县抗日政府还要求广大人民群众不给石军粮食、不用法币、不搞保甲,同时,广泛开展驱鹿(钟麟)、拒庞(炳勋)、讨石(友三)、拥朱(德)的群众运动。在八路军和抗日军民的严厉打击下,石友三被迫逃往鲁西。是年7月,经过短期休整后,石友三再次进犯冀南,抗日军民积极配合对石友三部进行坚决反击,终将石部击溃,反“摩擦”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抗日军民得到空前的考验和锻炼,坚持和保卫了抗日阵地,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节 开展反投降斗争,粉碎汪派分子武装叛乱

1940年2月底,石友三率残部逃到鲁西,同商丘的汪伪军第一军军长张岚峰勾结,秘密投降汪伪政权。根据侵华日军的部署,石友三所部暂不改编,仍以国民党政府军的名义活动。石友三同汪精卫勾结、合流后,执行“曲线救国”的错误路线,指使大批汉奸、特务流窜到广宗,在杜家庄非法成立汪记国民党县党部,拟定伪县政府成员名单,网罗地痞流氓组织乡保团、暗杀团,并发放武器、弹药,还在20多个村庄建立起反动组织,阴谋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是年2月,以常乃秋、常朝勤等5人为首的汪派分子,在槐窝村北沙行秘密集会,制定武装叛乱计划,准备在暗杀中共广宗县委和县抗日政府主要领导人后,建立听从于南京汪伪政府的伪县政府,迎接石友三部重返广宗。针对汪派分子的反革命活动,中共广宗县委积极应对,一方面广泛发动群众,深入调查了解汪派分子的阶级成分及其具体表现,查清汪派分子的来往关系及破坏抗日的罪恶事实,进而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揭露石友三同汪伪勾结投敌叛国的事实和公开反共、屠杀、残害抗日军民的罪行,呼吁尚存爱国之心的国民党员,同叛国投敌的汪精卫、石友三划清界限,立即停止一切破坏抗日的

活动,回到抗日阵营;一方面组织精干的武装突击队,成立以县长黄宪章、公安局长刘利甫和县大队教导员刘卫华为正、副指挥的平叛指挥部。2月13日(农历正月初六)晚,平叛指挥部一声令下,武装突击队和各区中队分头行动,将汪派分子一网打尽,并将常乃秋等5名祸首处决,一举粉碎汪派分子的武装叛乱活动,严厉打击了顽固、反动势力,争取教育了中间势力,抗日武装力量得到了进一步锻炼和发展,抗日根据地更加巩固。

第五节 邢济路以南党组织的恢复与广曲县的建立

邢济路(今邢临路)以南地区是广宗县地方党组织的发祥地,早在1927年就建立了广宗县境内第一个党支部——东贺固支部。1930年1月,中共广宗县委中断后,这一地区的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1938年8月,中共广宗县委派李仁祥到邢济路以南开辟工作,到年底,李仁祥在20%的村庄恢复和建立了党支部,为八路军129师386旅和115师344旅688团开辟城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不久,李仁祥又收编了以蒋三春(蒋仲德)为首的地方武装。经中共广宗县委批准,这支71人的武装力量被命名为广宗县抗日游击大队第六中队,县抗日游击大队还给他们发了印信、符号、册表,配发了武器,并在牛

家寨村对其进行了集中整训。蒋三春当了六中队的队长后,又重操旧业,干起土匪勾当,多次抢劫财物,奸污妇女,捆绑吊打无辜群众,并准备率队哗变。县委察觉后多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但他顽固不化,不但不服从调动,还拒绝接受县大队委派的政工人员。为了挽救六中队,县委决定尽快解决蒋三春的问题,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张半农。一天夜里,县抗日政府县长黄宪章和张半农、贾剑林、薛中光率县大队的一个连前去牛家寨六中队驻地,准备收缴他们的武器,因蒋早有准备,计划落空。后来,县抗日政府利用在马房营村召开中队长会议之机,将蒋三春逮捕,当晚,县抗日政府将蒋三春押解到牛家寨六中队驻地,县长黄宪章当众宣布了蒋三春的罪状,并下令将蒋三春处决,经过教育,六中队终于成为一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邢济路以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后来广曲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0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冀南、太行、太岳等根据地负责人会议,遵照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指示,决定把“建党、建军、建政”作为今后华北地区党的主要任务。5月,冀南区党委和冀南军区召开地委、县委书记和军队营以上干部会议,贯彻黎城会议精神。会议决定要进一步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尤其是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根据此次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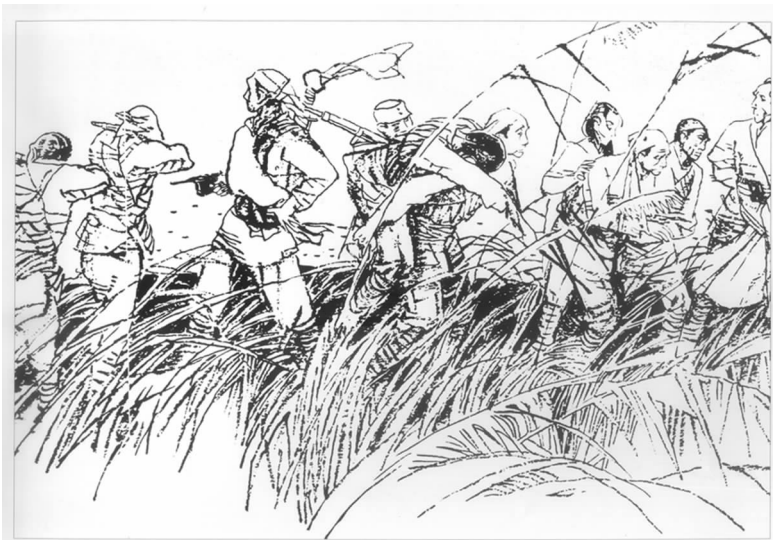
议精神,对冀南区行政区划和作战区域进行了重大调整,在广宗、平乡、曲周、邱县交界地区设立广曲(联合)县建置。广曲县辖境北至邢济路,南至曲周县之大小第八及邱县之潘坡、南营,西至滏阳河,北至企之县界及原广宗县刁家营。境域东西宽八九十里,南北长六七十里,辖6个区138个村,总人口8万余人,原广宗县共29个村划归广曲县辖。6月,中共广曲县委、广曲县抗日政府、广曲县抗日游击大队在原广宗县东贺固村宣告成立。县委书记王雨亭,县长张雨秋,县大队大队长由张雨秋兼任,县大队政委由王雨亭兼任。该县共有党员500余人,设有6个区委和100余个党支部。

1940年9月,按照中共冀南区党委的指示精神,广曲县和广宗县分别通过普选产生了“三三制”(中共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县、区、村三级政权。广宗县抗日政府7位政府成员中,民主人士占3位。全县226个自然村除县城附近的个别乡村外,都选出了村级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团结了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共同抗日。

第六节 配合百团大战,开展“破路”运动

为了打破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分割、封锁,阻止日军

在华北的全面进攻,从而振奋和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排除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危险。1940年8月,华北八路军在彭德怀副总司令的指挥下,先后出动105个团的兵力,对以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敌占主要交通线发起大规模破击战,史称“百团大战”。为配合百团大战,冀南先后出动10个主力团和各县游击队参战,广大抗日群众先后出动25万人次,积极踊跃支援部队破击作战。在此次大规模破击战中,冀南四分区部队掩护2万多人民群众将广宗至巨鹿、威县至王官庄、威县至贺钊、巨鹿至南宫等干线公路及乡村道路大部破坏。广宗县委、县抗日政府在领导广宗人民破击敌人交通线斗争的同时,还在村与村之间开挖深1.5米、宽2米的交通沟,以便运送抗日物资和机动迂回袭击敌人。广宗境内共挖交通沟152条,总长210公里。参加挖掘交通沟的人民群众达12万人次。抗日交通沟将敌人的交通网络破坏得体无完肤,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县委、县抗日政府还动员3万抗日军民,破袭了敌人的东西交通动脉——邢济路,并割断敌人的电话线,使敌人的公路交通和通讯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中共广曲县委指挥广曲县抗日游击大队,对邢济路上的敌伪据点进行了骚扰,致使邢济路上的交通长期瘫痪。有力地支援了百团大战。



为配合百团大战,广宗县抗日游击大队还积极袭扰敌人的后方。1940年9月16日(农历八月十五),冀南四分区部队配合县抗日游击大队发动了攻城战斗,晚23时,攻城部队从南门攻入城内,经过激烈战斗,除50余名伪军投降外,大部守敌被歼。攻城战斗震慑了敌人,迫使日军抽调兵力回城增援,减轻了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主力部队的压力。9月21日早晨,伪广宗县警备队副大队长茹秀林带领60余名伪军到卫伏城村催征粮草。县抗日大队二连侦察到这一情况后,决定就地歼灭之。指导员杨仕一命令二排由村北、三排由村东分别向村内进攻,杨仕一和八路军386旅一位尚未归队的排长,率领一排埋伏在村西。战斗打响后,敌人掉头西窜,刚一出村就

遭到一排的迎头痛击,敌人只得又龟缩到村里。中午,在李樊村宿营的县大队司务排又前来增援,顿时,伪警备队慌作一团。曾与县大队有过联系的伪小队长卫清琪,趁机建议伪警备大队投降,茹秀林感到自己已成瓮中之鳖,别无出路,只好点头默许,卫清琪大声喊道:“杨指导员,不要打了,我们缴枪,请你们过来谈判。”谈判时,茹秀林说:“我们把枪缴出一半,你们放我们回城。”杨仕一未作直接答复,只是对伪警备大队宣传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见敌人无投降之意,杨仕一向通讯员孙西行递了个眼色,孙西行立刻明白了杨仕一的意思,悄悄溜到村外,和战友们一起骑着刚刚缴获的四匹战马,围着村子飞奔起来,刹那间,村外战马呼啸,尘土飞扬,似有千军万马向村中扑来。不一会儿,杨仕一就接二连三地接到增援部队前来增援的报告,伪警备大队听到八路军增援部队前来增援的消息,个个身不由己地筛起糠来,杨仕一趁势命令茹秀林立即无条件投降,否则就地消灭,茹秀林和60余名伪军无可奈何地向县大队缴枪投降。事后,县委、县抗日政府和冀南区党委、军区文工团分别召开庆功会、慰问大会和文艺晚会,慰问二连指战员。冀南军区分别给二连全体指战员和指导员杨仕一通令嘉奖。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对广宗人民支持百团大战的行动进行了高度赞扬。

第七章

战胜严重困难, 坚守抗战阵地

第一节 敌后抗战进入困难时期的形势和党的斗争方略

一、侵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

百团大战后, 侵华日军为巩固后方, 加紧了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封锁。1941年1月, 日本侵略者制定《对华长期作战指导纲要》, 在华北占领区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 企图在一定时限内, 通过反复“扫荡”消灭抗日根据地。为实施《纲要》, 华北日军驻军增至32.5万人, 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40%以上; 在华北发展伪军10万人以上, 占伪军总数的近一半。日本侵略者变军事进攻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为一体的“总力战”, 变短期的鲸吞式“扫荡”为有计划的、步步为营的“蚕食”和长期“扫荡”、反复“清剿”, 变一般的烧、杀、抢、掠为彻底摧毁根据地生存条件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1年1月14日, 侵华日军放火烧毁柏城村的上千亩树林

和上百间民房,造成上百人无家可归,使这个昔日的红色



伪河北省公署发给广宗县东召村南郭氏的居住证

堡垒村几乎成为“无人、无食、无住”的绝缘地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一步加紧对中国敌后抗日战场的进攻,企图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华北日军连续5次开展“治安强化”运动。1942年3月8日,侵华日军纠集1000余人,“围剿”李怀、谷常相等33个村庄,抓捕抗日干部、中共党员和抗日群众1000多人,扣押342人,其中40多人被押往东北充当劳工。特别是1942年4月29日,日军对冀南根据地实行的“铁壁合围”,使冀南抗日力量遭到严重损失,根据地被分割为格子网状,一些地区变为游击区,抗日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大大缩小。日军还把自己能够稳固统治的地区称做“治安区”,把游击区称做“准治安区”,把敌后抗日根据地称做“非

治安区”。日军针对三种不同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治安”措施,在“治安区”内,以“清乡”为主,利用伪军、伪组织和隐蔽的特务网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推行保甲制度,实行村民连坐,强化伪治安队、保安团、警备队等汉奸武装,扩大各种伪组织,对群众进行奴化教育;在“准治安区”内,以“蚕食”为主,镇压与怀柔兼施并用,逐渐驱逐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政权和抗日组织,建立伪政权和伪组织,使游击区逐渐变为敌占区;对“非治安区”,则“蚕食”和“扫荡”相结合,而以“扫荡”为主,“蚕食”根据地边缘区,“扫荡”根据地腹心区,以“蚕食”占领的点、线作为“扫荡”的依托,又在反复“扫荡”中继续加速“蚕食”。其每次“扫荡”又必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企图以此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日军通过构筑封锁线、建碉堡、修公路等手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包围



日伪军修建的据点

和封锁,并进行疯狂的“蚕食”和“扫荡”,使整个冀南地区都处于“夜宿炮楼下,仰观路上灯,行人必

过路,天天有敌情”的环境。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和“三光”政策,给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空前的灾难,抗日军民的伤亡和牺牲不断加大,再加上日军的经济封锁、经济掠夺和连年的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出现极为严重的困难,粮食和衣被短缺,军需民食出现危机,抗日军民的斗争环境越来越艰苦。为了保存抗日力量,坚持持久战,上级指示广宗县抗日游击大队撤离县境,党政干部除到冀南区党委和四地委学习外,留下的党员和干部转入地下,进行隐蔽斗争。

二、赵一叛变后广宗县的抗日形势

面对日益恶化的抗日环境,部分群众情绪低落,思想产生动摇,个别意志不坚定的干部在汉奸的拉笼下,甚至叛变革命,当了可耻的叛徒。时任县委书记赵一就是其中的一员。1942年初,冀南区党委在武城召开全区县委书记会议,针对冀南地区日益严重恶化的斗争形势,区党委给各县委布置了新的任务。面对严酷的现实,赵一产生了悲观情绪,每次开会总是躲在角落,一言不发。四地委书记郭森察觉到这一异常后,对赵一进行了说服教育,并告诉他回到广宗传达完武城会议精神后立即由地委另行安排工作。2月底,武城会议结束,郭森带着赵一回到广宗李磨村,准备开完县委会议后再和赵一一同去地委。

李磨会议上,赵一支支吾吾,要求组织部长王英(肖英)代为传达武城会议精神。郭森批评赵一说:“武城会议是你参加的,你不传达,为什么却让没有与会的王英传达呢?”在郭森严厉的目光下,赵一语无伦次地讲了一下武城会议的有关决定,尔后躲在一旁不出声了。中午,赵一趁郭森不在其身边时偷偷溜出会场不知去向。赵一失踪后,郭森立即指示由组织部长王英负责县委的工作,县委一面派公安干部赵一卜查找,一面将会议地点转移至王常相,并通知所有与赵一有过接触的党员干部立即转移。赵一离开广宗后,先在平乡躲了一阵子,后在大汉奸牛元湘的拉拢下于4月5日以假被捕的形式投敌,把自己所知道的上下级关系及武城会议精神全部供给敌人,又把党和抗日政府的文件、报刊交给敌人,还把抗日物资的埋藏地点告诉了敌人。赵一还责令叛徒李寿成等7人拟出未暴露的党员、干部名单,阴谋策动这些党员、干部叛党。在赵一的策划下,7月18日(农历六月初六),广宗县和邻县的千余名日伪军对一、二区的40多个村庄进行“清剿”,共有1000余人被押往件只据点,其中400多人被捕入狱,这400多人中,有80多人被押往东北或日本国充当劳工,其中死亡或无音讯者30余人。为赎人,人民群众被迫花去赎金40多万元。10月15日,广宗、平乡等县的日伪军又对葫芦一带的19个村庄进行“清剿”,抓捕抗

日干部和人民群众 200 余人,其中 60 多人被押往东北或日本国充当劳工,这 60 多人大部分葬身异国他乡或杳无音信。四区区长姜化民(大辛庄人)和段仁朝(小柏社人)、张二明(张清村人)、王培运(南街人)等被“押送”到日本国北海道、名古屋等地强迫劳动,受到非人的折磨,为了团结和带领广大劳工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姜化民等广宗籍党员与南宫县大队书记杜世郁、清河县大队书记刘平在名古屋的一棵大树下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在党支部的秘密组织下,广大劳工开展了破坏工具、消极怠工和争取权益的斗争。直到抗战胜利后,他们才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回到祖国的怀抱。

赵一除组织“清剿”外,还纠集 50 余名叛徒、特务建立情报机构,搜集抗日武装的情报,抓捕抗日干部,赵一的叛变给广宗县造成“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局面,抗日斗争环境进一步恶化。

三、严重自然灾害,根据地雪上加霜

1942 年,冀南发生百年未遇的严重旱灾和蝗灾。入冬无雪,春来无雨,旱情长达 8 个多月,大地龟裂,河道干涸。1943 年春,大部分耕地未能播种,仅有的春苗又干枯而死,麦季颗粒无收。接着是历史上罕见的蝗虫灾害,蝗虫飞来遮天盖地,飞蝗过后一扫而光,真是赤地千里,一片荒芜。是年 9 月中旬,酷旱后又因连降七天七夜大雨,

造成涝灾, 房屋严重倒塌。侵华日军将卫运河、滏阳河和漳河堤岸掘开, 把霍乱等病菌放入水中, 致使冀南平原洪水和霍乱同时泛滥。天灾人祸造成人民群众流离失所, 敌占重灾区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 40% ~ 60%; 根据地重灾区有 40% 的人口死亡或逃亡他乡。广宗县人民群众被迫卖地 26385 亩、卖房 33270 间、卖儿鬻女 4878 口, 外出逃荒者达 42983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42%), 死亡 12512 人, 有 3813 个家庭妻离子散。广曲县因灾死亡和失散者达 4 万多人, 占全县总人口的 50%, 仅郑三周村逃往外地的就有 238 人, 留下来的只有 178 人, 外逃者占全村人口的 57.2%; 死亡 100 人, 占总人口的 24%; 被抛弃和失散者 52 人, 占全村总人口的 12.5%。是年, 广宗县 44 万亩耕地共生产粮食 900 多万斤, 人均口粮只有 70 多斤, 群众收入的 30% ~ 50% 又被敌人掠夺, 进一步加据了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四、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政策

为了领导人民群众渡过难关, 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中共中央于 1941 ~ 1942 年间先后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作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建立“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十大政策。具体内容为:(1) 在对敌斗争中, 实行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方针, 更加充分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2)

实行精兵简政,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减轻人民负担;(3)统一领导根据地党政军各级组织,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各种抗日组织的作用,加强相互间的配合;(4)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加强根据地党政、军民的团结;(5)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根据地军民的物质生活;(6)开展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7)审查干部,进一步纯洁、巩固和提高党的干部队伍;(8)对军民进行时事教育,提高大家的抗日热情,促进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9)建立“三三制”政权,健全根据地的民主制度,巩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政权中的领导地位;(10)进一步减租减息,适当调整各抗日阶级和阶层的经济利益。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抗日政策,1942年5月,冀南区党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会议认为:(1)过去工作上存在着缺乏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以及主观空谈主义的错误;(2)没能正确贯彻实行对敌政治攻势和隐蔽精干方式开展斗争的方针;(3)群众运动未能广泛发动起来,人民游击战争开展不充分,致使有的地区党组织缺乏群众基础,造成主力部队“裸体跳舞”的严重后果。会议作出《关于贯彻党的政策以打开冀南目前严重局面的决议》,根据斗争环境情况,会议确定冀南目前总的斗争方针是:以政治斗争为主,以军事斗争为骨干。会议决定压

缩上层领导机关,加强县区独立工作能力,以适应艰苦分散的游击战争;开展对敌伪的宣传,继续开展对敌伪的政治攻势;组织小部队、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接敌区开展游击战争。

第二节 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意志

1942年5月,广宗县成立敌工站,受中共广宗县委和冀南第四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双重领导,广宗县敌工站由黄志刚、肖毕、韩超尘、邢建民4人组成,黄志刚为站长。敌工站又设若干分站,成员半脱产,多系村内有活动能力的中共党员。

为了有效地瓦解敌军,敌工站不断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日伪军的内部情况,对日伪军的兵力部署、武器弹药、工事构筑、组织状况,特别是敌伪人员的个人信息,对抗日的认识和态度及日伪军内部的矛盾,每个时期的活动动向等,都深入细致地进行了解。主要通过能够接近敌伪人员的人、敌伪人员的亲属去了解,在调查研究、充分掌握敌伪内部情况的基础上,利用敌伪内部矛盾,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攻势。

1942年8月,《晋冀鲁豫日报》先后发表了刘伯承和邓小平关于对敌伪人员开展政治攻势的谈话。中共广宗

县委根据两个谈话精神,针对敌伪人员思想动荡的情况,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是发《保证书》,即凡是经过抗日政府教育后,能够转变立场,不与抗日军民为敌的,抗日政府就秘密发给其一张《保证书》。《保证书》上印有“身在曹营心在汉”几个大字,还印有中共冀南四地委书记乔晓光、专员肖一舟、军分区司令员范朝利等领导同志的签名。《保证书》持有者均不按汉奸论处,并保证其个人和全家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书》在攻心战中起到了重大作用,争取和瓦解了许多敌伪人员,仅件只敌工站吕月秋,就发放了45张《保证书》,郭仲盘将8张《保证书》分别发给伪警察所秘书、伪警察所司务长、伪巡官等,拔掉大平台据点后,就有4名伪军拿出了《保证书》。二是对敌伪人员进行“生死簿”、“善恶录”、“红黑点”、“算总账”的攻心宣传,县抗日政府对每个敌伪人员都建立了“生簿”和“死簿”,记在生簿上的,被抗日政府捉住或解放后捉住均不杀,否则都要处决。“红黑点”即谁干了好事就给他记一个红点,干了坏事的就记一个黑点,点够10个黑点的被抗日政府捉住后立即处决。“算总账”就是捉住或解放后,根据“生死簿”、“善恶录”、“红黑点”的情况向每个敌人算总账。以上政策通过敌工站向敌伪人员进行了广泛宣传,产生了巨大作用。不少伪军警宪分子都主动想办法,找门子递情报,给自己留后路。燕红龙据点

的伪队长张三邦,在“红黑点”运动的感召下,主动找到敌工站,表示不抢粮,不抓人,不伤害群众,曾掩护敌工站的王林脱险。县、区抗日政府还分别召开伪家属会,在会上将敌、伪、奸、特的罪状和黑红点数目当众公布,教育伪属可以带账通知本人,说服动员他们悬崖勒马,将功折罪。经过教育,许多敌伪人员都有了戴罪立功的表现。

1942年,县抗日政府在冶村召开伪属会。会上,特务逯某的母亲表情紧张,会后,把抗日政府的政策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逯某,从此逯某悔过自新,主动给抗日政府提供情报,每逢跟随日军“扫荡”,总是千方百计营救被捕的抗日军民。敌工站长黄志刚被捕后,他多次探望,并送水送饭。县抗日政府还不断对敌伪人员上大课,夜间用喇叭向据点内的敌伪人员宣传抗日政府的政策。北葛村的模范班还编了一首快板,经过宣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敌伪人员都能哼上几句。快板道:“抗日进入三阶段,反攻阶段在眼前。伪军需要留后路,谁好谁坏看看善恶录。战略反攻就来到,谁家没有老和小,立功不分早和晚,生死簿上见分晓。”为了使侵华日军听懂,四分区敌工科还委派参加了反战同盟的两个战俘——秋山良照和小林静夫向日军喊话,震慑了部分侵华日军。

通过开展政治瓦解敌军工作,敌工站与敌伪人员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从伪军中的士兵、班长、分队长到

中队长,从伪办事员、伪保长到伪大乡长,从伪警员到伪警长,甚至在宪兵队都有敌工站的关系。抗日军民可以在据点、炮楼附近开展工作,小股抗日部队和抗日干部还可以到据点隐蔽。抗日政府征收的公粮,也往往是向伪军“借路”成功运到目的地。

政治攻势产生了巨大威力,不少伪军在外出“扫荡”时,或借故逃跑,或携枪投诚。北葛村炮楼的伪班长侯朝江先后向抗日军民提供子弹 2000 多发、步枪 15 支、手榴弹 600 多颗,还营救抗日干部 15 人。后来侯朝江率全据点的 13 个伪军,携带步枪 13 支、子弹 1000 多发、手榴弹 5 箱,向我区中队投降,北葛村据点就这样被拔掉。

政治瓦解敌军活动的持续深入开展,扭转了对敌斗争局势,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节 武工队深入敌后净化抗日环境

为帮助广宗县党组织和抗日政府开展工作,1942 年 7 月,八路军 129 师主力部队和分区 36 团抽调 20 名连、营、团级干部组成武装工作队,在队长张世盖(第四军分区 36 团副团长)、政委解方率领下进驻广宗。武工队员每人均配有长枪、短枪和匕首 3 件武器。广宗县还抽调

14名熟悉县情的干部配合武工队的活动。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土匪,铲除汉奸、特务,摧毁保甲制度,收缴良民证,打击敌人,排除干扰。在广宗工作期间,武工队分成3个组独立活动:一组由7名队员组成,由县委书记王英(肖英)和武工队长张世盖指挥,在一区活动;二组由7名队员组成,由解方和王林指挥,在二、三区活动;三组由6名队员组成,由孙云英、张轩指挥,活动在四、五、六区。武工队到达广宗不久即消灭了活动在柏城、槐窝一带的一股土匪。接着武工队又制定了铲除“坐探”的计划,把县区干部和武工队员编成10个战斗小组,一个组包围1至2个村庄,在同一天夜里,各小组同时出击,一举打掉十几个坐探。武工队还成功阻止了柏城炮楼的修建,收缴了日伪军发放的“良民证”,摧毁了保甲制度。武工队的活动就像水中的浪花,逐步扩大范围,结合瓦解敌伪军工作,团结士绅和知识分子,领导群众开展反资对敌斗争,配合分散的部队活动,显示了极大威力。经过艰苦工作,在广宗县域北部开创出一块游击根据地,打开了抗日局面,重新组建了县抗日游击大队。

第四节 以武装为核心,开展对敌斗争

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抗日政策和冀南区党委5

月会议精神,冀南四地委、冀南第四军分区确定加强敌战区工作,以武装为核心,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以克服和战胜严重困难。由此开始,广宗县的抗日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1942年9月18日,第二军分区10团攻克了大柏社据点,歼灭日伪军40余人,净化了柏社一带的抗日环境。随后,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范朝利带领1个连进驻乔柏社,县抗日大队四中队进驻史柏社。一天,几名日军带领一队伪军到清村抓夫抢粮,范司令员立即命令该连设伏于清村通往乔柏社的大道两旁,并派四中队担任诱敌任务。日伪军刚到清村,就遭到四中队几名战士的袭击。四中队战士边打边撤,日伪军步步紧追,很快就进入伏击圈内,战斗打响后,日伪军发现中了埋伏,掉头向县城方向逃窜。是役,打死打伤日军3人、伪军10余人。1942年秋,油堡伪据点的“内线”向中共广曲县委提供的重要情报称:威县城内的日伪军,将出动一个中队的兵力“扫荡”四区(原广宗县南部的29个农村),县委书记王雨亭指示区游击队配合八路军冀南军区新4旅11团的一个连,设伏于油堡村东北,另派县大队包围油堡据点,防止其增援,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八路军和游击队立即开火,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人发现中了埋伏后,组织了三次突围,均被击退,穷凶极恶的敌人开始向我阵地施放瓦斯,游击队员将装有辣椒面的“火药包”甩入敌阵,

呛得敌人只顾捂鼻子盖脸,我军乘机发起攻击,敌人又用掷弹筒猛攻我军阵地,激战一日,打死日伪军 10 余人,缴获步枪 10 余支,其余日伪军窜回威县。1942 年秋末,张葛集伪据点“内线”张三存送出情报称:“该据点的大部分伪军调出,目前只有 30 余人驻守”,中共广曲县委决定,抓住有利时机,拔掉该据点,遂命县大队基干连和四区游击队将张葛集据点包围,我军发起攻击后,张三存也在炮楼内向敌人开了火。由于我军里应外合,战斗进展得很顺利,短短 40 分钟,就将 30 余名守敌全歼,缴获步枪 30 余支。1942 年冬,件只据点的日军中队长带领 200 多名日伪军,到东董里村“讨伐”,广宗县抗日政府县长孙云英和县抗日游击大队特派员刘杰分头指挥群众和县大队战士到地道内隐蔽。孙县长和刘特派员从地道的瞭望孔看到日伪军麻痹大意、得意忘形的样子后,认为这是消灭敌人的有利时机。他俩研究了一下,立即命令一中队出街南洞口,在距敌人二三十米远的墙头下设伏;刘杰率二中队出街北洞口,隐蔽在敌人休息的路边墙内;孙云英带领三中队出村南路沟洞口,堵住敌人的退路。随着刘杰的一声枪响,一、二中队同时向敌人开火,强大的十字交叉火力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抱头鼠窜,逃跑途中正好进入我三中队预设的伏击圈,30 多名战士迅速跃出阵地发起冲锋,经过激战,除敌中队长和他的几个亲信逃跑

外,大部敌人被歼。1943年5月,广宗县抗日政府收到情报员韩泽玉和孙老代分别送来的情报:巨鹿之敌将于5月16日(农历四月十三)派36名日军分乘6辆马车,给广宗之敌运送武器弹药。县委、县抗日政府决定设伏于陈家湾村东,由八路军冀南军区新编第4旅11团9连担任主攻。接到任务后,9连携带6挺歪把机枪和3个掷弹筒,连夜赶到预设阵地,并挖好战壕,严阵以待。11时敌运输队进入我伏击圈内,随着张连长的一声枪响,9连指战员一起开火。顿时,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大部敌人连枪都没有来得及拿,就一命呜呼了。是役,击毙日军36人,缴获子弹60多箱、迫击炮弹20多箱,我军无一伤亡。

第五节 党政军民同甘共苦,战胜严重灾荒

一、坚守抗战阵地,与人民生死与共

1942年10月,冀南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针对抗日根据地斗争环境日益恶化的斗争形势,作出《关于渡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坚守阵地,坚持斗争,与广大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并就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之后,四地委又召开有地委、专署、军分区干部和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参加的会议,贯彻冀南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由地委书记

带领与会人员向党宣誓:不管环境多么困难,不管斗争多么残酷,也要坚持斗争,不怕流血牺牲,誓与人民群众共存亡!会议要求“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坚持残酷环境下的对敌斗争。会后,中共广宗县委在广大党员中开展了重新向党宣誓活动,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了签名誓约运动。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用自己质朴的语言表达抗战到底的心声。三杏村一位支部委员宣誓说:“第一,我情愿牺牲也不投降;第二,接受上级领导,努力工作,不暴露秘密;第三,死不投降,说什么也不中!”通过向党宣誓和签名誓约活动,克服了“四二九”以后出现的悲观情绪,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坚持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有力地回击了敌人阴谋推行“悔过自首”以瓦解党和人民斗争意志的企图,为坚持斗争做了思想上和品德意志上的准备。

1942年10月开始,中共广宗县委还利用一年时间,对党员干部进行了分期分批整训,参加整训的干部着重学习了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个报告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陈云的《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整训过程中,根据干部的自身情况,经县委研究并报四地委批准,决定了如下处理原则:(一)由于斗争环境艰苦而脱离工作岗位的干部,经村支部证明,脱岗期间没有危害党的行为,脱岗

时间短于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者,可连续计算工龄;如果脱岗时间长于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则从参加整训学习开始,重新计算工龄。(二)因各种原因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经党组织查证没有发现有危害党的行为者,整训后正式恢复党的关系;经查证有过危害党的行为者,视情节轻重依照党的纪律进行处理,经过整训后,可以继续参加革命工作。

1942年至1943年的干部整训工作,是对党员干部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活动,是从思想上建党的一个重要举措,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加强了党内和党外的团结,改进了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干部整训工作体现了“既弄清事实,又团结同志”的精神,对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在对敌斗争中正确贯彻党的各项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二、领导人民群众战胜灾荒

在大灾荒严重伤害和威胁人民群众生存的时候,在坚守抗战阵地又一次遇到严重考验的时刻,冀南区党委及时制定了“咬紧牙关,积蓄力量,战胜灾荒,坚持对敌斗争”的方针,把生产自救作为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中共广宗县委和县抗日政府,认真贯彻上级指示,以最大的努力,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开展顽强的抗灾斗争,采取的主要

措施有:发动群众向地主富农借粮,借棉花纺线、织布,组织运输力量贩运到外地;县抗日政府到山东购进一批花生饼、豆饼发给群众;动员生活无依无靠的群众到外地开荒种地、务工;向群众贷款、贷棉、贷粮;组织群众挖井,开辟水源,补种晚庄稼;县委、县抗日政府对机关进行“精兵简政”,精简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同时,在供给方面,机关人员由每人每天1斤半(市斤)小米,减少到每人每天10两(16两为1斤)。取消津贴、办公费等一切开支,减轻人民负担;要求县、区干部“坐村”培养劳动模范,县委书记王英(肖英)、县长孙云英分别在董里集和田家屯坐村,培养了田喜荣和张大三两位模范,田和张分别成立了互助组,田家屯在田喜荣的带动下,有几十户农民参加了互助组,组成4个变工队。广宗县变工抢种的经验在《冀南日报》发表后,迅速在冀南区推广;开展赎地回人斗争,县抗日政府明确要求,凡是在这次灾荒中,由于生活所迫将土地、房产出卖给地主的,一律无条件归还农民;富农收买的房地产,通过评议协商,可归还原价的一部分或全部;中农购买的房地产,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由双方商定。这次斗争中全县共有9万多亩土地归还原主,失地农民重新获得了土地。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支持生产自救运动,县委还为机关干部和战斗部队安排生产任务,要求凡在一个地区工

作、战斗一年以上的机关干部和战斗部队,需保证自给 2 至 3 个月的粮食和蔬菜,完不成任务的自己采野菜、树叶做代食品,超额完成任务的按比例分红。广大机关干部和战斗部队指战员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积极开荒种地。县委机关干部在邢家庄村西北种了 20 多亩地,县委书记王英(肖英)亲自拉犁耕种,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县交通站 7 位交通员在邢盘章带领下,开垦 10 亩荒地,收成达 3000 多斤,除满足 7 个人 3 个月的口粮外,还上缴 2000 多斤。机关、部队的生产自救运动,不仅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减轻了人民群众的经济负担,还密切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干群关系和官兵关系,促进了生产自救运动的蓬勃发展。

县抗日政府还不断组织县抗日大队和民兵袭击敌人的抢粮队和运粮队。1943 年春,县大队在陈家湾一带伏击了日军的运粮车队,夺回粮食 1 万多斤。到 1944 年初,抗日军民终于渡过了严重的灾荒,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六节 输送抗日干部,保护抗日首脑

抗日战争时期,广宗县除了牵制和打击日伪军外,还为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干部。其中担任过冀南区领导的

有乔晓光、常中方等,担任过冀南四专区领导的有肖一舟、王含馥、王祝光、吕克仁、吕金简、张箕南、张栖皋、贺德利等,到外地担任县委书记或抗日县长的有肖一舟、李良田、任光亚、王魁朝、赵炳图、梁宝森、张志善等,输送到延安的有靳德玉、张连英、韩黎等。

抗日战争时期,广宗县属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是八路军 129 师及所属部队首脑机关所在地,冀南区、冀南四专区的党、政、军、群机关曾长期设在广宗,刘伯承、徐向前、陈赓、王新亭、许世友、杨秀峰、宋任穷、王任重、王光华、李菁玉、徐深吉等 129 师首长和冀南区领导人曾长期在广宗生活、工作,广宗抗日军民担负着保卫抗日首脑机关和首长安全的神圣职责。为此,中共广宗县委、县抗日政府在领导广宗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广泛建立红色堡垒户和红色据点村,要求每个干部必须建立二三个红色堡垒户;要求红色据点村做到:模范执行抗日政府的政策、法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缴枪、不供人,保护党的机关和干部,保守机密,保证不在本村发生任何问题。开展建立红色堡垒户和红色据点运动后,广宗县成为冀南抗日的大后方,确保了首脑机关和首长的安全。

1938 年 5 月,杨秀峰、杨克冰率部进驻广宗县后,其驻地后平台村的自卫队员站岗放哨,盘查可疑人员,保证

了他们的人身安全。11月,129师指挥机关转移至柏城村后,柏城村党支部发动民兵开挖了7条总长300米的地道,既方便了刘伯承、徐向前、李达等首长的工作,又保证了他们的安全。1941年秋,冀南人民武装抗日(筹备)委员会总会主任李尔重在槐窝村做征兵工作时,一股日伪军突然闯进村内,李尔重快步走进堡垒户栗国争家,李尔重刚到院内,日伪军就进了门口,栗母机智地说:“我的儿啊,你来得正好,老娘的水缸都冒烟了,你还不赶紧给俺挑水去!”李尔重挑起水桶大步走向村外,顺利脱险。后来李尔重又来到槐窝村养伤,村党支部派民兵吴存成送水送饭,悉心照料,直到伤愈归队。冀南行署转移到槐窝村后,为了方便宋任穷主任开展工作,堡垒户杨永堂的母亲主动承担起照顾宋任穷小女儿宋琴的工作,杨母视宋琴如同己出,使宋琴安全地度过童年。1942年6月,县抗日政府代理县长解方,在王常相村突遭日伪军的包围,五区干部张玉奎(王常相人)为掩护解方而被捕,后来被敌人杀害于县城。1942年春节,县委在北李庄总结工作,大年初一拂晓突遭巨鹿县林家庄据点的日伪军的包围,村党支部书记李俊乾迅速将县委干部隐蔽在堡垒户家中。日伪军逼着乡亲们把八路军交出来,见没一个人吭声,敌人便将模范班长李元善拉出来,让他指认八路军和共产党员,他一声不吭,日伪军用烧红的铁条烫他,他咬

紧牙关说：“这里没有八路军、共产党！”鬼子端起刺刀向他胸部刺去，顿时鲜血直流，后来敌人又把他拉到村外逼问，终一无所获。日军对村自卫团长李怀群进行拷打，李怀群大义凛然地说：“这里没有八路军、共产党，要枪也没有，要命有一条！”敌人见他不屈服，向他头顶刺了一刀，顿时血流满面。最后，敌人实在没有找到八路军、共产党，只得收兵。1943年6月15日，县委成员在高伏城高大娘家召开会议时，遭到60多个日伪军和宪兵队的包围，情况万分危急，高大娘的二儿子高洪魁刚把5名干部转移到地洞里，十几个宪兵就闯了进来，他们像疯狗一样翻箱倒柜、砸锅摔碗，将屋里屋外翻了个遍，两个宪兵还用刺刀顶住高洪魁的胸膛，逼问共产党藏在哪里，高洪魁临危不惧，坚定地回答：“我家没有共产党！”穷凶极恶的日伪宪兵举起枪托朝高洪魁头上砸去，顿时，鲜血如注。敌人又在高大娘身上打主意，先将高大娘毒打一顿，而后再嚎叫道：“不交出共产党，你全家都别想活！”高大娘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就是把我全家杀光，我也不交共产党！”高大娘的大儿子高洪恩闻声赶到后，厉声喝道：“你们凭什么毒打老百姓？我是共产党，要抓就抓我吧！”敌人将高洪恩抓到大街上，砍掉他的左肩示众，高洪恩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残暴的敌人向高洪恩连开三枪，将其杀害。

妇救会主任李清云利用自己家中的地道,多次掩护阎保身等县委领导。怀孕七个月的青年妇女杜景民为保护阎保身交给的四捆冀南票和抗日政府文件而身负重伤。北卫庄妇女贾香芝一人就掩护过抗日干部 100 余人次。广宗人民群众就是这样宁肯自己牺牲,也要保护领导干部的安全。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宗工作的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八路军主力部队营以上首长无一人被捕、牺牲。广宗人民为保卫抗战首脑机关和首长的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八章

开展攻势作战,夺取抗战胜利

第一节 大反攻前的国际国内形势

1943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都转入战略进攻,苏联红军对德作战取得巨大胜利,英美联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开辟了反法西斯第二战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和太平洋战争中耗尽人力物力,日益陷入困境。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加强对太平洋战场的防御和向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发动进攻,不断从华北战场抽调兵力,驻冀南地区之110师团调离,由新编师团接防,其实力相对减弱,战略上不得不将过去全面分割控制改为重点守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和日军的兵力不足,使日军士气低落,伪军、伪组织日益动摇不安,日伪矛盾不断加深。与此同时,抗日军民遵照中共中央“削弱日伪,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示,逐步从长期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转为向敌人发起攻势,以武装进攻消灭敌人与

政治瓦解敌伪相结合,双管齐下,使敌占区逐步缩小,解放区迅速扩大。解放区军民积极开展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蓬勃发展,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第二节 开展大生产运动,壮大抗日力量

1943年,县委领导人民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党政军民同甘共苦,战胜了灾荒,坚守了抗日根据地,但由于敌人经常不断地“扫荡”和掠夺,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为了给大反攻积蓄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壮大抗日力量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冀南区党委于1944年2月召开各地委、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会议确定了“以生产救灾为中心,发动与组织群众,密切党群关系,坚持对敌斗争,巩固发展自己,逐步恢复冀南元气”的工作方针。这一方针立即受到广宗县新老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拥护,党政军民齐动员,迅速开展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中,各级干部带头参加劳动,培养和树立劳动模范和劳动致富典型,政府积极扶植、鼓励和推行互助合作,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发动起来之后,政府又提倡精耕细作、选用良种和科学

种田,鼓励和帮助农民合伙打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鼓励开垦灾荒年荒废的土地,扩大耕地面积,对新开垦的耕地实行3年内无负担的优惠政策。上述政策,切合实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1944年秋后,抗日根据地第一次出现丰衣足食的景象。10月,县抗日政府在董里集召开群英大会,表彰了一批劳动模范,奖给劳动英雄王朝柱、田喜荣各1头牛和1块书有“劳动英雄”的木匾(见下图)。在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同时,手工业、副业也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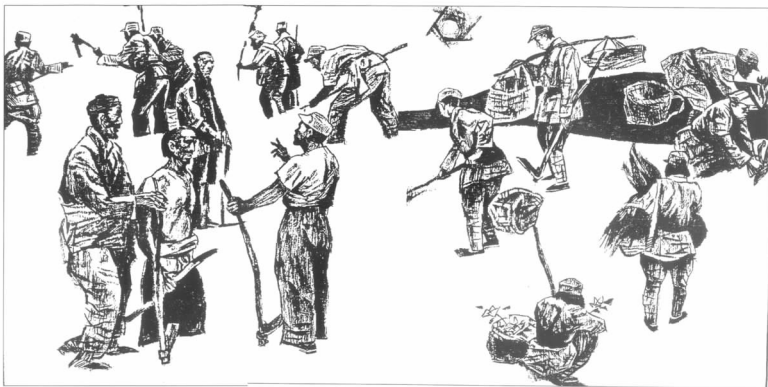


渐兴盛起来。在1943年的生产自救运动中,根据地纺织业和运输业在政府的帮助下有了初步发展。1944年的大生产运动中,政府继续鼓励和帮助农民发展手工业和副业生产,实行以工代赈的方法,政府按小组发给棉花,小组再分给各户或纺或织,参与者可赚取一定数量的加工费,一般织一匹布可得22斤谷子。这一政策既促进了纺织业的繁荣,又把农家妇女的视野引向社会,使她们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封建家庭的私有“财产”,而且也是社会

的一分子,极大地激发了妇女的积极性,出现了众多纺织英雄和互助模范。根据地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运输业的繁荣,政府仍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组织运输队,运输队或手推或肩扛把粮食、布匹运出,又把食盐等运到根据地。农业生产、手工业和副业相互促进,使根据地经济日益繁荣,有效地解决和改善了三民生活,壮大了抗日力量。

第三节 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减租减息

1941~1942年,广宗县抗日根据地因被敌人分割“蚕食”而大大缩小,大块地区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县委、县抗日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和要求。在根据地基本区



和接敌区开展了反资敌、反摊派相结合的减租减息运动,对于发动群众,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基本区、发展接敌区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特大灾荒的出现,减租减息工

作未能普遍开展起来。进入 1944 年,根据地不断扩大,环境相对稳定,特别是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广大群众对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也有了进一步的要求。据此,冀南各抗日根据地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彻底实行减租减息的有关指示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开展了比较彻底的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是调节农村租佃、借贷关系和减轻贫苦农民负担的重要政策,由于长期战争特别是 1943 年的严重灾荒,使许多贫苦农民流离失所,开展生产自救和大生产运动之后,外逃农民陆续返乡,但因失去土地和房屋导致生活没有着落,因灾荒而廉价典卖土地的农民希望重新得到土地。因此,要实行减租减息,必须首先解决失地农民的土地问题。

1944 年 8 月,冀南行署发出关于赎地的训令,明确规定:“凡 1943 年以来因生活所迫而典卖之土地,均可照原价赎回;所借地主富农粮款,可暂缓归还。”由于各地灾荒所造成的困难不同,而失地农民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为了不造成新的矛盾,顺利解决赎地问题,只对要求赎地者予以解决,并根据不同情况作了详细的规定:贫农典卖给中农以上者,或中农典卖给地主者,按原价赎回;贫农典卖给中农或中农典卖给富农者可进行调解,以增价赎回或只赎一半;同等阶层者不许赎地;凡典卖地户现有人均土地超过原买地户人均土地者,不许赎回。同时对因生活

所迫典卖房屋要求赎回的,也作了相应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广宗县各村以农会为主或由群众选出评议会,对赎地双方情况进行评议,按赎富不赎贫的原则确定后,再经县政府批准,由村干部负责执行。县委、县抗日政府还发动因灾荒卖掉妻子儿女的,带上户口簿政府公函,到买主所在地赎人。赎地、赎房及赎人运动的深入开展,使大批贫苦农民重新获得土地,且妻儿团圆,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生产生活的积极性,为开展减租减息铺平了道路。

鉴于冀鲁豫边区尚有广大地区未实行减租减息的现象,中共中央于1945年1月发出指示,要求从速结束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专心学习党的土地政策和太行区的减租及生产经验,立即开展大减租运动。在太行参加整风的冀南各级干部很快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3月3日,中共冀鲁豫分局召开原冀南区各地委书记联席会议,讨论研究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问题,分局领导要求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全面彻底实行减租减息,进一步削弱封建地主阶级,扶植基本群众,提高其政治经济地位。分局会议结束后,四地委又召开地县党员干部会议,会议传达贯彻了分局会议精神,学习了党的土地政策,明确了走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开展减租减息的工作方针,制定了具体方案和方法。按照上级要求,广宗县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认真贯彻大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广泛发动群

众清算地富“剥削账”。在贫雇农普遍被发动起来后,从以往减租减息情况入手,向前追算到1942年初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正式颁布减租减息法令之时,地主、债主违法拒减的租息和拒增的工资,包括因地主收回土地而失去租佃权或变更典当关系的,或不按租约而任意确定租额甚至没有租约的,都重新订立契约。并彻底实行“二五减租(租金减25%)”、“分半减息(月息减至1分半)”和“五一增资(雇工工资增加20%)”。

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使贫苦农民普遍获得了实际利益,提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和阶级觉悟,改变了农村阶级关系,广大农民要求翻身做主人的政治情绪迅速增长,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第四节 开展政治和军事整训运动

1944年7月,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在秋冬季利用间隙对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自卫队进行政治和军事整训,准备大反攻。12月5日,冀鲁豫军区召开全军区县大队长以上部队军事主官大会,以整风的精神,广泛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基层和群众意见,深刻检查部队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以及不关心部队建设、不注意提高部队素质等问题。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就整训主力部

队,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的方针、内容和方法制定了计划。

按照中央指示和军区、军分区的整训计划,广宗县对县区武装、民兵、自卫队的训练工作做出明确部署。首先组织县抗日游击大队干部、指战员认真学习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和《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指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各级领导干部都认真反省、检查自身存在的军阀主义倾向和教条主义作风,以诚恳虚心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然后在连队展开了民主“坦白”活动,干部公开自我检讨,战士对干部提出批评意见,干部和战士共同对部队中存在的不良作风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官兵互信、互爱、互尊,从而树立起良好的官兵关系。政治整训后期,普遍开展了互相帮助、互相提高和制订拥军爱民公约活动。此次政治整训以党的整风精神,检查并克服了部队中存在的不良作风,加强了纪律性,提高了官兵政治素质。接着又开展以军事训练为主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干部和战士、老兵与新兵之间互帮互学,针对自己军事技能的不足,苦练杀敌本领,部队的战斗力大幅度提高。

广大民兵和自卫队队员,积极参加政治教育和大练武活动。广宗县分别对民兵、自卫队员进行时事教育、阶

级教育和拥军拥政教育,肃清违反纪律、不愿劳动、脱离群众等各种不良思想和作风。要求民兵、自卫队员把作战和生产结合起来,积极配合部队作战,同时也要努力参加生产劳动。县武委会组织民兵开展大练武,学射击、练刺杀、演习爆破,增强杀敌的本领。

1945年7月1日,广宗县各级党组织都举行党员大会和群众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传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为大反攻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好准备。这次政治、军事整训和大练兵活动,是在准备大反攻的深厚气氛中开展的,广大指战员和民兵、自卫队员信心倍增,斗志昂扬,政治素质和军事技术得到空前提高,从思想上和斗争能力上为即将开始的大反攻做好了准备。

第五节 日伪军的垂死挣扎

1944年,侵华日军为了摆脱困境,对其兵力部署和战略战术作了重大调整,一方面日军为了应付太平洋战争,从华北抽调一部分兵力,对国民党正面战场发动进攻,造成其在华北的兵力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又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企图确保华北,并提出了死战华北的战略方针,继续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和“清剿”。1944年

4月初,日伪军先后出动3000多人,对冀南四分区邢济路以南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一天拂晓,马房营据点出动300人将广曲县委书记胡代耕、五区区委书记梁化平和11团的1个连包围在南营村(今属邱县),经过激烈战斗,抗日武装终于突出重围。在反“扫荡”斗争中,四分区部队和广曲县抗日游击大队,抓住敌人的薄弱环节予以反击,连克敌3处据点。4月4日,广宗、威县、南宫、巨鹿等县的千余名日伪军,将广宗县抗日游击大队和各区中队包围在张家庄,一中队奉命掩护县大队和各区中队转移,经过3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县大队和各区中队跳出包围圈,安全转移,担任掩护任务的一中队中队长肖太和等23名指战员壮烈牺牲,十几名战士弹尽被俘。1945年7月1日,驻扎广宗县城的日军头目俞木命令伪治安军对盐场村进行“清剿”,当场杀害无辜群众3人,并将38名青壮年押进监牢,限令盐场村在5天内交出小麦5万斤,否则将38名青壮年全部杀掉。第五天麦子交够了,敌人又借口没有送钱,将王明芹等5人杀害,史称“盐场惨案”。盐场惨案使盐场村7个家庭绝了香火、6名儿童成为孤儿,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又一滔天罪行。

第六节 展开全面反攻,迎来抗战胜利

1944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布1944年的工作方针,指出:“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坚持华北抗战,坚守抗日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迎接胜利。”随后广宗县、广曲县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和政治、军事整训运动,使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迅速壮大,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广宗县、广曲县分析了敌我对比情况,分别拟定了“积极围攻和夺取敌人深入根据地内部的孤立据点及所占城镇,向敌人的薄弱地区展开进攻,着力打击和消灭伪军,并相机夺取日伪军合守或单独守备的薄弱据点”的反攻计划。在对敌反攻作战中,四分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广大民兵、自卫队积极配合参加战斗,采取政治攻势与武装进攻相配合的方法,连克日伪军据点。5月26日,冀南军区所属部队解放了邱县全境,邢济路以南地区的抗战形势明显好转。7月,广宗县抗日游击大队先后攻克小辛庄和北葛村据点,俘虏伪军30余人。8月,广曲(联合)县并入邱县,经过重新整编的邱县抗日游击大队开赴邢济路附近活动。9月,广宗县大队在施红龙村伏击了由县城增援红龙的日伪军,打死、打伤日伪军多

人。10月,广宗县大队配合四分区11团奇袭了核桃园据点,击毙守敌5名,俘虏120余人。同月,广宗县大队还在西召伏击了日伪军的抢粮队。11月,邱县抗日游击大队攻克了孙家庄据点,击毙伪军1人,生俘23人。同月,广宗县大队和平乡县大队在广宗、平乡交界地带联合作战,击毙伪军小队长以下8人。经过1944年下半年的反攻作战,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彻底打破了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长期分割与封锁,迫使日伪军躲进少数据点和县城,不敢轻易出犯,解放区迅速扩大,进一步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的热情和信念。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巨大胜利。4月,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展开全面进攻。5月2日攻克柏林,宣告了法西斯德国的彻底灭亡。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陆续对敌人开展局部反攻,收复大片国土,日伪军被迫退至铁路、公路上的少数据点,各地伪军、伪政府及其他伪组织越来越惶恐不安,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已经来临。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进军,国内抗日军民积极准备大反攻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

理论,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大会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为大反攻和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好准备。中共七大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1945年5月,在抗日军民的强大压力下,李怀据点的日伪军放弃据点逃往县城,件只据点的伪军在逃往县城的途中被八路军聚歼。5月28日,张葛据点的日伪军逃入城内。5月29日,新立村据点的伪治安军逃到马房营。6月5日,霍城寨的日伪军逃回城内。6月10日,红龙据点的伪军逃回城内。6月12日,韩葫芦、赵葫芦的日伪军逃回城内。6月13日,塘疃的日伪军撤退到城内;盐场据点的伪军投降。6月中旬,马房营据点的伪治安军逃到威县。为了尽快消灭冀南境内的日伪军,6月20日,冀南军区成立了以王宏坤为司令员的冀南作战指挥部,统一指挥冀南各部实施反攻。6月21日,邱县抗日游击大队在东铺以西的邢济路两侧,伏击了日军的车队,击毙日军11人,烧毁敌汽车3辆,缴获档案1箱、电台1部、步枪6支、子弹700发、防毒面具40具、军衣300件、伪币9万元。6月29日,大三周的伪军逃回城内。7月25日,大柏社据

点的日伪军乘夜色潜回县城。7月26日,中、英、美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时广宗县抗日军民配合冀南第四军分区11团向县城内的日伪军发起猛烈攻势,盘踞广宗县城6年5个月又23天的侵华日军闻警弃城,残余伪军向抗日军民缴械投降,伪县公署土崩瓦解,县抗日政府接收政权,广宗全境获得解放,广宗历史揭开新的篇章。

第七节 接管县城城防,追歼逃亡之敌

为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培养接管城市的领导干部,1945年7月初,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对辖区内的领导干部进行了集中培训。下旬,中共广宗县委在董里集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的指示,研究部署接管县城的工作,会议决定由县长孙云英具体领导接管工作。为确保接管工作有条不紊,会议还决定设立6个接管小组,其中宣传组负责组织县立高小学生和知识青年宣传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是对伪军政警宪人员的政策;财政组负责接管伪政府的财政档案、报表、地亩册籍、粮食和其他物资;民政组负责接管伪政府的民政档案,以及进城后的民政、抚恤工作;教育组负责接管学校;公安组负责接管伪特务队、伪宪兵队、伪警察大队的档案

册籍、军火物资以及接受伪军警宪人员的自首;事务组负责清理伪政府各机关单位的公用物品。上述6个接管组分别由魏嗣哲、马德全、李均、吴涛、吕忠、张子棋担任组长。7月25日,县抗日政府获悉城内守敌强征百余辆大车准备逃跑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县抗日游击大队及接管人员进入南葛村整装待命。7月26日凌晨,副大队长王庆寅向县大队指战员下达了攻城命令,要求全体指战员不怕牺牲,坚决消灭一切拒降之敌。与此同时,冀南四分区11团在漳河大桥伏击了从广宗县城仓惶溃逃南和的敌人。拂晓,县大队、公安队和5个连的民兵开进县城,各接管组随部队一同进城,按事前安排和分工展开工作。残余伪军向抗日政府投降,8名伪警察向公安局自首。县抗日政府顺利接管了政权,县城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县抗日政府在旧县衙前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抗战胜利。广宗人民历经六年半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胜利结束。

1945年7月26日,逃亡南和的广宗之敌,在窜入南和县城后,被改编为广宗保安团(团长高文轩),负责把守南和县城的东城及南北城门。负隅顽抗的南和守敌强迫城关群众抢修城防工事,在城楼上修筑了高层炮楼,在城墙拐角处筑起16座碉堡,平均200米就有一座,在城墙基处还挖有掩体穴,形成多方位立体火力发射点。

为了尽快消灭残敌、解放南和,冀南四分区调集广

宗、平乡、威县、南和 4 县的地方武装及分区部分部队共计 1500 余人,组成了以胡代耕(原广曲县委书记)为团长的民兵团,下设 4 个营,来自广宗县的地方武装被编为第二营(又称广宗营)。9 月 21 日,民兵团集结于大东韩、小东韩、马庄一带村庄待命。22 日晚,广宗营和第一营攻占了南和西关、南关、北弯和杨桥,完成了对南门和西门的包围。27 日晨,城内守敌近 4000 人集中所有炮火疯狂向南关和西关的我军阵地冲击。我攻城部队为避敌锋芒,减少伤亡,全部撤出阵地,敌人乘我攻城部队转移之机,仓惶向邢台方向逃窜,途中闻得邢台已于 24 日被八路军攻占的消息后,军心立刻大乱,3000 余名伪军政人员及其家眷顷刻间作鸟兽散。残余敌人在逃亡临洺关的途中,又被广宗营和南和县大队一中队堵截于沙河县高村附近,经过激烈战斗,打死打伤敌军 200 余名,俘虏敌军官兵 200 余名、伪军政人员 100 余名,缴获机枪 8 挺、步枪 300 余支、子弹 10000 多发,南和全境宣告解放。在追歼残敌和解放南和县的战斗中,广宗营因作战勇敢,受到冀南四分区的通报表扬。

南和县城解放后,国民党广宗县党部书记长高作佩(高家庄人)等在石门(石家庄)组建了国民党流亡党部和流亡政府,网罗伪顽分子组建“同乡会”、“复员协进委员会”、“人民保障委员会”、“义勇还乡队”、“政工队”、

“锄奸工作组”、“妇女会”和“农会”,通过上述组织募集经费,保障流亡人员的生活所需,先后派员 29 人次秘密潜回广宗,拉拢土改中的被斗户,阴谋暗杀革命干部。高作佩等还在石门火车站、旅馆盘查、指认、逮捕广宗县赴石或路经石门的中共党员、干部和群众 11 人,其中,有 10 人被杀害。石家庄解放后,县流亡党部和流亡政府主要成员大部被抓获,基本肃清了残余反动势力。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广宗县各级党组织由小到大,逐步建立健全,党组织与广大人民群众生死与共,使党的形象牢牢树立在人民心中,大批优秀党员和干部在抗日斗争中成长起来,成为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广宗县地方党组织带领全县人民所进行的敌后抗日斗争,是整个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广宗县党组织和广宗人民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卓越贡献。

第九章

保卫胜利果实,开展和平建设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这个胜利,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和中国的政治形势。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势力受到严重削弱;社会主义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并在战后迅速地进行了经济恢复工作;在东欧和亚洲相继出现了许多人民民主国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亚、非、拉殖民地附属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这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国内,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已经拥有人口近1亿、军队120余万和民兵220万人;全国党员人数增加到120万以上;国统区内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等民主力量有很大发展,并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联系。这样就汇成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洪流,为革命的进一步

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妄图在抗战结束后恢复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持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此,在日本刚作了投降的表示后,蒋介石立即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相反却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同时又命令日伪军“维持治安”,等待国军收编。他们疯狂地抢夺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并积极准备内战,以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美国为了控制中国,积极扶植国民党政权。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愿望,以最大的努力避免内战,明确提出了“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立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的政治主张,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同时要求各解放区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把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在一切新解放区,一律实行减租减息,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迅速确立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基础;大力发展生产,保证军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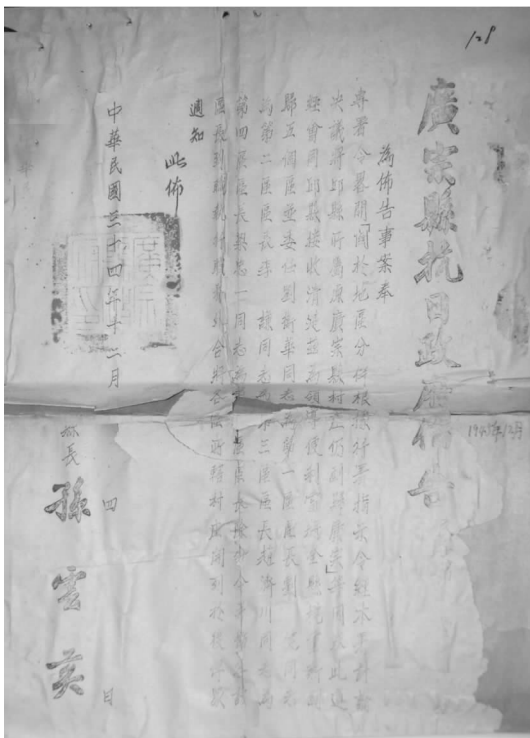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百废待兴,国民党逆潮流而动,准备沿平汉线北犯,冀南地区又成为反对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前沿阵地。面对上述形势和任务,中共广

宗县委、县民主政府认真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及时带领全县人民投入到保卫胜利果实,争取民主和平和生产建设的各项斗争之中。

第二节 调整行政区划,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抗日战争期间,邢济路(今邢临路)以南的广宗县所

属 29 个村,曾划归广曲(联合)县辖。1944 年 8 月,原广宗县所属 29 个村随广曲县并入邱县。1945 年 11 月 2 日,根据冀南行署的决定,四专署下发了《关于将邱县所属原广宗县所属村庄仍划归广宗县》的通知,随后,广宗、曲周和邱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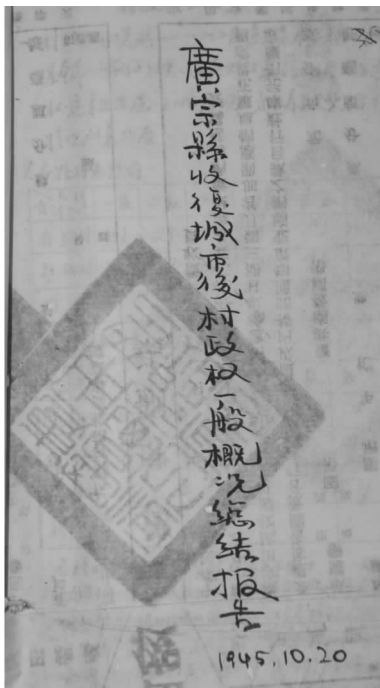


县政府关于调整行政区划的布告

进行了友好协商,决定除将原广宗所属 29 个村还属广宗外,还将原曲周县所属之陈家庄(今南陈庄)、杨漳逮、南淤疃、北淤疃 4 个村庄划归广宗县辖,至此,广宗县辖 170 个行政村(185 个自然村)。1945 年 12 月 4 日,县长孙云英分别签署县政府通令和县政府布告,宣布将广宗县 170 个行政村重新划分为 5 个区,其中,张尹村、张魏、件只及以北之村庄为第一区,区委、区公所驻件只;陈家湾、大柏社、前清村、徐家庄、谷常相、王常相、陈家庄及以北之村庄为第二区,区委、区公所驻北苏;小固堡及以北和贺家庄、洪家庄、姚家庄、周家庄、大王村、小王村、周田庄、西牛里庄(含)以东之村庄为第三区,区委、区公所驻盐场;侯寨、赵家寨、东安、西安及以北和刘全寨、李家庄、夏家庄、白刘庄(含)以西之村庄为第四区,区委、区公所驻城内;荆家寨、北塘疃、孝路、大三周及以南的村庄为第五区,区委、区公所驻高家庄。同时,县委、县政府还分别委任了区委书记、区长。张光远、刘卫华分别任一区书记、区长,梁化平、刘健分别任二区书记、区长,乔金生、李谦分别任三区书记、区长,王新月、赵济川分别任四区书记、区长,郎守荣、梁忠一分别任五区书记、区长。

经过调整,一区有 30 个行政村(31 个自然村)、二区有 27 个行政村(29 个自然村)、三区有 38 个行政村(42 个自然村)、四区有 33 个行政村(40 个自然村)、五区有

42 个行政村(43 个自然村)。村级政权共分为 5 类,其中,一、二、三、四、五区分别有 27、6、10、11 和 1 个政权真正掌握在贫农手里,服从民主政府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工作积极,能按时完成任务,且有与封建顽固势力作斗争的勇气,此类村庄占 32%;各区分别有 1、19、22、7 和 10 个村级政权主要掌握在中农手里,他们不了解党的政策,对工作持支应态度,对区干部持奉迎态度,此类村庄占 34%;各区分别有 2、2、6、8 和 31 个村级政权为地主封建势力直接或间接掌握,村干部工作消极,对抗属非常冷淡,此类村庄占 28%;四区有 7 个村庄的政权为新贵所掌握,这些人重感情,讲义气,但对群众持压制态度;城内政权长期由地主富农和豪绅掌握,收复县城后,他们纷纷潜逃,留下几个甲长支应工作。



根据上述情况,县委、县政府在完成行政区划调整后,立即对基层政权进行改造,制定了“培养扶植进步的、教育新贵的、改造中间的、

打击顽固的”方针。在改造方式上,北半部着重整顿、巩固;南半部着重在群运中改造;在新解放区则实行民选;在县城实行邻闾制,成立镇公所,设镇长 1 人,城内四街各选举 1 名副镇长,分工领导各街工作。1945 年底,广宗县完成了对 170 个行政村村级政权的改造,建立健全了村级政权。通过对基层政权组织的改造,推动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解放区各项建设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

第三节 争取民主和平 选举国大代表

1946 年 3 月,根据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解放区各地积极开展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活动,按照上级要求,各选区从专署到县、区、村自上而下都成立了选举委员会。为迅速完成选举,县以下机关暂时停止了其他一切工作,各级干部全力以赴投入到选举的宣传和动员工作中去。广宗县通过召开各种形式的干部会、群众会,使选举工作家喻户晓。此次选举除汉奸敌伪人员、被判刑或被通缉者和精神病患者外,不分阶级、阶层、职业、性别,无论民族和宗教信仰,凡年满 20 周岁者均有选举权,年满 25 周岁者均有被选举权。选举过程中,全县人们群众表现出空前的热情,90% 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选民们大都选举县区村干部、劳动模范等作为自己的代表;人民代表又纷

纷推选抗战有功、能代表人民利益、能代表人民意志和意愿的各级首长为候选国大代表。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3月中旬,广宗县选举乔晓光、范若一为候选国大代表,并上报四专署。4月10日,河北第四选区举行开票大会,杨秀峰、李菁玉、范若一、刘润秋等当选正式代表。由于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中共代表团于4月22日发表声明,拒绝参加国民政府及国民代表大会,解放区人民选举的国大代表没有出席国民大会,但此次选举作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民主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充分体现了解放区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表达了广大人民对实现和平民主的强烈愿望。

第四节 开展反奸清算运动

抗战胜利后,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清算那些在抗战期间凭借日军势力作恶多端的汉奸、特务、叛徒和伪军、警、宪分子的罪行。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中共广宗县委在冀南区党委和四地委的领导下,于1945年冬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部署反奸清算斗争工作。

为了取得经验,县委要求每个区选一个村进行试点,并把有关县、区干部编组到试点村,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通过对知情人、受害人或其家属子女座谈,逐一核对

抗战期间县敌工部“生死簿”上记载的内容,兑现“黑红点”。县委在认真总结试点村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反奸清算的具体政策:对悔过自首和积极坦白交待者从宽;对抗拒隐瞒者从严;对罪大恶极者先由群众大会公审,再交县民主政府依法惩处;对敲诈勒索群众财物者,除勒令其退赔外,视其情节轻重进行适当斗争,或交政府处理;对打骂群众者,勒令其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对曾向抗日军民提供过情报或对抗战有功者,要予以保护,将功折罪。

随后,县民主政府将汉奸叛徒名单印发各村,让群众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进行讨论,根据群众意见将在押汉奸、叛徒、特务按其罪行大小及犯罪危害地区,分别交给有关区、村,在县区干部指导下召开公审大会,由群众公审处理。1946年8月12日,县民主政府在件只村召开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将大叛徒赵一送上审判台,当代理县长吴之汉宣布赵一的十大罪状,并宣布将赵一押赴刑场立即枪决的决定后,全场群众异口同声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为了彻底清除敌伪残余势力,县委还组织了以公安干部和民兵为主的追查小组,对潜逃在外地的敌伪人员进行跟踪追查。1947年11月,县公安局长带领30名民兵和公安干部赴石家庄,将潜逃在石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抓捕并押解回县。此后,在“有苦诉苦,有冤伸冤,杀人者

偿命,欠债者还钱”等口号下,群众性的诉苦、复仇、反奸清算运动普遍开展起来。

通过反奸清算运动,彻底铲除了敌伪残余势力,摧毁了国民党特务分子活动的基础,使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群众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的周围。

第五节 大力发展解放区的经济

经过八年战争,解放区疮痍满目,百业待举,百废待兴。战争的负担,敌人的摧残,加之连年水旱蝗灾,民力已消耗殆尽,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元气,重建家园。但是,由于内战的严重局势,人民的负担不但未能减轻,反而比以前更重;由于解放区财政的空前困难,部队的生活待遇也很难提高到一般水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恢复经济,克服财政困难,使解放区有足够的力量来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共中央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中指出:“在1946年内,全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的生产,务使有一个新的发展”,“在不妨碍战争、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部队、机关、学校仍要适当地参加生产,才能改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并把减租和生产的重要性提高到将最后决定解放区政治军事斗争胜负的高度。

通过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运动,解放区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力获得了初步解放,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但由于缺乏牲畜、农具等,生产能力急需扶持。为了支持农业生产,扶植发展手工业、运输业,边区政府给冀南区拨付贷款3亿元,冀南四专署专门作出对贷款工作的指示,结合清理旧贷,要求于1946年3月底前将贷款发放完毕。经过层层分解,广宗县于旧历二月前将贷款发放到急需扶持的贫苦农民和城镇贫民手中,同时还扶持了部分因灾返贫的中农。

冀南区还确定了:“恢复发展农工商业,要以农业为主,工业为农业及农民的需求服务,商业要为工农业服务”的生产方针。要求增加农具、牲畜,发展养殖,发展互助合作,奖励劳动英雄,扩大耕地面积,消灭熟荒。规定凡地主富农无力耕种的熟荒,由贫苦农民耕种,2年内不缴租、不纳负担,保证佃权5年;地主富农无力开垦的生荒,由贫苦农民开垦,5年不缴租、不纳负担,保证10年佃权。冀南行署还号召抗战以来因躲避战乱、逃荒外出和被迫当伪军的冀南人民回乡参加大生产运动。地委主要领导乔晓光、程玉林等深入到广宗农村,检查和督促工作,帮助群众制定生产计划。广宗县还积极组织农民群众实行拨工换工,克服牲畜、农具和劳力不足的困难。在参军支前的热潮中,为了更好地支援自卫战争,广宗县积

极组织大生产运动。县委号召党员带领群众,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互助。在县委的号召下,全县不少村庄组织了“配套组”、“换工组”、“互帮组”,缓解了缺牲畜、少农具、劳力不足的矛盾。董里集村在张大三的带动下组织配套组、换工组 100 余个,1947 年的夏季获得了好收成,董里集村的小麦亩产达到 100 公斤。为了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夺取全年的农业大丰收,麦收以后,县委决定在南北两片召开生产模范评比大会,大会评选出王朝柱(前旧店人)、田喜荣(田家屯人)为全县特等劳动模范,还评选出 25 个先进村党支部和生产模范村,并授予了锦旗。评比大会的召开,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生产热情,连没有耕地的机关干部也在领导同志的带领下,平掉旧城墙,种瓜种菜,同样获得了丰收。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县委还号召人民群众各尽所能,发展手工业,搞好副业,有条件的地方搞好商业、饮食业和运输业。县里建立了酿酒厂、鞭炮厂、磨粉厂、饲养场、农具厂等,土布纺织等民间传统手工业有了较快发展。县委还要求各区、村组织好烈属、抗属、军属的代耕工作。分得土地、翻身作主人的农民,在大生产运动中充分显示出的生产热情,无疑是对战争前线的巨大支援。

1946 年上半年,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按照边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广宗县还开展了大清理运动,通过清查

积存粮款,清理重要资财、装备,核实人数,据实领支,纠正不按制度支粮吃粮等问题,特别是从领导上和制度上检查与整顿村级财政,纠正了村级特权的浪费现象。通过财政大清理,有效地防止了资产的浪费和流失,补充了财政上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

为了发展商业经济,繁荣市场,1946年8月,县委、县政府派李警湘在董里集村筹办商店,供应军民急需的日用品,县财政拨付冀南票5万元(折合人民币5元),李警湘又借来小麦400斤,请本村谷老志、王老云两位糕点师傅打糕点、月饼,中秋节前开业,故取名“中秋商店”。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李警湘在临清开设中秋货栈,与冀南行署设在临清的瑞华银行建立经营信贷关系,同时还与冀南行署设在南宫的瑞丰商店、一元商店和威县的义合商店建立业务关系。县、区干部也纷纷以个人名义为商店筹措资金,随着经营范围和服务项目的扩大,中秋商店陆续增设了日杂百货批发零售部、粮食油脂油料购销调剂部等。商店还购来硫化色、硫化碱供军民染布用,大量农副产品通过中秋商店得到及时交换。中秋商店还大量收购军用土布,为南下北上部队创造了物质条件。1949年,中秋商店迁入城内。中秋商店的建立,疏通了城乡商品交流渠道,繁荣了解放区的经济,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为了领导人民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生产建设和有组

织有计划地进行生产,1949年1月,县委、县民主政府组建了生产推进社,负责领导与扶持群众生产、供应生产资料、推销农产品。生产推进社的成立,解决了群众生产中的实际困难,推动了农业生产,繁荣了农村经济,为党领导人民群众实现劳动致富奠定了组织基础。

第六节 大力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

抗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在全县重要村镇设立新民补习学校21所,“招收”学员460人,强行在小学三年级开始开设日语课。1940年,广宗县有4所小学开设了日语课,配备日语教员6人,其中日本籍1人、中国籍5人。学过日语的学生共有434人,其中,男生336人、女生98人。抗战胜利后,为了清除奴化教育的影响,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成为解放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县委、县民主政府于1945年秋恢复建立了县、区、村的教育机构,并选拔了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经过短期培训后,充实到教师队伍中。1945年底,县委、县民主政府召开了各区文教助理工作会议,研究了初级小学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会议决定:(1)每区至少建立1所完全小学,有条件的还可适当多办一些;(2)以区为单位建立学区,每个区建立3~5个中心

小学,由教师民主推荐校长;(3)动员适龄儿童普遍入校学习;(4)县文教科要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由各学区负责检查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教育制度的逐步完善,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1946年初,全县有高级小学6所、初级小学发展到130余所,教师达到156人。学校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使大批适龄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为即将开始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储备了人才。

为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县委、县民主政府还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冬学”活动,对凡有学习文化要求的农民,不分男女老幼,均安排到补习班或夜校学习。到1946年春,全县文化补习班和夜校达到94处(所),参加学习的农民群众有14800多人。

1947年5月,在县城北街第一高小附设师范班1个,招收学生50人,次年底未到毕业时即抽调43人担任县、区干部,其余7人分配到各学校担任教师,同时还增建模范小学5所。是年,全县小学达到149所、中心小学15所,小学在校生13100人,教师245人。东董里小学在学制上有全日制、半日制、隔日制,根据学生实际困难,该校还将学生分为抱孩组、纺花组、割草组、拾柴组等。到1949年秋,全县小学发展到155所,在校生达到16263人;高级小学发展到7所,在校生1100多人;全县教师队伍达到275人。

第十章

开展整党与土改， 支援全国解放战争

第一节 党组织的公开与整顿

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处在强大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为避免遭到破坏和摧残，不得已一直采取秘密的形式。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革命力量空前强大，革命形势需要党组织公开，以便更有力地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并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为此，中共冀南区党委于1946年3月决定，县委机关取消代号，由秘密转向公开。按照上级指示，基层组织的公开分三种情况依次开展，一是仅公开支部书记，其他党员暂不公开；二是公开部分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三是支部所有党员全部公开。党的公开过程对党的基层组织是一次重要的整顿和提高的过程，对党员干部也是一次重要的再教育。党组织的公开，促进了党员的发展，到年底，全县党员发展到3700多人。1948年1月，广宗

县 100 多名党员参加了冀南四地委组织的整党活动,随着整党活动在全县展开,清除了一批不合格党员,保持了党组织的纯洁。同年 12 月,中共冀南区党委作出《关于公开建党工作的决定》,广宗县党组织的活动和党的关系完全公开。党组织的公开,是适应新形势的一项重要举措,它不仅对党密切联系群众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大大便利了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把党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这在党确立了公开的领导地位的新时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公开的趋势下,促进了党的建设,到 1949 年,全县党支部发展到 183 个,党员人数达到 3765 人。

第二节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于 1946 年 5 月 4 日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提出了解决解放区土地问题的原则。6 月,中共冀南区党委召开地、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同时做出了具体规定。要求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农民,征收开明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坚决执行团结中农的政策,不得损害中农的利益;放手发动群众,满足广大贫农和雇农的土地要求。冀南区党委 6 月会议以后,中共广宗县委

决定,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分工到区,由县、区干部组成工作组,各区选一个村为土改试点,划清恶霸地主、开明地主、一般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的界限。

1946年8月,广宗县在件只镇开展土改试点。件只镇时有450户,2200多口人,地主富农40多户。在斗争会上,对恶霸地主郭仲印进行了说理斗争,用事实控诉其巧取豪夺、欺压盘剥贫苦农民、逼死人命的罪行。对郭仲印的斗争会先后开了5次,期间曾出现了捆绑吊打等过火行为,经过工作队和党支部的工作,过火行为得到了纠正。斗争会初期只有几百人参加,到第5次斗争会时,参加人数达4000多人。一些参加了斗争会的地主富农主动向贫苦农民赔礼、请罪,要求政府宽大处理。件只镇的土改试点进行了2个多月,最后经过群众讨论,决定对郭仲印除按规定留下其自耕土地和自住房屋外,其余的土地、房产、浮财全部分给贫苦农民。对那些主动在斗争会上认罪的地主,除给他们自耕土地外,不动其房产。对开明地主或抗日干部家属是地主的,除保留其自耕土地和不动房产外,在斗争方式上有所区别。对富农要求他们主动献田,对富裕中农除自愿献田不拒外,一律不动他们的房产和土地。

1946年冬,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全县展开。通过土改,全县54万亩耕地,除给地主、富农及其子

弟 10600 多人留下 3 万多亩和中农及其子弟 3 万人留下 15 万亩外,7 万多贫雇农共分得耕地 35 万亩,每人最少分得 3 亩,多者达到 8 亩。千百年来农民群众“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变成了现实。

1948 年 10 月,全县开展了土地复查、划阶级(定成分)工作。11 月,开始向农民发放土地证,土改运动结束。

第三节 壮大民兵队伍,开赴境外作战

毛泽东主席在《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发出“各地民兵必须按目前条件,重新组织”的重要指示后,中共广宗县委把壮大民兵队伍作为对内战“有所准备”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结合“清算”、“复仇”和“减租”等群众运动,对民兵队伍进行了整顿,对民兵干部和民兵的政治情况进行了严格审查,清除了混入民兵队伍中的地主、富农分子,同时吸收了一批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使雇农、贫农和下中农成分的民兵在民兵队伍中占有绝对优势。同时,广宗县还有计划地吸收了部分青年妇女参加民兵。在男民兵大量参军支前和劳动力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广宗县的民兵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由原来的 600 多人增加到 3200 多人。1946 年下半年,

广宗县组建了民兵团,各区陆续组建了民兵连。在对民兵组织的整顿中,广宗县委还分别对民兵进行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为主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为谁当兵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民兵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



1946年10月10日,广宗等8个县的978名民兵组成9个连队的民兵团,由县区干部带队,赴元氏配合部队作战。到达元氏的第二天,民兵团即在岗汪村同贾村据点之敌交战,毙敌5人、伤敌1人。第三天,又在段村西北与200余名敌人交战,经过2个小时的战斗,将敌人击退。民兵团连战连捷,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慰劳。到12月6日返回,历时两个月,参加大小战斗14次,毙伤敌人41人。民兵团的军事素质大大提高。

内战爆发后,冀鲁豫区成为内战的主要战场,部分民兵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并随主力部队开赴战争前线,保卫解放区的重任落在了留守民兵的肩上。为了提高留守民兵的作战能力,1946年10月下旬,广宗县武委会组织留

守民兵开展了冬季大练兵活动。通过大练兵,广大民兵基本上掌握了射击、投弹、爆破等技术和利用地形地物战术技能,不但军事素质大大提高,同时也提高了保卫胜利果实和武装自己的热情。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广宗民兵拥有的武器装备大量增加,据1947年9月统计,全县1966名留守民兵,拥有大枪255支、短枪170支、冲锋枪2支、盒子枪6把、单发78支、掷弹筒2个、手榴弹286枚。是年秋,100多名广宗县民兵组成广宗独立营,由营长董逊斋率领参加了解放临清的战役,在刘家洼战斗中,广宗独立营俘敌120名,在押送俘虏去聊城途中遭遇敌机轮番轰炸,三连文书壮烈牺牲,独立营克服重重困难终将俘虏押送至军区驻地。广宗民兵为解放临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四节 开展献金支前参军活动,支援解放战争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停战协议,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正式爆发。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全国掀起一个空前伟大的人民大革命。根据上级部署,中共广宗县委、县民主

政府相继发动了献金运动和支前参军运动。在献金运动中,全县人民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纷纷捐款捐粮捐物;工商界人士捐献了一大批鞋袜、毛巾、牙刷、牙粉、肥皂等日用品;第五区捐款 42 万元,仅有百户人家的北孝路村就捐款 12 万元;部分党员教师还自愿改为义务教员,把应得薪米全部捐献前线,直到解放战争胜利。



1946 年 8 月,广宗县组织 150 多名青壮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还组织了 480 多人、120 副担架,由李洪云带队开赴平汉线运送伤员。9 月中旬,广宗县又选送 132 名青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0 月,广宗县掀起参军热潮,先后有 1000 多名翻身农民报名参军,仅有 200 余人的赵伏城和南张葛村,各有 50 多人参军;三里庄村仅有 21 户,参军者达 17 人;300 多户的董里集村,原来已有

100 多户抗属,这次又有 18 人参军。10 月 19 日,五区在后旧店小区召开千人大会,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保卫家乡,动员会上涌现出母送子、妻送夫、叔送侄和兄弟共同报名参军的动人场景,劳动模范王朝柱等 108 名翻身农民强烈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仅后旧店一个村就有 20 名青年参军。秋季,广宗县还向前线送去两车(牛车)军鞋、3 万斤(市斤)皮棉。11 月,县民政部门负责人带着慰劳金和人民群众捐献的毛巾、肥皂、香烟、鞋袜、肉干等慰问品,赴前线慰问人民解放军。

1947 年 1 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南北策应打通平汉线的战略企图,广宗县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以县长为指挥长、以县委书记为政委、以武委会主任为主任的战时后方指挥部,负责统一战时后方治安的维持和检查整饬纪律、调运粮秣、组织担架运输、建立兵站等一切战时后方工作。在战时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县委机关、县民主政府各部门做好了撤离县城的准备,人民群众和民兵积极备战,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县委还专门召开扩军会议,研究部署选送优秀青年民兵参军支前事宜。3 月,由县政府秘书吴之汉(槐窝人)任大队长,带领广宗县支前大队 1000 多人、300 多副担架、100 多辆大车奔赴豫北前线,与振堂(新河)、巨鹿和平乡的支前民工,随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转战清丰、内黄等地,并参加了解放安阳的战斗。

此次支前历时 30 多天,受到冀南区前方战勤指挥部的传令嘉奖。11 月,由县委委员王新月(盐场人)和姜化民、董克璞带领 30 名民兵和公安局干部参加了解放石家庄的战斗。1948 年 4 月 18 日,县政府颁发《优待烈军属暂行办法》,提出“优抚做得好,军人士气高”的口号,规定了计算劳动力负担的办法,提高了烈军属的地位,激发了翻身农民参军的热情。5 月,由姜化民带领 1000 多名群众及民兵组成的支前大队,携带 150 多副担架奔赴冀鲁豫黄河沿岸自卫战争前线。此次支前历时 3 个月,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是年秋,广宗县完成织军布 4500 匹的任务。是年冬,冀南各地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参军运动,广宗、南宫、南和、平乡等 10 个县共有 15214 名青壮年参军,走向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场。太原战役打响后,冀南四专区组织了大批民工支前,广宗、南宫、南和、威县、宁南 5 个县出动大车 131 辆、牲口 262 头、车夫 262 人随二十兵团服务,在两个月的支前参战活动中,按规定要求两天运送一趟弹药,支前民工们却自愿加快步伐,三天运两趟,民工们吃苦耐劳和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参战部队,纷纷称赞他们:“不愧是老解放区的人。”

解放战争时期,广宗县先后有 4900 名民兵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支前的民兵达 3500 余人次,出动担架 2300 副,总计行程 1200 公里,为解放南和、邢台、临

清、馆陶、安阳、太原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五节 抽调干部南下,开辟和接管新区

1947年3月,晋冀鲁豫军区决定抽调地方党政干部随军南下,开辟大别山根据地。按照冀南区党委和四地委的指示,中共广宗县委抽调67名干部,由县武委会主任王润泽带队,于是年6月13日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横渡黄河挺进大别山。经过极其艰难的努力,冲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于7月底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帮助



县政府赠送给南下干部赵成普的木匾

大别山区的33个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同年9月,冀南区党委要求四地委组织第二批干部南下,开辟中原根据地。广宗县在297名报名参加南下的干部中,抽调以县委书记肖英为首的140多名干部组成一个中队,于9月22日

随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开辟桐柏根据地。1949年2月,根据冀南区党委和四地委的指示,广宗县又抽调100多名干部集中到董里,3月由县委书记孙云英带队与其他县的3000多名干部组成南下干部大队,南下江南开辟根据地。与此同时,在外地工作的50余名广宗籍干部,也加入到南下干部行列,为开辟中原和江南新解放区贡献了力量。

第六节 组织人民群众迎送四野过境南下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奉命南征准备渡江战役,四野部队先后于是年3月、4月和5月分3批共有13个军约20万人过境南下,为保证南下大军过境道路的畅通,冀南行政公署交通处下发了通知。根据通知要求,中共广宗县委成立了后勤指挥部,组织民兵和民工将(北)平大(名)公路加宽了三分之一,并加固了境内所有桥梁,还在沿线设立多处兵站,筹备粮草给养。广宗县还采取“家家为仓,户户为营”的措施,沿线两侧10公里以内的村庄,各家各户都备足小米、白面和草料,以备过境大军及时需用。县委宣传部还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制定了欢迎南下大军的26条标语,主要有:欢迎劳苦功高的东北人民解放军、欢迎东北人民解放军南

下解放全中国、欢迎东北大军帮助江南人民解放、我们要帮助东北人民解放军解决行军中的一切困难、向东北人民解放军致敬、拥护毛主席的八项和平条件、废除伪法统、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团结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

1949年
3月上旬至
5月中旬,广
宗县掀起迎
送南下大军
的热潮,平
大公路沿线



村庄搭起牌楼,张贴标语,打扫街道,腾屋号房。各村均成立了战勤委员会专门负责对过境大军的招待和供应。大军通过时,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所驻村庄干部群众热情慰问,送慰问袋、慰问信,妇女们为指战员缝洗衣帽鞋袜。5月18日,一批伤员过境广宗,三区的13个村组成1500人的慰问团,到北小东村伤员驻地进行慰问,南小东村慰劳鸡子儿980个、点心21斤,大王村送来鸡子儿858个、挂面20斤,南寺郭村送来鸡子儿146个、挂面20斤。城内各学校还停课一周,为过路伤员演出节目,或

送水、送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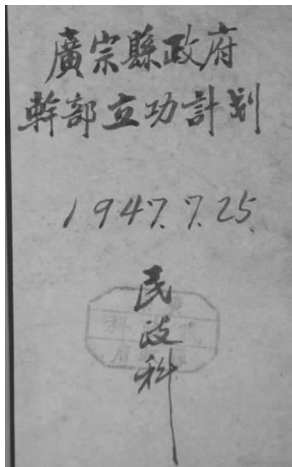
广宗人民群众的满腔热情,深深地感动了人民子弟兵,过境部队指挥机关提出“房东水缸里的水不满不走、房东的院落不干净不走、老百姓的损失不赔不走”的“三不走”要求。为减轻过境指战员的疲劳,沿途各村庄战勤委员会发动了“满缸”运动,要求人民群众在大军未到之前,先把自己水缸里的水挑满。

人民子弟兵过境广宗时,上演的“民拥军、军爱民”大剧,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指战员的战斗意志,增强了指战员“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广大指战员背井离乡南下解放全中国的革命精神,也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支援前线的革命热情。

第七节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迎接新中国成立

1947和1949年,广宗县分3批抽调300余名县、区、村干部南下北上,支援新解放区的建设,到1949年2月,县内三级干部仅有171人,组织的残缺和留守干部的素质、思想问题,严重制约着党组织的健全和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补足干部差额和提高干部水平是各级党委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解决干部队伍的思想问题,中共广宗县委根据冀南四地委的指示,一手抓

干部的调整配备,在数量上配齐干部名额;一手抓干部的轮训和学习,以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到1949年2月20日,县委选拔了248名土改积极分子和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模范,充实到干部队伍中。在基本补足干部缺额后,县委根据轮训计划,由县委常委轮流上党课,对干部分期分批进行培训。县委还通过召开基层干部代表会的方式,统一干部的思想,稳定干部的情绪。县委还利用春节后开春前的农闲时间,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活动,先后有353名党员干部参加了整党。整



党活动中,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冀南区党委《为实现1949年生产任务而奋斗的决议》等文件,通过学习,党员干部对工农业生产关系、城乡关系的发展前途有了初步认识,清除了“生产不用领导”的错误思想。从此,广宗县进入了有计划的生产阶段,各级党组织开始领导人民群众走“组织起来”的道路,

努力开展生产建设。

通过整党,进一步稳定了干部队伍,巩固了各级党的组织,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生产建设转移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9年3月25日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至北平。4月下旬至5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渡江战役胜利的同时,又先后解放了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国民党残余据点,华北地区除绥远西部外全部解放,整个华北由战争环境转入和平建设环境,为了便于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边区,恢复行省制。1949年7月12日,中共河北省委在保定组建,8月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在保定成立,全省下辖4个市和10个专区,包括广宗在内的原冀南四专区(1949年3月改称南宫专区)的11个县组成邢台专区,根据中共河北省委的决定,1949年8月成立中共邢台地方委员会,由此开始,广宗县地方党组织归属河北省邢台地区党委领导。这时,广宗县共有支部183个,党员3765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县人民群众隆重集会,热烈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同日,广宗县民主政府改称广宗县人民政府。

从1927年9月中共广宗县委建立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22年间,全县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锦绣河山收拾起,天下尽是主人公。”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和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劳动人民翻身成为主人。这是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由此开始,广宗县地方党组织在中共中央、中共河北省委和中共邢台地委的正确领导下,率领全县人民阔步迈向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征程。

附 录



广宗县(抗日)政府印 印模

附录一 大事记

1919 年

5 月,“五四”运动波及广宗,城内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散发进步书刊。

1923 年

夏,东张魏人张福堂在保定育德中学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4 年

秋,张福堂回广宗,向县高小教员张箕南及其同学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6 年

3 月,梁宝森在山西太谷铭贤中学由纪秀川、张维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 年

4 月,张箕南在邢台由王子青、刘玉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活动。

6 月 19 日,中共党员梁宝森、张箕南组织民间防匪组织大刀会数千人攻进县城。县长郭鸿逵逃匿,警察和警备队皆被缴械。

6 月,山西太谷县铭贤中学学生、共产党员梁宝森和张庆云遵照党的指示到广宗县开展活动。

9 月,中共顺直省委特派员王子青宣布成立中共广宗县委,梁宝森任中共广宗县委书记,负责广宗、威县、曲周 3 县的党务工作。

冬,梁宝森在东贺固发展李志明等 5 人为中共党员,并建立中共东贺固支部。

1928 年

春,梁宝森介绍曲周县人冀汇川(冀良俊)、陈河清、陈渭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曲周县特别支部。

1929 年

秋,东贺固农民协会成立。不久即收缴民团局和本村地主的 40 多条枪,并将地主村长赶下台。梁宝森与南

方的中共地方组织取得联系,东贺固成为安徽至北平交通线上的交通站。

年底,经梁宝森批准建立中共威县支部,由潘笑圃任书记。

1930 年

1 月,中共顺直省委指示直南党组织武装群众,发动游击战争,中心是邢台、广宗、大名、磁县。

国民党政府抓捕梁宝森,梁去北平,中共广宗县委中断。

1931 年

3 月,县立高小受邢台第四师范学校学潮的影响,在中共党员张玺、牛秀玲的鼓动下掀起学潮,迫使当局辞退不称职教员,撤换校长。

9 月下旬,县立高小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

1932 年

春,在巨鹿琉璃寺高小教书的中共党员栗曼晴回到槐窝村,发展党员数名;邢台省立十二中学学生、中共党员任永寿回到张尹村介绍张德庆等入党。

初冬,中共槐窝村支部成立。

1933 年

3~4月,中共南宫中心县委机关迁至广宗县槐窝村办公。

冬,槐窝村农民协会成立。

1934 年

秋,中共广宗县委恢复,郭森任书记。

1935 年

8月,中共广宗中心县委成立,郭森任书记,负责广宗、威县、巨鹿、南宫、邱县等地党的工作。

9月,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第五支队在广宗开展收枪分粮斗争。

11月,中共直南特委组织“直南农民游击战争”,广宗农民暴动形成高潮。

12月2日,农民暴动军事指挥王光华带领特务队,没收核桃园地主黄连房的枪支。6天后,又组织20多村1.2万人的“布袋队”,分掉黄家的余粮。

1936 年

1 月 13 日,国民党 29 军 1 个连包围东董里村,抓走中共党员及群众 9 人,中共党员孙元杰等遇难。

1 月 28 日,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在广宗县北李庄集会,宣布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刘子厚任师长。

2~3 月,国民党军队商震部 32 军和 29 军一部会同广宗县警察局、保安队多次“围剿”境内之中共组织,逮捕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 320 人,杀害 66 人。

4 月下旬,中共广宗中心县委书记李同安被捕,5 月 21 日英勇就义。广宗的党组织受到极大破坏,部分中共党员离开广宗。

1937 年

7 月,在中共冀南特委领导下,以 1935 年参加冀南暴动的农民为骨干,组成“八路军别动大队”,队员 300 余人,活动在广宗、南宫、威县交界处。

9 月,中共直南临时特委书记马国瑞到县,任命李警湘为中共广宗县北区区委书记。

11 月 3 日,中共直南临时特委马国瑞、冯化宣等在北李庄开会,研究发动群众,恢复党组织和建立抗日武装等

问题。

11月,广宗的中共组织成立“抗日防匪自卫团”,团长刘惠民。

11月,在中共冀南特委直接领导下,王含馥、刘铁之、赵一民、周东光等在广宗、南宫、巨鹿交界地带组建“冀南抗日联军”,该部队由参加冀南暴动的中共党员和游击队员组成。

1938年

1月10日,在柏社村附近,广宗和平乡两县的大刀会组织与准备攻打巨鹿保卫团的平乡县“天下抗日第一军”发生冲突,巨鹿保卫团闻讯前来堵杀,“抗日第一军”寡不敌众,连夜退回河古庙一带。

1月15日,陈再道率领八路军东进纵队经七斗店前往南宫,八路军主力第一次跨入广宗县境。

2月中旬,中共广(宗)威(县)中心县委成立,田甫航任书记。中共广威中心县委收编刘惠民、赵济川和赵玉贵的联防武装,建立“广宗县抗日游击大队”。

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宗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董里集高小成立。委员会由中共党员肖一舟、乔晓光、王建德和民主人士王拾风、马超凡、贾波涛等组成,肖一舟任主任。

3月19日,宋任穷率八路军129师骑兵团赴冀南,途经广宗县境。

3月30日,八路军129师骑兵团收复广宗县城。逮捕“维持会”两头目。

4月3日,骑兵团政委邓永耀在县城北门外召开群众大会,处决“维持会”两头目。县“维持会”解体,县大队驻县城。

5月7日,八路军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领的八路军平汉路东纵队由巨鹿去南宫,过境广宗。该纵队由129师769团、115师689团及曾国华支队组成。

5月,杨秀峰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冀西民训指导特派员之身份率冀西民训处和冀西游击队一部进驻广宗县城。

6月5日,中共广宗县委成立,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书记称“政委”,驻广宗县城。

6月,广宗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王抬风任县长。设民政、财政、司法、文教和武装等科。下辖3个区。

6月,抗日剧团——“火线剧社”成立。

7月7日,广宗县在件只召开“纪念抗战周年大会”,东进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到会讲话,并检阅各村自卫队。

7月,冀南抗日游击军区建立,共设5个军分区。广宗县属第四军分区,由八路军东进纵队第四支队兼。

8月14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广宗县属冀南第四专署。

9月,杨秀峰在广宗县城委任平乡县大刀会首领丁卜五为冀西游击队六支队队长。其麾下六七百名会员,被编为游击队员。

10月,县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及文化教育救国会相继成立。

11月15日,侵华日军独立混成旅第三旅团及114旅团各一部约3700人“扫荡”冀南。徐向前率129师指挥机关转移至柏城,129师在广宗以东、清河以西、南宫以南地带,开展了历时16天的反“扫荡”战斗。军民协力作战28次、毙俘敌600余人,迫使侵华日军撤出冀南中心地区。

11月16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迁至广宗县。

11月27日,冀南抗日干部学校校部迁至广宗县城内东街文庙。

11月底,第二期学员在件只开学,该期学员500余人,分4个大队。

1939年

1月18日,八路军129师386旅补充团进驻高家庄。

1月19日,陈赓、王新亭率领八路军129师386旅进

驻马房营,召开团级干部会议,拟定作战方案。

1月22日,386旅在马房营村召开团级干部会议,传达129师首长指示。许世友同志就任386旅副旅长。韩东山调任东进纵队副司令员。

1月24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件只召开第一次由各县抗日政府、民众团体和士绅代表计200多人参加的冀南行政座谈会,讨论建立民意机关,会议通过《冀南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大纲》,并决定由冀南各救国会负责筹备。

1月27日,陈再道率骑兵团、骑兵大队及青年纵队由南宫向马房营靠拢,129师首长命令上述部队由陈赓统一指挥。

1月30日,陈赓在马房营为司令部直属队干部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2月1日,八路军129师386旅补充团、115师344旅688团与曲周来犯之敌激战于马房营、燕张葛(今南张葛),击毁日军汽车两辆,击伤击毙侵华日军百余人。386旅伤亡120余人。

2月2日,陈赓到达常阜村,部署688团、补充团隐蔽在辛庄至南孝路之线,以配合陈再道部伏击由威县回曲周之日军。

2月3日,侵华日军占领广宗县城。“八路军工作

团”(即县委)和县抗日政府撤出县城。

2月23日,国民党军赵云祥部在刘家庄活埋八路军青年纵队及东进纵队工作人员11人。

6月,杨秀峰在北杨庄接受《新中国报》记者李风的采访,15日,李风发表《杨秀峰先生访问记》。

7月初,石友三委派辛海岭为广(宗)、清(河)、威(县)、邱(县)、曲(周)5县保安司令,与驻守冀南的八路军制造“摩擦”。

9月18日,《冀南日报》在广宗县槐窝、杜家庄、杨家庄东侧之西沙河地道中创刊。该报初由冀南文化界抗日救国协会主办,后改为中共冀南区委机关报。

9月,中共广宗县委决定开展游击战争,深挖交通沟,遏止日伪军“扫荡”。县抗日政府成立“参议会”,史柱周、卫峥嵘当选正、副会长。

11月,县抗日政府将全县3个区划为7个行政区。

11月,国民党石友三部公开向八路军进犯,第四营宋子谦部与八路军在西宋发生激战,宋子谦败逃。

12月,县抗日政府成立“锄奸团”,镇压一批向国民党29军和32军告密、捕杀过中共党员的奸细。

1940年

1月31日,县委组织部长李良田等率领县大队指战

员,摧毁石友三设在董里集的征粮、征税处,并惩治其首恶分子。

2月3日,石友三部配合日军500人,“扫荡”广宗地区。

2月7日,县大队在杜家庄逮捕并处决常乃秋等5名汉奸。

4月7日,抗日军民4000多人配合八路军新七旅,对敌人新修的南宫至广宗和巨鹿至广宗的公路及县境内的部分公路进行大规模破坏。

6月,广曲(联合)县抗日政府在东贺固成立,县长张雨秋(又名张小川)宣布冀南行署设置广曲县的决定,广曲县正式建立。该县辖境:北至邢济(今邢临)路,南至曲周县之大小第八及原邱县之潘坡、南营,西至滏阳河,东至企之县界及原广宗县的刁家营。境域东西宽八九十里,南北长六七十里。辖6个区138村。总人口8万余。广宗县南部29村属之,平乡属村合义及威县属村郭庄、仁义庄、宋村、金塔寨、西宋村归广宗县辖。

7月,冀南抗战学院迁至广宗县杜家庄。

9月10日,侵华日军头目谷口带领日军1个小队及部分伪军进驻大柏社,在城北建立第一个日伪据点。

9月21日,县抗日大队二连围歼在卫伏城抢粮的伪军警备队,俘虏伪大队队副茹秀林以下60余人。

1941 年

1 月 30 日,八路军某部 25 团一连和巨鹿县 1 个模范班百余人,在东召村北遭千余日伪军围截,18 名八路军指战员壮烈牺牲,广宗县青救会主任吕建华同时遇难。

3 月 7 日,冀南军区命令七旅两个团停止整训,以营为单位分散到广宗、威县、南宫等县开展游击战争。

3 月,冀南行政干部学校第一期学员在广宗县件只、槐窝一带开学。

9 月,冀南区人民武装抗日(筹备)委员会总会主任李尔重到广宗安湾头扩军 600 余人。

是年,冀南银行迁至刘家庄。

1942 年

2 月下旬,县委在李磨村召开会议,中共四地委书记郭森到会。

2 月,日伪军包围王常相,搜查八路军干部,抗日村长张书寒牺牲。

3 月 18 日,日伪军 3000 多人“围剿”五、六区 33 个村庄,抓捕村干部、党员和群众千余人押往县城,由叛徒耿志华指认,342 人被捕。

3 月 26 日,广宗、平乡、巨鹿三县日伪军千余人集中

“扫荡”平乡县。

4月27日,八路军129师771团和中共广曲县委在西贺固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前形势,研究反“扫荡”对策。会议决定避开敌主力,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敌占区边沿活动。是日晚,771团和县委转移至漳速。由于决策及时,顺利躲过两天后的“四二九”铁壁大合围,为革命保存了有生力量。

7月18日,日伪军对广宗县一、二区的40多村进行“清剿”。中共党员、村干部和群众千余人被集中到件只村,由叛徒赵一等指认,400多人被捕。

7月26日,县委在杜杨庄桃树行开会,遭核桃园据点的日伪军包围,经两小时激战,机关干部安全脱险。

7月,青纱帐起,中共四地委书记郭森、武工队长张世盖、政委解方率20名武工队员来到广宗开展工作。

8月,县委重新组建县大队和各区游击中队及游击小组,配合“武工队”开展工作。

9月18日,第2军分区第10团攻克大柏社据点,歼灭伪军40余人。

11月30日,县大队攻克三杏村日伪炮楼,击毙伪军小队长,生擒伪军23人。

冬,青纱帐失,开展地道战。建“红色堡垒村”。全县共挖地道536条。

1943 年

2月6日,日伪军在县城及附近村庄抓捕共产党员和群众40多人,杀害6人。

2月10日,日伪军对四区的清村、魏村等17村进行“清剿”,逮捕中共党员和干部群众200多人。

5月16日,县大队配合四分区十一团九连在陈家湾村东伏击敌伪运输车队,消灭日军36人,缴获6车军用物资。

6月28日拂晓,县委主要负责人带领县大队在杜家庄桃树行开会,遭南宫、广宗、巨鹿、威县日伪军“合围”,县委和县大队的干部战士突出重围。

7月中旬,县抗日游击队第三中队队长薛福春率20多名战士和50多名民兵夜袭北葛村日伪据点,生擒伪小队队长以下20多人,并收缴短枪30多支,子弹2000发。

7月23日,三区长薛福春等7名区政府干部和三中队1名战士,在西宋村遭广宗和巨鹿花窝据点的日伪军包围,战士崔炳坤率先突围未能成功,遂入该村地洞。敌人往地洞施放毒气,薛福春等4人被毒死,崔炳坤等4人幸免。

11月,广曲县六区沟北工作队在东铺村被日伪军包围,区助理员袁正身壮烈牺牲。

是年,八路军 120 师 358 旅授予该旅炮兵营干事卫永斌(卫家庄人)“二等劳模”荣誉称号;八路军晋绥军区授予中共晋绥分局警卫连长李林(冶村人)“模范干部”荣誉称号。

1944 年

1 月 14 日,县抗日政府公安干部赵一卜(赵伏城人)被捕。26 日拂晓,县委宣传部长胡玉广在焦家庄被捕,2 月 6 日牺牲在广宗县城。

2 月,县大队伏击大柏社日伪据点运粮队,夺回粮食万余斤,俘敌 10 余人,缴获枪支一批。

6 月,县委在刘家庄召开会议,决定开展“赎回”房地产运动,由贫雇农赎回 1943 年和 1944 年春为渡荒卖出去的房地产。

8 月,广曲(联合)县并入邱县。

10 月 3 日,著名作家吴伯箫根据广宗抗日军民的斗争经验写成《黑红点》一文,将广宗县开展“黑红点”活动的经验介绍到其他抗日游击区。据中央文献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天下之脊》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广宗县在敌伪人员中率先开展“黑红点”运动以瓦解敌军。

10 月 12 日,县大队和八路军某部 11 团 9 连互相配合,智取核桃园日伪据点,消灭伪军 10 余人,俘虏 120 多

人,广宗一区解放。

10月,县抗日政府在董里集召开群英大会,奖给“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劳动英雄王朝柱、田喜荣各1头耕牛和1块木匾。

1945年

3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河南濮阳召开第一届“群英会”,县劳动英雄田喜荣、王朝柱骑马戴花参加大会。

4月4日,县大队和各区中队在张家庄整训,遭广宗、南宫、巨鹿、威县千余名日伪军“合围”,县大队和各区中队胜利突围。一分队力战顽敌,经3个小时血战,牺牲23人。

5月,以“挖地道逼近狠打”之战术,迫使件只据点的伪军逃往县城,途中遇县大队伏击,160名伪军被俘。

6月,抗日军民攻破县内多处日伪据点,日伪军撤回县城。

7月1日,伪治安军和保安队包围盐场村,当场杀害群众3人,将该村38名青壮年押到县城,5日后又杀害5人。

7月26日,抗日军民收复县城,广宗全境解放。

9月,广宗县抗日政府改称民主政府。

10月,广宗县工会、农会、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和文化界联合会相继成立。

10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县掀起“有仇报仇,有冤伸冤,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反奸清算运动。

11月2日,原广宗县划归广曲县的29村还属,曲周县的南北淤疃、陈家庄、杨漳遂划归广宗县辖。

11月,县委决定依靠贫雇农建立各村农会,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和土地改革试点工作,试点村有件只、北苏、赵伏城、城内四街、油堡。

12月4日,县政府发布布告,划全县为5个区。任命各区区长。

冬,县民主政府提出由各区改选新村长,建立农村新政权,开展房地产归回运动,雇工一律增加工资三分之一。

1946年

4月上旬,全县开展民主运动,选举范若一、乔晓光为候选“国民大会”代表。流亡石家庄的国民党县党部假造选民名册,推祁卓如为“国大”代表。

4月,县政府指示各区,欢迎外逃难民回乡,并给予救济。

春,为配合“土改”运动,全县共办识字班和夜校94

处,受教农民 1.48 万人。

6 月上旬,“土改”运动在全县展开。

8 月,广宗县组成 480 人、120 副担架的民兵支前队,将一批解放军伤员由馆陶送到威县方家营。

广宗县第一个人民商店——“中秋商店”在董里集开业。

9 月,广宗人民踊跃支前,分别送皮棉 40 车(约 1.5 万公斤)、军鞋两车至冀南行署驻地(邢台西石头庄村)。

10 月上旬,广宗县出现参军参战热潮。至冬季,全县参军千人左右。

1947 年

3 月,县政府秘书吴之汉带领千余人、300 副担架和百余辆大车组成的支前大队,参加解放安阳的战斗,受到冀南区前方战勤指挥部嘉奖。

5 月,县委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董里集在张大三的带动下,组织“配套组”、“换工组”100 多个,小麦亩产达到 100 多公斤。

师范学校第一次招生,考生 400 人,录取 50 人。

6 月 13 日,广宗县第一批干部(67 名),随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下至大别山区。

1948 年

1月8日,百余名县、区、科级干部到南宫参加“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2月20日回县。

5月,广宗县组织1000多名民兵、150多副担架,赴黄河沿岸支前。

9月,冀南区四专署发给广宗县委收音机1台。

11月,在全县开展划阶级、“土改”复查工作。

12月,全县开始发放《土地房产所有证》。

1949 年

1月1日,县委决定在县城建立广宗县生产推进社。选派岳逢格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全国供销合作社培训班。

8月1日,邢台专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专署”)成立,广宗县属之。

8月21日,专署、军分区联合发出《关于调查登记阵亡营以上烈士之坟墓的指示》,广宗县有关部门开始调查之。

9月,河北省慰问老区工作团到广宗杜杨庄一带进行慰问。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县人民群众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县民主政府改称县人民政府。

附录二 组织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共广宗县委及所属组织 (1927.9 ~ 1935.2)

一、县委

1927年9月,中共顺直省委巡视员王子青来到广宗,根据当时广宗农民运动开展的情况,以及党员关系现状,任命梁宝森为中共广宗县委书记,组建了广宗县委。1930年1月,国民党广宗县当局逮捕梁宝森,梁宝森在他人掩护下离开广宗,中共广宗县委中断。

1931~1934年间,广宗县北部共产党员的数量不断增加,组织不断发展,党的力量不断壮大,根据这一情况,中共直南特委决定重新组建中共广宗县委,负责广宗、威县西部、邱县北部的党组织,机关多驻槐窝村。在此县委组建前,中共广宗地方组织分别属于中共威县县委(1930.7~1932年春)、中共威县中心县委(1932年春~1933年春)、中共南宫中心县委(1933年春~1934年秋)

的领导。1935年2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广宗县委撤销,中共广宗地方组织归属中共巨鹿中心县委领导。

书 记

梁宝森(1927.9 ~ 1930.1)

郭 森(1934年秋 ~ 1935.2)

组织委员

吴西华(1934年秋 ~ 1935.2)

宣传委员

吴先文(1934年秋 ~ 1935.2)

二、县委所属支部

1927年9月,中共广宗县委组建后,县委书记梁宝森积极在广宗县东贺固和曲周县槐桥村发展党员。之后,东贺固村于1927年冬建立了党支部;1928年春,梁宝森在曲周县建立了中共曲周县特别支部;1929年底,大名七师的学生共产党员潘笑圃带着大名县委的介绍信,同梁宝森取得联系,经梁宝森批准,建立了威县支部。1930年梁宝森离开广宗后,东贺固支部与上级失去组织联系,曲周特支与威县支部分别与直南特委取得联系。

中共东贺固支部负责人 李志明

中共曲周县特别支部负责人 梁宝森(梁雨辰)
冀良俊(冀汇川)

中共威县支部负责人 潘笑圃

中共广宗中心县委及所属组织 (1935.9 ~ 1936.5)

一、中心县委

1935年,直南农民游击战争开展得轰轰烈烈,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中心的转移,中共直南特委决定将中共巨鹿中心县委改建为中共广宗中心县委,负责广宗、巨鹿、南宫、威县和邱县部分地区的党组织,机关多驻槐窝村。机关报为《农民小报》,油印,不定期。1936年1月,省委调中心县委书记郭森去学习,派白王(王德)任中心县委书记,由于白王是外地人,口音不对又不熟悉情况,加之形势日益恶化,白王不辞而别,中心县委书记便由刘栋代理。但是,此时刘栋也已经公开了,无法再开展工作,于是直南特委决定由小黑李(李同安)任中心县委书记。1936年1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直南农民运动进行了残酷的“围剿”和镇压,直南农民游击战争失败。1936年4月,中心县委书记李同安由于叛徒出卖被捕,5月壮烈牺牲在广宗县城,中共广宗中心县委中断。

书 记

郭 森(1935.9 ~ 1936.1)

白 王(王德,1936.1 ~ 1936.2)

刘 栋(代理,1936.2 ~ 1936.3)

小黑李(李同安,1936.3 ~ 1936.5)

委 员

郭 森(1935.9 ~ 1936.1)

刘 栋(1935.9 ~ 1936.5)

小黑李(1935.9 ~ 1936.5)

王光华(1935.9 ~ 1936.5)

白 王(1936.1 ~ 1936.2)

肖一舟(1935.9 ~ 1936.5)

组织部部长

刘 栋(1935.9 ~ 1936.5)

宣传部部长

小黑李(1935.9 ~ 1936.3)

《农民小报》负责人 吴先文

二、中心县委所属工委

中共广宗中心县委组建后,为了适应直南农民游击战争的需要,在威县没有县委的情况下,经广宗中心县委批准,于1935年10月,组建了中共威(县)南(宫)工作委员会,负责威县和南宫部分地区的党组织。1936年初,组建了中共威(县)邱(县)工作委员会,负责威县和邱县部分地区的党组织。这两个工委均未有固定驻地。直南农民游击战争失败后,威南和威邱工委停止工作。

威南工委书记

谢梨夫(1935.10 ~ 1936.3)

威邱工委

书 记 田甫航(1936年初 ~ 1936.3)

副书记 范开武(1936年初 ~ 1936.3)

三、中心县委所属区委

中共广宗中心县委建立后,于1935年9月组建威县西部区委,负责广宗槐窝等村庄和威县西北部一带村庄党的组织;1935年10月组建广宗北部区委,负责广宗北部村庄的党组织,负责广宗红庙、庞村等村庄;巨鹿东部区委负责巨鹿东部一些村庄的党组织。这三个区委分别驻槐窝、北李庄和红庙。

威县西部区委书记 吴先文 吴西华 于振廷

广宗北部区委书记 周孟北

巨鹿东部区委书记 张必人 王西浩

四、中心县委所属地方军事组织

随着直南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展,中共直南特委根据中共河北省委的意见,于1935年8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该游击队分为两支:一支活动在滏阳河以西,一支活动在滏阳河以东。活动在滏阳河以东的这一支,负责人是大个子老李(王光华),下设四支队、五支队、十二支队、十五支队和一个特务队,活动在广宗的

主要是第五支队。

1936年1月,根据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的指示,直南特委在广宗北李庄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改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一、三团。第三团由原活动在滏阳河以东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红军游击队第五支队则改编为第二连。随着直南农民游击战争的失败,该支武装遵照直南特委的指示,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以待时机,但该武装分散后,难以再集中,名存实亡。

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第五支队

支队长 郭玉怀(1935.8 ~ 1935.11)

王光华(兼,1935.11 ~ 1936.1)

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第二连连长 李洛范(1936.1 ~ 1936.4)

抗日战争时期

中共广威中心县委及广宗县政、军组织
(1938.1 ~ 1938.6)

一、中共广威中心县委

1937年9月间,中共直南临时特委书记马国瑞来到

广宗县董里集村找到李警湘,指示他迅速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任命其为广宗县北区区委书记,负责董里一带村庄党的工作。同时,刘纪恒和韩成瑞分别在北李庄一带和槐窝一带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并组建了两个区委。1937年11月间,广宗县北部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抗日防匪自卫团,团长由董里的开明绅士刘惠民担任。抗日防匪自卫团下设三个大队:一大队在北李庄、槐窝,大队长是吴西华、杨克修、李洛范;二大队在东董里,大队长是刘惠民、刘卫华;三大队在董里集,大队长是王含馥。抗日防匪自卫团有100多人,七八十支枪。不久编入八路军别动队。1938年1月,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在司令员陈再道、政委李菁玉率领下,开赴冀南创建抗日根据地。为了加强对广宗、威县一带的领导,中共冀南特委决定组建中共广威中心县委。中心县委机关始驻威县鱼堤村,后移驻广宗县冶村,负责广宗和威县部分村庄的党组织。1938年6月,根据中共冀鲁边特委的指示,该中心县委撤销。

书 记

田甫航(1938.1~1938.2)

李 林(1938.2~1938.3)

常中方(1938.3~1938.4)

乔晓光(1938.4~1938.6)

委 员

田甫航(1938.1 ~ 1938.2)

李 林(1938.2 ~ 1938.3)

常中方(1938.2 ~ 1938.4)

乔晓光(1938.4 ~ 1938.6)

王含馥(1938.1 ~ 1938.2)

张锡吾(1938.2 ~ 1938.4)

李光军(1938.4 ~ 1938.6)

牛尽善(1938.1 ~ 1938.2)

宋亚田(1938.3 ~ 1938.4)

韩成瑞(1938.4 ~ 1938.6)

组织部部长

牛尽善(1938.1 ~ 1938.2)

张锡吾(1938.2 ~ 1938.4)

李光军(1938.4 ~ 1938.6)

宣传部部长

王含馥(1938.1 ~ 1938.2)

常中方(1938.2 ~ 1938.3)

宋亚田(1938.3 ~ 1938.4)

韩成瑞(1938.4 ~ 1938.6)

二、广宗县战委会

广宗战委会于1938年3月在董里成立,4月移驻件

只村,6月进驻县城,下设组织、宣传、武装、锄奸、动员部等。

主 任

肖一舟(1938.3~1938.4)

王拾风(1938.4~1938.6)

组织部部长

任焕斗(1938.3~1938.6)

宣传部部长

罗将雨(女,1938.3~1938.6)

武装部部长

刘亚禄(1938.3~1938.6)

锄奸部部长

牛亚夫(牛尽善,1938.3~1938.6)

动员部部长

任寿臣(1938.3~1938.6)

三、广宗县地方军事组织

抗日防匪自卫团 1937年11月,遵照中共直南临时特委关于建立抗日武装的指示,在广宗北部成立了抗日防匪自卫团,该团有100多人,七八十支枪,下设三个大队。不久,该武装编入八路军主力。

团 长 刘惠民

一大队队长 吴西华

一大队副队长 杨克修 李洛范

二大队队长 刘惠民(兼)

二大队副队长 刘卫华

三大队队长 王含馥

广宗县抗日游击大队 1938年2月,广宗县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县大队由四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直南农民游击战争时期的红军游击队队员;一部分是群众武装“大刀会”成员;一部分是原国民党县政府的保安队人员;另外还征召了部分优秀青年。随着抗日斗争的发展,县大队也不断发展壮大,作为广宗地方抗日武装,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县大队起到应有的作用。

副大队长 赵济川(1938.2~1938.6)

冀南人民游击队第一支队 1938年3月间,在杜杨庄利用直南农民游击战争失败后隐藏下来的枪支组建了一支名为“沙行游击队”的抗日武装,该游击队有20多人。不久,八路军东进纵队政治部将其命名为“冀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杜泽民,后编入八路军主力。

四、中共广威中心县委所属区委

在中共广威中心县委成立前,广宗县北部已经组建了三个区委,受中共直南临时特委领导。1938年1月,中共广威中心县委成立。3月将其中两个区委合并为广宗

县北部区委,另有广宗县中部区委,同时在威县境内组建了一个区委。1938年6月,中共广威中心县委撤销,上述各区委也随之重新组合。

西北区区委书记

李警湘(1937.9 ~ 1938.3)

北区区委书记

刘纪恒(1937. ? ~ 1938.3)

中北区区委书记

韩成瑞(1937. ? ~ 1938.4)

刘步怀(刘辉光,1938.4 ~ 1938.6)

北区区委书记

李良田(1938.3 ~ 1938.6)

中区区委书记

李镜海(1938.4 ~ 1938.6)

威县境内区委书记

张半农(1938.3 ~ 1938.6)

广宗县地方党组织

(1938.6 ~ 1940.6)

抗日战争初期,广宗县行政区划范围沿袭了历史遗

留下来的状况。1939年11月,将全县原来的3个行政区改划为7个行政区。在此期间,中共广宗县委和广宗县抗日民主政府分别属于中共冀南四地委和冀南四专署领导。

一、中共广宗县委及县政、军、群组织

中共广宗县委 1938年6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冀鲁边特委决定撤销中共广威中心县委,同时中共广宗县委在冶村成立。不久县委机关搬进县城,驻宅后街,对外则称“八路军工作团”。1939年2月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县城,县委机关撤出县城,活动在农村。其工作机构有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青委会、妇委会。1939年1月,增设民运部;11月,增设社会部;1940年1月,又增设武装部。1939年下半年,县委创办《战斗报》,油印,不定期,该报1940年停办。

书 记

乔晓光(1938.6~1938.8)

高志学(1938.8~1939.5)

潘锦章(代理,1939.5~1939.10)

杨 青(1939.10~1940.4)

李良田(1940.4~1940.6)

委 员

乔晓光(1938.6~1938.8)

李良田(1938.6 ~ 1940.6)

张半农(1938.6 ~ 1940.5)

李仁祥(1938.6 ~ 1940.6)

刘利浦(1938.6 ~ 1940.6)

李曙光(1938.6 ~ 1939.6)

高志学(1938.8 ~ 1939.5)

路 广(1939.1 ~ 1939.12)

潘锦章(1939.5 ~ 1939.10)

王 英(肖英,1939.6 ~ 1940.6)

黄宪章(1939.5 ~ 1940.4)

高凤群(女,1940.1 ~ 1940.6)

孟信甫(1940.4 ~ 1940.6)

赵 一(雷鸣,1940.5 ~ 1940.6)

秘书室秘书长

李曙光(1938.6 ~ 1939.6)

王 英(肖英,1939.6 ~ 1940.1)

肖健羽(1940.1 ~ 1940.6)

组织部部长

李良田(1938.6 ~ 1940.4)

王 英(1940.4 ~ 1940.6)

宣传部部长

张半农(1938.6 ~ 1940.5)

赵 一(1940.5 ~ 1940.6)

青委会书记

吕建华(1938.11 ~ 1940.6)

妇委会书记

魏庆云

张志建

张庆连

韩芳宇

民运部部长

路 广(1939.1 ~ 1939.12)

高凤群(女,1939.12 ~ 1940.6)

社会部部长

刘利浦(1939.1 ~ 1940.6)

武装部部长

刘卫华(1940.1 ~ 1940.6)

《战斗报》负责人

张半农(1939 下半年 ~ 1940.5)

赵 一(1940.5 ~ 1940.6)

广宗县战委会 1939年2月3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县城,战委会随之撤出。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战委会于1939年9月撤销。

主 任

王含馥(1938.6 ~ 1939.3)

路 广(1939.3 ~ 1939.9)

组织部部长

任焕斗(1938.6 ~ 1939.9)

宣传部部长

罗将雨(女,1938.6 ~ 1939.9)

武装部部长

刘亚禄(1938.6 ~ 1938.7)

王子强(1938.7 ~ 1939.9)

锄奸部部长

牛亚夫(1938.6 ~ 1938.10)

司泽林(1938.10 ~ 1939.9)

动员部部长

任寿臣(1938.6 ~ 1939.9)

广宗县参议会 1939年9月,广宗县战委会撤销后,为了广泛动员各界人士参加抗战,经过各界人士选举产生了县参议会,其主要成员多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县抗日政府的重大决策和主要法令都经过参议会讨论通过。

议 长 史柱周

副议长 卫峥嵘

秘书长 李仲安

常 委

史柱周 卫峥嵘 李仲安 李发科 张庆连(女)

参议员

马超凡 贾波涛 王冕卿 李希古 马玉郡

吕招贤

广宗县抗日民主政府 1938年6月成立,初设民政科、财政科、文教科、武装科、司法科。1939年秋,增设实业科和贸易局。1939年11月,设公安科。县抗日政府初辖3个区公所。1939年11月,全县将3个区划为7个区,抗日政府辖7个区公所。1939年2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宗县城,抗日政府撤出县城,活动在农村,遂无固定驻地。

县 长

王拾风(1938.6 ~ 1939.5)

黄宪章(1939.5 ~ 1940.4)

孟信甫(1940.4 ~ 1940.6)

秘 书

程子南(1938.6 ~ 1939.3)

王含馥(1939.3 ~ 1940.4)

解 方(1940.4 ~ 1940.6)

民政科科长

雷震宇(1938.6 ~ 1939.5)

杨华光(1939.5 ~ 1940.6)

财政科科长

韩裴轩(1938.6 ~ 1939.2)

孟某某(1939.2 ~ 1939.5)

吴 涛(1939.5 ~ 1940.4)

孙云英(1940.4 ~ 1940.6)

文教科科长

吴之汉(1938.6 ~ 1940.4)

孔金三(1940.4 ~ 1940.6)

武装科科长

刘亚禄(1938.6 ~ 1938.8)

高志学(1938.8 ~ 1939.5)

贾剑林(1939.5 ~ 1940.6)

司法科(承审处)科长

孙绍刚(1938.6 ~ 1939.2)

张碧平(1939.2 ~ 1940.6)

公安科科长

刘利浦(1939.11 ~ 1940.6)

实业科科长

解 方(1939 年秋 ~ 1940.4)

吴 涛(1940.4 ~ 1940.6)

贸易局局长

王官亭(1939 年秋 ~ 1940.6)

县抗日游击大队 1938 年 6 月中共广宗县委、县抗日政府建立后,又重新组建了县抗日游击大队。县大队直属 3 个中队(连),另外管辖 3 个区中队。1939 年 11 月,广宗县由 3 个区划为 7 个区,县大队除辖 3 个直属中队(连)以外,还管辖 7 个中队。

大队长

王拾风(兼,1938.6 ~ 1939.5)

黄宪章(兼,1939.5 ~ 1940.4)

孟信甫(兼,1940.4 ~ 1940.6)

副大队长

王自强(1938.6 ~ 1939.5)

孙长锁(1939.5 ~ 1940.6)

张帮道(1940.4 ~ 1940.6)

教导员

张子其(1938.6 ~ 1939.5)

张半农(1939.5 ~ 1940.5)

刘卫华(1940.5 ~ 1940.6)

政治处主任

张半农(1938.6 ~ 1939.5)

群众团体组织 1938 年 6 月,中共广宗县委、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积极筹建各抗日群众团体。10 月,农民

抗日救国会(农救会)成立,随后工人抗日救国会(工救会)、青年抗日救国会(青救会)、妇女抗日救国会(妇救会)、文化界抗日救国会(文救会)相继成立。

工救会主席

李修华(1938.11 ~ 1940.6)

农救会主席

邢振武(1938.10 ~ 1940.1)

阎保身(1940.1 ~ 1940.6)

青救会主任

吕建华(1938.12 ~ 1940.6)

妇救会主任

魏庆云

韩芳宇

文救会主任

路 广(1938.12 ~ 1939.12)

苏卜光(1939.12 ~ 1940.6)

二、县委所属区委及区公所

1938年6月,中共广宗县委、广宗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时,全县为3个行政区,分别是北区、中区、南区。北区包括李怀、北苏、魏村以北的村庄;中区包括柏社、清村、南苏、常相以南和霍城寨、白家寨、全家寨、樊村、枣科以北的村庄;南区包括合义、小庄、砖窑、南寺郭、周家寨、王

胡寨以南的村庄。

北区区委书记

刘纪恒(1938.6 ~ 1938.10)

刘利浦(1938.12 ~ 1939.11)

北区区公所区长

韩裴轩(1938.6 ~ 1938.12)

孙云英(1938.12 ~ 1939.11)

中区区委书记

李镜海(1938.6 ~ 1938.8)

李发科(1938.8 ~ 1939.5)

吉合梅(1939.5 ~ 1939.11)

中区区公所区长

郑浩吾(1938.6 ~ 1938.12)

魏芳林(1938.12 ~ 1939.11)

南区区委书记

常静波(1938.8 ~ 1939.11)

南区区公所区长

尹化堂(1938.6 ~ 1939.4)

王牟天(1939.4 ~ 1939.7)

王永志(1939.7 ~ 1939.11)

1939年11月,为了有利于抗日斗争工作的开展,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县委、县抗日政府决定缩小行政区

划,将全县的3个区划为7个行政区。

第一区 包括杜杨庄、张家庄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驻董里。

区委书记

王 英(肖英,1939.11~1940.4)

王 峰(1940.4~1940.6)

区公所区长

孙云英(1939.11~1940.4)

郭冠榜(1940.4~1940.6)

第二区 包括湾头以南,张魏、尹村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驻件只。

区委书记

王 林(1939.11~1940.6)

区公所区长

马玉郡(1939.11~1940.6)

第三区 包括板台以南,邓屯、北苏以西,东召、东西常屯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驻东召。

区委书记

刘纪恒(1939.11~1940.6)

区公所区长

李纳川(1939.11~1940.6)

第四区 包括魏村以南,南苏、夏家庄、县城以西,五

里庄、王吾里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驻魏村。

区委书记

常 青(1939.11 ~ 1940.6)

区公所区长

黄利民(1939.11 ~ 1940.6)

第五区 包括葛村以南,全寨以北,牛里庄、王村、李庄以东,常相、小东、大东村以西的村庄。区委、区公所驻常相。

区委书记

杜荆林(1939.11 ~ 1940.6)

区公所区长

毕荆北(1939.11 ~ 1940.6)

第六区 包括李磨、伏城、樊村以东,王胡寨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无固定驻地。

区委书记

王云广(1939.11 ~ 1940.6)

区公所区长

张西瑞(1939.11 ~ 1940.6)

第七区 包括霍城寨、白家寨、寺郭、周家寨、元宝寨以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无固定驻地。

区委书记

高干一(1939.11 ~ 1940.6)

区公所区长

王玉章(1939.11 ~ 1940.6)

广宗县地方党组织

(1940.6 ~ 1945.8)

1940年以后,抗日斗争形势日益严峻,为了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冀南区党委决定设立广(宗)曲(周)县,并决定将广宗县南部29个行政村即邢(台)济(南)公路以南的村庄以及北塘疃、丁家庄、孙家庄等村庄划归广曲县。这时还将原属威县的宋村、郭庄、金塔寨和西宋划归广宗县,广宗县仍设7个行政区。在此期间,广宗属冀南区的四地委和四专署管辖。

一、中共广宗县委及县政、军、群组织

县委 1940年6月,县委设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社会部、武装部、青委、妇委。1941年民运部撤销,增设敌工部。从1940年6月起至抗日战争结束,县委下辖7个区委。中共广宗县委1939年创办的《战斗报》1940年停办之后,又创办了《黎明》刊,油印,不定期出版。1942年《黎明》刊停办,随后又创办《五一旬刊》,油印,该刊1943年又停办。

书 记

李良田(1940.6 ~ 1941.4)

赵 一(1941.4 ~ 1942.2)

王 英(肖英,1942.2 ~ 1945.7)

宋亚田(1945.7 ~ 1945.8)

委 员

李良田(1940.6 ~ 1941.4)

赵 一(1940.6 ~ 1942.2)

王 英(肖英,1940.6 ~ 1945.7)

刘利浦(1940.6 ~ 1945.5)

孟信甫(1940.6 ~ 1941.4)

阎保身(1940.6 ~ 1945.8)

王润泽(1940.6 ~ 1945.8)

高凤群(女,1940.6 ~ 1942.2)

常 青(1941.4 ~ 1945.8)

王 林(1941.1 ~ 1945.8)

杜荆林(1942.2 ~ 1945.8)

胡玉广(1942.2 ~ 1944.2)

孙云英(1942.7 ~ 1945.8)

刘 栋(1944.2 ~ 1945.8)

宋亚田(1945.7 ~ 1945.8)

秘书室秘书长

杜才中(1940.6 ~ 1941.4)

张 信(1941.4 ~ 1942.4)

魏显箱(1942.4 ~ 1942.?)

薛中光(1942. ? ~ 1945.8)

组织部部长

王 英(肖英,1940.6 ~ 1942.2)

王 林(1942.2 ~ 1944.2)

刘 栋(1944.2 ~ 1945.8)

宣传部部长

赵 一(1940.6 ~ 1941.4)

高凤群(女,1941.4 ~ 1942.2)

胡玉广(1942.2 ~ 1944.2)

王 林(1944.2 ~ 1945.8)

民运部部长

高凤群(女,1940.6 ~ 1941.4)

社会部部长

刘利浦(1940.6 ~ 1941.5)

吴 涛(1941.5 ~ 1942.6)

肖健羽(1942.6 ~ 1943.?)

何少农(何俊辉,1943. ? ~ 1945.8)

武装部部长

王润泽(1940.6 ~ 1945.8)

敌工部部长

常 青(1941.4 ~ 1945.8)

青委书记

吕建华(1940.6 ~ 1942.春)

妇委书记

牛华国(1940. ? ~ 1941. ?)

张秀荣(1941. ? ~ 1941. ?)

薛 瑞(1941. ? ~ 1942. ?)

张志建(1942.2 ~ 1942.春)

《黎明》刊负责人

赵 一(1940.6 ~ 1941.4)

高凤群(女,1941.4 ~ 1942.2)

胡玉广(1942.2 ~ 1942. ?)

《五一旬刊》负责人 李 钧

县参议会 1940年6月,冀南区党委和冀南行署将广宗县南部划归广曲县以后,县参议会机构没有变化。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阶段,7月间,参政合一,县参议会停止活动。

议 长

史柱周(1940.6 ~ 1942.7)

副议长

卫峥嵘(1940.6 ~ 1942.7)

秘书长

李仲安(1940.6 ~ 1942.7)

常 委

史柱周 卫峥嵘 李仲安 李发科 张庆连(女)

参议员

马超凡 贾波涛 王冕卿 李希古 马玉郡

吕招贤

县抗日民主政府 抗日民主政府设民政科、财政科、文教科、实业科、武装科、司法科、贸易科、公安科。1941年,公安科改为公安局。1942年9月,撤销实业科,设粮秣科。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辖7个区公所。1940年10月,广宗县根据冀南行署的指示选举了“三三制”的抗日政府。

县 长

孟信甫(1940.6 ~ 1941.4)

解 方(代理,1941.4 ~ 1942.?)

孙云英(1942.7 ~ 1945.8)

秘 书

解 方(1940.6 ~ 1941.1)

吴 涛(1941.1 ~ 1941.5)

孙云英(1941.5 ~ 1942.7)

高力新(1942.7 ~ 1943.2)

吴之汉(1943.2 ~ 1945.8)

民政科科长

杨华光(1940.6 ~ 1941.1)

孙云英(1941.1 ~ 1941.5)

李 钧(1941.5 ~ 1945.8)

财政科科长

孙云英(1940.6 ~ 1941.1)

吴慕南(1941.1 ~ 1942.12)

黄福善(1942.12 ~ 1944.5)

马德全(1944.5 ~ 1945.8)

文教科科长

孔金三(1940.6 ~ 1945.8)

实业科科长

吴 涛(1940.6 ~ 1941.1)

李致中(1941.4 ~ 1942.9)

武装科科长

贾剑林(1940.6 ~ 1941.4)

王润泽(1941.4 ~ 1945.8)

司法科(承审处)科长

张碧平(1940.9 ~ 1941.4)

冯玉符(1941.4 ~ ?)

公安科科长

刘利浦(1940.6 ~ 1941.5)

何少农(1943. ? ~ 1945.8)

贸易局局长

赵锦一(1940.3 ~ 1941.1)

陈春祥(1941.1 ~ 1945.8)

公安局局长

吴 涛(1941.5 ~ 1942.6)

肖健羽(1942.6 ~ 1943.?)

粮秣科科长

谷墨林(1942.9 ~ 1943.1)

王永志(1943.1 ~ 1945.8)

县抗日游击大队 抗日战争时期,县大队几次被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为此,县大队也几次进行整编和组建。1942年,为了加强对武装的领导,县大队的教导员改为政委,由县委书记兼任,大队长由县长兼任。到抗日战争结束,县大队再次编入八路军主力,参加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大队长

孟信甫(兼,1940.6 ~ 1941.4)

解 方(兼,1941.4 ~ 1942.7)

孙云英(兼,1942.7 ~ 1945.8)

副大队长

张帮道(1940.6 ~ 1941.1)

赵 凯(1941.1 ~ 1941.2)

杜荆林(1941.2 ~ 1942.12)

孙长锁(1942.12 ~ 1943.12)

吴建光(1943.12 ~ 1944.10)

王庆寅(1944.10 ~ 1945.8)

邱 振(1945.1 ~ 1945.8)

教导员

刘卫华(1940.6 ~ 1940.?)

于晓光(1940. ? ~ 1941. ?)

孙朝栋(1941. ? ~ 1942.8)

政 委

王 英(兼,1942.8 ~ 1945.7)

宋亚田(兼,1945.7 ~ 1945.8)

副政委

孙朝栋(1942.8 ~ 1943.?)

孙 磊(1943. ? ~ 1944. ?)

赵春城(1944. ? ~ 1945.8)

群众团体组织 1942年春,抗战的形势异常严峻。为适应这一形势,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县各群众团体合并为广宗县各界人士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抗日战争结束后,抗联随之撤销。

工救会主席

李修华(1940.6 ~ 1942.春)

农救会主席

阎保身(1940.6 ~ 1942.春)

青救会主任

吕建华(1940.6 ~ 1942.春)

妇救会主任

牛华国(1940.6 ~ 1941.?)

张秀荣(1941. ? ~ 1941. ?)

薛 瑞(1941. ? ~ 1942.2)

张志建(1942.2 ~ 1942.春)

文救会主任

苏卜光(1940.6 ~ 1942.春)

抗联主任

王润泽(1942.春 ~ 1945.8)

二、县委所属区委及区公所

为了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1940年6月,广宗县南部划归广曲县后,广宗县设7个行政区。

第一区 包括杜杨庄、张家庄、邢家庄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多驻董里。

区委书记

王 峰(1940.6 ~ 1941.6)

王 申(1941.6 ~ 1941.12)

刘 健(1941.12 ~ 1942.11)

王祝光(1942.11 ~ 1943.10)

陈程善(1943.10 ~ 1945.8)

区公所区长

郭冠榜(1940.6 ~ 1940.?)

李 欣(女,1940.~ 1942.8)

牛亚夫(牛尽善,1942.8 ~ 1943.?)

刘德山(代理,1943.~ 1943.10)

陈波光(1943.10 ~ 1945.8)

第二区 包括翟家庄、湾头以南,槐窝以西,张魏、尹村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多驻件只、冶村。

区委书记

王 林(1940.6 ~ 1941.6)

陈程善(1941.6 ~ 1943.10)

刘辉光(1943.10 ~ 1945.8)

区公所区长

马玉郡(1940.6 ~ 1941.6)

黄一光(1941.6 ~ 1942.8)

张 忠(1942.8 ~ 1943.12)

李 星(1944.1 ~ 1945.8)

第三区 包括板台、郭庄、宋村以南,北苏以北的村

庄。区委、区公所无固定驻地。

区委书记

郭松鹤(1940.6 ~ 1941.4)

杜才中(1941.4 ~ 1942.12)

陈波光(1942.12 ~ 1943.10)

王云广(韩章,1943.10 ~ 1945.8)

区公所区长

李纳川(1940.6 ~ 1941.?)

牛亚夫(1941. ? ~ 1942.8)

薛福春(1942.8 ~ 1943.6)

李 星(1943.6 ~ 1944.1)

李 谦(1944.1 ~ 1945.8)

第四区 包括魏村以南,南苏、夏家庄、县城以西,五里庄、王吾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多驻魏村。

区委书记

刘 健(1940.6 ~ 1941.8)

高干一(1941.8 ~ 1945.8)

区公所区长

姜化民(1940.6 ~ 1943.12)

景志红(1943.12 ~ 1944.?)

刘卫华(1944. ? ~ 1945.8)

第五区 包括葛村以南,王村以东,全寨以北,小东

以西的村庄。区委、区公所多驻常相。

区委书记

杜荆林(1940.6 ~ 1942.2)

张步蝉(1942.2 ~ 1943.9)

乔金生(代理,1943.9 ~ 1944.6)

张光远(1944.6 ~ 1945.8)

区公所区长

毕荆北(1940.6 ~ 1942.2)

艾 英(1942.2 ~ 1944.7)

赵济川(1944.7 ~ 1945.8)

第六区 包括李磨、红龙以南,伏城、樊村以东,王胡寨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无固定驻地。

区委书记

张光远(1940.6 ~ 1943.?)

王新月(代理,1943. ? ~ 1943. ?)

胡玉广(兼,1943. ? ~ 1944.2)

王新月(1944.2 ~ 1945.8)

区公所区长

张西瑞(1940.6 ~ 1942.1)

冯杰一(1942.1 ~ 1942.12)

李 善(1942.12 ~ 1944.2)

第七区 包括霍城寨、寺郭、周家寨、元宝寨以南,以

及田家庄、路家屯、斥漳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无固定驻地。

区委书记

刘辉光(1940.6 ~ 1942.2)

杜荆林(1942.2 ~ 1945.8)

区公所区长

王玉章(1940.6 ~ 1941.2)

栗文川(1941.2 ~ 1943.4)

梁忠一(1943.5 ~ 1944.1)

中共广曲县地方党组织

1940年初,日本侵略军占据着冀南各县城与重要集镇,而在曲周、广宗、威县、邱县、平乡交界地区,却是一片相对稳定的区域。为了便于我党在这一地区开展抗日工作,1940年6月,冀南区党委和冀南区行署决定在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这一地区组建广曲县。广曲县包括:曲周县北部的83个村,广宗县南部的29个村,邱县的18个村和平乡县8个村。该县下辖6个行政区,共138个行政村。广曲县开始属冀南三地委和三专署领导。1941年转属冀南四地委和四专署领导。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以及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1944年8月,冀南区党委

和冀南行署决定撤销了广曲县,并将其大部分村庄合并于邱县。

一、中共广曲县委及县政、军、群组织

县委 1940年6月建立广曲县后,随之组建了中共广曲县委,初属冀南三地委领导,1941年改属冀南四地委领导,至广曲县撤销。县委下辖6个区委。

书 记

王雨亭(1940.6 ~ 1942.12)

胡代耕(1942.12 ~ 1944.8)

副书记

常静波(1942.12 ~ 1944.8)

组织部部长

常静波(1940.6 ~ 1942.12)

刘建中(1942.12 ~ 1944.8)

宣传部部长

吴化南(1940.6 ~ 1941.秋)

王志平(1941.秋 ~ ?)

周 勇(? ~ 1944.8)

广曲县抗日民主政府 1940年6月成立广曲县后,随之组建广曲县抗日民主政府,广曲县抗日政府初属冀南三专署领导,1941年归属冀南四专署。1944年8月,广曲县建制撤销,县抗日政府也随之撤销。在此期间,县

抗日政府下辖6个区公所。

县 长

张雨秋(1940.6 ~ 1941.秋)

吴化南(1941.秋 ~ 1944.8)

秘书室秘书

袁香南(1940.6 ~ 1943.11)

公安科科长

吴化南(1940.6 ~ 1941.秋)

张广恩(1941.秋 ~ 1943.7)

工商局局长

贾亦农(? ~ 1943.11)

敌工科(站)

科长 张唯一(1942.? ~ 1943.?)

站长 高瑞增(1943.? ~ ?)

武装科科长

张唯一(1940.6 ~ 1942.?)

县抗日游击大队 1940年6月,广曲县成立后随之组建了广曲县抗日游击大队。1944年8月,广曲县抗日游击大队随广曲县并入邱县。

县大队大队长

张雨秋(兼,1940.6 ~ 1941.秋)

吴化南(兼,1941.秋 ~ 1944.6)

副大队长

王顺如(1940.6 ~ ?)

张长连(? ~ 1944.8)

政 委

王雨亭(兼,1940.6 ~ 1942.12)

胡代耕(兼,1942.12 ~ 1944.8)

总支书记

王清义(? ~ 1944.初)

县支队支队长

张唯一(1940.6 - 1940.12)

刘凤岗(1940.12 ~ 1942.6)

王金奇(1942.6 ~ 1943.10)

公安队队长

燕玉恒(? ~ 1944.4)

群团组织 1940年6月成立广曲县以后,各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随着广曲县撤销,各群团组织也全部撤销。

农救会主任 张 勋 张福卿

青救会主任 孟一忠(魏臣)

李 浩(李弟光)

刘建中

妇救会主任 张秀荣 李 光

抗联主任 李弟光 刘建中 张春山

二、中共广曲县委所属区委及区公所

广曲县设6个行政区,除第四区现属广宗县外,其余5个区现分属于曲周县、邱县、平乡县。第四区包括:广宗县邢济路以南的全部村庄,以及路北的北塘疃、丁家庄、枣园、孙家庄等村。

第四区区委书记

王生光

孙志方

王连义

梁化平

李火华

第四区区公所区长

张会青

梁忠一

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广宗县委及县政、军、群组织

一、县委

1945年11月2日,根据冀南区党委和冀南行署的指

示及冀南四专署的命令,将邱县所属原广宗县村庄仍划归广宗。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广宗县撤销原来7个行政区,将全县划为5个行政区,县委辖5个区委。县委的工作机构有秘书室、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1949年7月,冀南区党委及冀南四地委撤销,中共广宗县委属中共邢台地委领导。

书 记

肖 英(1945.8 ~ 1947.9)

孙云英(1947.9 ~ 1949.1)

王祝光(1949.1 ~ 1949.2)

阎保身(代理,1949.2 ~ 1949.4)

司西成(1949.4 ~ 1949.9)

副书记

阎保身(1947.9 ~ 1949.9)

委 员

肖 英(1945.8 ~ 1947.9)

孙云英(1945.8 ~ 1949.1)

刘 栋(1945.8 ~ 1947.9)

王 林(1945.8 ~ 1947.9)

王润泽(1945.8 ~ 1947.9)

杜荆林(1945.12 ~ 1947.1)

常 青(1945.8 ~ 1947.9)

阎保身(1945.8 ~ 1949.9)

王祝光(1947.9 ~ 1949.2)

刘志明(1948.5 ~ 1949.9)

陈程善(1948.1 ~ 1949.9)

司西成(1949.2 ~ 1949.9)

高干一(1949.2 ~ 1949.9)

秘书室秘书长

薛中光(1945.8 ~ 1945.10)

陈程善(1947.1 ~ 1947.9)

吕选卿(1947.9 ~ 1948.?)

办公室主任

刘抱良(1948.12 ~ 1949.9)

组织部部长

刘 栋(1945.8 ~ 1945.12)

杜荆林(1945.12 ~ 1947.1)

王 林(1947.1 ~ 1947.9)

阎保身(1947.9 ~ 1948.1)

陈程善(1948.1 ~ 1949.9)

组织部副部长

阎保身(1946. ? ~ 1947.9)

宣传部部长

王 林(1945.8 ~ 1947.1)

常 青(1947.1 ~ 1947.9)

王祝光(1947.10 ~ 1949.1)

孙品光(1949.1 ~ 1949.9)

宣传部副部长

高干一(1946.1 ~ 1949.9)

二、县民主政府

抗日战争结束后,广宗县抗日民主政府改为广宗县民主政府,属冀南四专署领导。县民主政府的工作机构有秘书室、民政科、财经科、教育科、司法科、公安科、建设科、交通局。1945年10月,公安科改为公安局。1946年7月,交通局改为邮电局。1947年底,设工商科,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广宗县支行。1949年1月,设生产推进社,7月又改为供销社。

县 长

孙云英(1945.8 ~ 1946.2)

吴之汉(代理,1946.2 ~ 1947.1)

孙云英(1947.1 ~ 1947.9)

吴之汉(代理,1947.9 ~ 1948.5)

刘志明(1948.5 ~ 1949.9)

秘 书

吴之汉(1945.8 ~ 1948.5)

马德全(1948.5 ~ 1949.9)

民政科科长

李 钧(1945.8 ~ 1947.9)

姜化民(1947.9 ~ 1948.5)

董逊斋(1948.5 ~ 1949.9)

财经科科长

马德全(1945.8 ~ 1946.4)

姜化民(1946.4 ~ 1947.9)

郑栋才(1947.9 ~ 1949.9)

教育科科长

薛中光(1945.8 ~ 1947.9)

吴 涛(1947.9 ~ 1949.9)

司法科科长

刘抱良(1945.8 ~ 1948.12)

李逊斋(1948.12 ~ 1949.9)

公安科科长

常 青(1945.8 ~ 1945.10)

公安局局长

吕 中(1945.10 ~ 1947.9)

陈波光(1947.9 ~ 1949.9)

建设科科长

常济民(1949. ? ~ 1949.9)

交通局局长

张西贵(1945.10 ~ 1946.7)

邮电局局长

魏含辉(1946.7 ~ 1949.9)

人民银行经理

魏嗣哲(1947年底 ~ 1949.9)

三、县地方军事组织

1945年10月,广宗县取消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广宗县人民武装委员会。1948年4月,广宗县人民武装委员会改为广宗县人民武装部。

武委会主任

王润泽(1945.10 ~ 1947.9)

田 晨(1947.9 ~ 1948.3)

武装部部长

刘抱良(兼,1948.12 ~ 1949.9)

武装部政委

司西成(兼,1949.4 ~ 1949.9)

四、各群团组织

1945年10月,广宗县撤销抗日救国联合会,分别建立了县总工会,县农民联合会、县青年联合会、县妇女联合会、县文化界联合会。1949年7月,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广宗县委员会,简称团县委。

总工会主席

刘待聘(1948.3 ~ 1949.9)

妇联会主任

张秀荣(1945.10 ~ 1948.9)

肖 锋(1948.9 ~ 1949.9)

五、县委所属区委及区政、军、群组织

第一区 包括尹村、张魏、件只、槐窝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驻董里。

区委书记

张光远(1945.8 ~ 1949.2)

毕耀光(代理,1946.5 ~ 1946.8)

王杰几(1949.2 ~ 1949.9)

区公所区长

刘卫华(1945.8 ~ 1946.5)

陈波光(1946.5 ~ 1947.9)

栗文川(1947.9 ~ 1948.5)

梁忠一(1948.5 ~ 1949.2)

李敏英(1949.2 ~ 1949.9)

武委会主任 华 震

青年团书记 魏朝祚

妇联会主任 王玉平

第二区 包括板台、宋村、郭庄以南和柏社、清村、南苏、徐家庄、常相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驻北苏。

区委书记

梁化平(1945.8 ~ 1947.9)

赵美玉(1947.9 ~ 1949.2)

董逊斋(1949.2 ~ 1949.9)

区公所区长

刘 健(1945.8 ~ 1946.7)

谢才卿(1946.7 ~ 1947.6)

卫竹斋(1947.6 ~ 1949.2)

董建中(1949.2 ~ 1949.9)

武委会主任 张西贵

农会主任 肖 锋(女)

青年团书记 陈永修

妇联会主任 高 芬

第三区 包括牛里庄、王村、李家庄、全寨、砖窑、西安以东,李磨以南,东安、小固堡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驻盐场。

区委书记

乔金生(1945.8 ~ 1946.10)

王书印(1946.10 ~ 1947.9)

毕耀光(1947.9 ~ 1949.2)

吕养正(1949.2 ~ 1949.9)

区公所区长

李 谦(1945.8 ~ 1947.9)

董立民(1947.9 ~ 1949.2)

田芳林(代理,1949.2 ~ 1949.9)

武继久(1949.2 ~ 1949.9)

武委会主任 郭仲盘

农会主任 卫华林

青年团书记 刘仲学

妇联会主任 邱玉秀

第四区 包括平台、洗马以南,夏家庄、县城、白家寨、赵家寨以西,孙家庄以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驻县城。

区委书记

王新月(1945.8 ~ 1947.9)

王书印(1947.9 ~ 1949.9)

区公所区长

赵济川(1945.8 ~ 1947.3)

刘待聘(1947.3 ~ 1949.9)

第五区 包括荆家寨、塘疃、孝路、大三周以南的村庄,区委、区公所先驻高家庄,后驻大辛庄(南辛庄)。

区委书记

郎守荣(1945.8 ~ 1947.6)

王午言(1947.6 ~ 1949.2)

刘西波(1949.2 ~ 1949.9)

区委副书记

赵明勋(1945.8 ~ 1949.2)

赵金明(1949.2 ~ 1949.9)

区公所区长

梁忠一(1945.8 ~ 1948.5)

栗文川(1948.5 ~ 1949.2)

李德清(1949.2 ~ 1949.9)

农会主任 燕常友

妇联会主任 冉清国

附录三 广曲县史料

抗日初期建立的广曲县革命斗争略记

潘芝林 王永泉

1939年至1940年,抗日战争正向纵深发展,日本侵略军控制了华北多条主要交通线,并要深入我根据地,进行“蚕食”。

1939年冬,邢(台)济(南)公路被日伪军封锁,临清、平乡、曲周、馆陶等县城相继被日军占领,并在这些县城的中间地带建筑碉堡、据点,以实施其侵略计划。为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上级党委于1939年底决定在广宗、曲周和邱县接壤地带建立一个联合县——广曲县。因情况变化,至1940年6月才在原广宗县的东贺固村正式宣布广曲县成立。1944年8月,撤销广曲县建制,并入邱县。1945年抗战胜利后,原广曲县属地各归原县管辖。

广曲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王雨亭(1940年3月~1941年11月),第二任县委书记胡代耕(1941年12月~1944

年8月);第一任县长张雨秋(又名张小川,1940年5月~1942年4月底),张去太行参加整风后,县政府由政府秘书袁香南(党外人士)主持,第二任县长吴化南(1942年底代理,1943年初任命县长)。县委、县政府下设机构有组织部、宣传部、敌工部,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粮秣科、司法科、公安局、县大队、农会、青救会、妇救会、抗日自卫支队等,全县设6个行政区。

广曲县辖境:北至邢(台)威(县)路,南至曲周县的大、小第八及原邱县的潘坡、南营,西至滏阳河,东至企之县界和临威县的刁家营。东西境宽八九十华里,南北境长六七十华里,境内村镇140多个。各区政府、区委的主要活动地点是,一区是龙堂镇,二区马疃村,三区河南疃村,四区贺固、旧店村,五区鲍庄、南营、潘坡村,六区邢济路北的侯寨一带。那里敌人封锁严密,县里曾两次派人去开展工作,来人都牺牲或被捕,后将该区划归四区。县级党政军群领导机关及领导人主要活动地点:鲍庄、潘坡、东贺固。

广曲县在抗日烽火中建立和撤销,历时4年零3个月,县委、抗日县政府在极艰苦而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坚持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扩大党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抗灾度荒,开展生产自救,支前参战以及反扫荡诸方面,都进行了艰苦卓绝

的斗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贯彻上级指示,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

1942年“四二九”铁壁合围后,抗日斗争形势日趋严峻。是年5月,冀南区党委书记宋任穷同志住在潘坡村,同广曲县委书记胡代耕同志讲了斗争形势,指示说:“鉴于当前对敌斗争形势需要,以后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也要向他们进攻,有敌区要变无敌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打入敌人内部去,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扩大根据地。”为落实这一指示,广曲县委在鲍庄村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作了具体部署安排。对县境内18个日伪军炮楼、据点打入地下党员;敌占区各村安排两面村长,明面上应付敌人,暗中做抗日工作,一有敌情县委就知道,使对敌斗争由被动变为主动。县委这一措施落实后,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保护了自己,抗日斗争形势很快好转起来。张葛炮楼打入了地下党员张三存同志,他团结有正义感的伪军作内应,县大队里应外合一举端掉了炮楼,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马房营炮楼的敌人感到恐慌不安,孤独无依,不久就自动逃离了。至1944年,县大队在各村模范班、青抗先和自卫队的配合下,先后拔掉了马连头、许家疃、大第八村等炮楼,只剩下龙堂镇的日军据点成了“瓮中之鳖”。1944年8月,广曲县合并于邱县,这片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东至高村,西至龙堂、滏阳河,北

界邢威路,南至馆陶县界,东西七八十里,南北百余里的广大地区,是冀南区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广曲县在开辟、发展和壮大抗日根据地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坚持游击战,展开反扫荡

194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军出动了一个旅团,抽调邯郸、临清、曲周、威县、馆陶等县的日伪军,分五路向广曲、邱县和企之县合击,围攻的重点是广曲和邱县,时称“四二九”铁壁合围,当时人们也叫“五路大扫荡”。事发前两天,县敌工站把情报送交县委,县委于当天召开了紧急会议,定出反扫荡对策。当时八路军七七一团和县委住西贺固村,团政委张何春列席了县委会,会议决定,避开敌人主力,沿着敌人力量薄弱的敌占区边沿进行活动,于当晚就赶到漳涿村一带。之后,县党政军群机关和七七一团又迂迴到滏阳河畔,在敌占区打游击。因敌占区的敌人兵力薄弱,不敢出据点活动,加之有当地地下党组织协助,使县委、政府和军队安全躲过敌人主力攻击,脱离险境,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生产自救,抗灾度荒

1943年,冀南大灾荒,广曲、邱县尤为惨重,历史罕见。春苗没种上,夏收麦子颗粒无收,7月初,连降大雨7昼夜,秋收不见粮,霍乱病疫大流行,灾民连连遭殃。至是年冬,一些村庄几乎变成无人村。据粗略统计,广曲县

原有 8 万余人口,因灾死亡和失散者达 4 万多,灾后,经政府赎人、赎地工作,一年后才恢复到 4 万。

那年,正当大灾十分严重之时,宋任穷和王任重同志在西孝固村召开重要会议,与会的区委以上干部 1000 多人。王任重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生产救灾,开展互助合作大生产,度过荒年的重要报告。会后,广曲县委和抗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组织运粮,开展借粮斗争;组建互助组,变工队,发展集贸经济等。那年的秋粮、秋菜和麦种,都是从各地运来提供灾民的。同时,县委、政府组织全县人民坚持生产自救,组织干部群众和军队开荒种地。

大生产运动中,各级干部都身先士卒,带领群众开展生产自救。那年种麦时,宋任穷、王任重同志都在李省庄村与群众一起拉耙、拉耩。县委书记胡代耕同志在西孟村与群众同吃同劳动。干群一条心,军民齐心协力搞生产度荒,大大增强了群众克服困难,战胜灾害的信心。

——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团结抗日

广曲县委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胆启用投身抗日的党外民主人士和各党派革命分子在县政府部门任职。无党派民主人士袁香南先被任命为政府秘书,后又代理县长主持政府工作。他团结同志、深入群众,依靠县委领导,工作很出色。政府部门中有两

名爱国抗日的国民党员,一名任科长,一名任参议员,他们均为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县委还通过敌工工作,与日本“反战同盟”的领导人秋山良照取得了联系,不断从敌人内部获得情报,做到了敌动我知,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在敌占区,县委针对敌人搞的日伪政权,利用地下党组织搞人民政权建设,团结抗日力量和中间力量,孤立和打击死心踏地的汉奸日伪特务。

——扩大党建、支前参战

1940年广曲县成立后,县委狠抓了村党支部的建设,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很快村村建起了党支部。广大青抗先队员积极要求参加八路军,共产党员带头参军参战,出现了许多父母送子、妻送郎的参军好典型。八路军七七一团扩军中,广曲县就输送兵员1000余人。为开展游击战争,有力打击日伪军,广曲县成立起西支队,后改编成八八团,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

广曲县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年代,又在峥嵘岁月里锻炼成长、发展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尤其是在大灾之年,斗敌人,战天灾,抗瘟疫,搞生产,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尽管在历史的长河中只不过瞬间即逝,但它的历史功绩,可与日月同辉,彪炳史册,原广曲县人民将永远铭刻心底,永世不忘。

几项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工作

1. 选拔干部,充实、扩大抗日队伍

广曲县是由几个县的部分地区合并而成的。上级没有派干部,只有自己培养、选拔干部,这是建立广曲县后首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选拔干部采取的方法是:(1)由现任的领导干部推荐,如县长张雨秋同志推荐了不少;(2)开办训练班,选拔了一批干部;(3)由农村支部推荐,经县委考察后使用。通过这样一些办法,选拔了县、区干部,那时全县干部约200人左右。

2. 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

采取的办法:一是由现任的干部党员下村工作发现积极分子;二是村支部做出计划发展党员;三是开办训练班,从中发展党员。通过这些办法,发展一大批党员,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那时,广曲县的党员总数至少有四五百人,大部分村庄都有党支部。

3. 举办县、区党员训练班

大约举办了十三期,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觉悟和素质。此外,县委委员、区委委员经常深入支部,既帮助了支部工作,又加强了对党员的教育。

4. 加强抗日村政权的建立

主要做法是:凡是有党员的村,一般选党员当村长;没有党员的,也是选比较进步的人当村长;在敌占区也是

选靠近我们的人当村长。此外,还推行了合理负担,即地多的、富的,多拿公粮;贫苦的、地少的,少征或免征公粮,以巩固村政权的建设。

5. 建立县、区游击队及村自卫队、模范班

那时,县建立了七八十人至一百人左右的县大队,区建立了二三十人的游击队,村建立了自卫队、模范班。

6. 建立各种群团组织

县里建立了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村里凡是有条件的,也都建立了相应的群团组织。

7. 扩军,动员青年参军

那时,每年冬季搞一次扩军,一次约二三百人,小村一个,大村两个,特大村庄(比如龙堂)三四个,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

8. 配合对敌斗争,开展破路、打狗、藏粮运动

破路,就是把路挖成一米深的沟,村村相通,便于我们游击活动。打狗,就是我们夜间活动时,狗乱叫,容易被敌人发觉,对我十分不利,因此开展打狗运动。藏粮,就是麦、秋之后,动员群众把粮食藏起来,也就是“坚壁清野”,不让敌人抢走。

9. 减租减息

其方法是:由政府号召,并与发动群众相结合,进行减租减息。那时是统战环境,对地主、富农还是争取抗日

的方针,对贫苦群众尽量减轻其负担。

10. 剿匪工作

广曲县开始成立的时候,大股土匪不多,小股土匪不少。对惯匪该争取的争取,该镇压的镇压;对零星的小股土匪进行了清剿。通过剿匪工作,安定了社会秩序。

11. 统战工作

每年总要召开一两次开明士绅、上层人物会议,动员他们抗日。

敌伪情况及敌工工作

1942年,敌人搞强化治安,到处修炮楼、安据点。敌人在广曲县共修炮楼、据点18个。其中据点7个:龙堂、马兰头、七岔路(霍桥)、大三周、油堡、张葛集、琵琶张(现在的南、北琵琶张);炮楼有11个:郑三周、冯家寨、马房营、小房(现在的新立村)、北塘疃、丁庄、许丁疃、马疃、第四疃、大第八、马屯。

外围据点对我威胁最大的有:鸡泽邢堤,平乡的郭桥、常河镇、高阜镇、河古庙,威县的第什营。

最坏、最顽固的敌伪人员,一个是七岔路炮楼的伪小队长张子芳(曲周南关人),死心塌地当汉奸,曾打死我三四个区长,杀害了我很多干部,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解放永年城时,张贼畏罪自杀。另一个是龙堂炮楼的伪小

队长蒋大麻子。

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大力开展了敌工工作。敌占区的伪村长都是我们安排的,广曲县的18个炮楼、据点,村村都有我们的党支部;炮楼里面打入了我们的人,情报及时,对敌斗争主动;对个别投敌叛变的,随时予以严厉制裁。县武装部刘风刚投敌,三区刘某叛变,公安队都把他们击毙了。具体情况有:

1. 里应外合拔据点。我地下党员张三存任伪军班长,我们里应外合,利用敌人之间矛盾拔掉了据点,消灭敌人三十多名,缴获枪支三十多支。

2. 孤立、威逼马房营据点。马房营据点驻扎着治安军,我们利用关系,通过拜把兄弟、吃喝请客的办法摸到敌人情报,于是采取先拔掉张葛据点,然后孤立马房营之敌,迫使敌人不久撤走。

3. 内线协助击毙叛徒。马兰头据点驻扎着日军一个班,还有伪军,是广曲县的一个大据点。为打击敌人,党派刘某打入内部任伪军班长。有一次,叛徒刘某出发要去龙堂,地下党员刘某事先送出情报,于是,我们在史庄打了埋伏,当场击毙刘某。

4. 我七七一团指导员赵崇发叛变投敌,对我们威胁很大,不到半年时间,通过邢台敌工工作,把他杀掉了。

5. 智擒叛徒。广曲县四区武委会主任耿八到威县投

敌,他自动报名要抓区委书记梁化平。油坊村地下党员刘柱同志随即向梁汇报了这一情况。刘柱马上找到耿八,诱骗耿八到村去抓梁。进村前,刘要看耿的枪,随即下了耿的枪,抓住了叛徒,后处决。

重要指示及会议

1. 宋任穷同志在潘坡给胡代耕的亲口指示。

1942年“四二九”后的夏季,冀南区党委书记宋任穷同志到潘坡,把县委书记胡代耕同志叫去,亲自讲了斗争形势,指出:“现在斗争越来越复杂艰巨,敌人的据点越来越多,我们的斗争方式要改变一下,敌人向我们进,我们向敌人进,敌进我进,要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我们的地下党要打入敌人的内部去,这样,有了敌人情报我们马上就通知。”我们按照这项重要指示,认真贯彻执行,做好敌伪工作,广曲县的18个日伪据点和敌占区都打入了我们的党员。村长表面上应付敌人,实际为我们工作,一旦有了情报或敌人扫荡,我们就往炮楼底下跑,这样地下党就保护了我们。

2. 鲍庄召开县委会。

1942年秋季,冀南四地委书记王任重和四旅第二政委钟汉华二同志来到鲍庄召开了县委会。会上,进一步贯彻了宋任穷同志“敌进我进”的指示,做了加强敌伪工

作的安排和部署。

3. 宋任穷、王任重在西孝固村召开冀鲁豫分局生产救灾会议。

1943年冀鲁豫分局书记宋任穷、冀南区党委书记王任重,在西孝固村召开区以上干部会议,与会一千多人。王任重讲了生产救灾、生产度荒、开展互助合作的问题。互助组就是那时搞起来的。

4. 宋任穷在西孝固村召开县委书记以上会议。宋任穷同志作了“第三国际解散”的形势报告,并讲了冀南斗争形势,讲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坚定了信心。

主要战斗

1. 孟村战斗

1943年7月的一天拂晓,河古庙和广宗的日寇、皇协军出动一百多名,包围了孟村,目的是要搞掉我们公安队。当时县委也住在孟村。公安科长张广恩同志为保护县委的安全,带领一个排往外冲,打死了日军小队长,杀伤了不少敌人。枪一响,我驻花台的十一团十连战士打了过来,战斗持续两个小时。张广恩同志打得很英勇,打完最后一颗子弹,被日本兵抱住,后壮烈牺牲,还有一名战士负伤。如果没有张广恩同志的英勇抵抗,县委会会有

很大伤亡。战斗结束后,将张广恩的遗体安葬在鲍庄南。

2. 南营集战斗

1944年初的一天拂晓,天下着雨,马房营皇协军、治安军300人包围了南营,想抢商店里的物资和粮食。当时,县委书记胡代耕、五区区委书记梁化平和副书记张秀荣都在这个村里。驻南营村的部队有我十一团的一个半连和游击队三四十人。十一团总支书记请示胡代耕同志该怎么办,胡书记指示“要抵抗一下”,打了个口子突围出来。这次战斗我们没有伤亡,可商店里的东西及粮食被敌人抢走了不少,商店经理贾亦农等七八人被敌人抓走。

3. 城角战斗

1944年初,县委住在鲍庄,县大队住在城角。日本鬼子、皇协军和治安军出动两个连,其中有一个骑兵连。当敌人走到城角正往鲍庄活动时,被我城角岗哨发现,向敌人开了枪。敌人不知道城角有我部队,他们听到枪声,即返回同我城角驻军打了起来。县委听到枪声,顺沙河向大寨方向转移。这次战斗很激烈,指战员非常英勇,消灭了很多敌人,我们伤亡也不小。大队总支书记王清义、司务长小林英勇牺牲,还牺牲了几名战士。

4. 潘坡战斗

1944年,县政府、县大队、公安队都驻在潘坡。龙堂据点和曲周的日本鬼子、皇协军去了一百多名,先摸了我

们的岗哨。张长连和公安队往东冲,因有日本洋狗,三次没冲出去,最后从枣坡冲出去了。公安局崔生光带队往西冲,头部负伤,牺牲战士二三十名。

5. 油堡战斗

“四二九”铁壁合围后的秋季,油堡据点我“内线”人员送来了威县敌人要出动一个中队兵力的情报,住在鲍庄的县委书记胡代耕同志及时作了战斗部署,由十一团一个连同四区游击队在油堡打了伏击。那天,敌人使用毒瓦斯,我们就点自己制造的配有辣椒面的火药,呛得敌人捂鼻子盖脸。我战士英勇射击,战斗一天,打死敌人十几个,缴获十几支枪。

6. 拔孙庄炮楼

孙庄炮楼有我们的“内线”,这次战斗是区中队去的,里应外合,缴获了敌人十几支枪,拔掉了这个钉子。

7. 拔张葛据点

我内线人员张三存同志,当时任张葛据点班长。当他报来张葛据点常驻伪军一个中队,现在只有三十多人的情报时,县委即命令县大队和四区游击队的一个基干连近百名指战员,包围了张葛据点,先打了几枪。张三存在据点内听到枪声,立即向敌人打了起来,里应外合,很快结束了战斗。三十多名伪军被歼,缴获三十多支枪,并烧掉了炮楼。这次战斗以后,马房营、冯家寨、小房等十

几个据点和炮楼之敌被孤立,不久都跑掉了。

8. 邢济路战斗

1943年5月,威县日本鬼子乘四辆汽车,往邢台方向撤退。我获情报后,胡代耕政委派县大队两个基干连和两个游击队,在大队副王顺如和张长连带领下,埋伏在三周以西邢济路上。次日上午,敌人进入埋伏圈,当场击毙11个鬼子,7个鬼子狼狈逃到常河镇;此外还烧掉了4辆汽车,缴获了敌人电台、文件等。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我方没有伤亡,受到冀南军区通报表扬。

9. 北辛庄战斗

1942年“四二九”后,在北辛庄打了一仗,张雨秋县长、胡代耕书记都在场。七七一团两个连都参加了战斗,夏营长指挥,激战两个多小时,消灭鬼子二十多人。

10. 常河镇伏击战

1943年春,旧店、塘疃、冯家寨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同县大队一起在常河镇伏击日伪军队,炸死敌人三十多名,缴获汽车八辆,轻武器三十多件;同时,还缴获一批文件、日币和其他物资。

11. 河南疃战斗

1941年底,敌人从邢济路出来到河南疃抢粮,我县大队将伪军包围。经此一战,打击了敌人气焰,使其很久不敢出来活动。

12. 夜袭牛屯黑团

敌人的武装外围组织——黑团,是由刘志香组织的,在牛屯住了一个队,约三十余人。有一次,刚吃完晚饭,县长张雨秋即带领县大队摸了进去,活捉了站岗的,然后到他们队部,将黑团人员全部逮住,枪支也全收了,仅有一个队长在外面住未捕获。

13. 里疃—宁屯战斗

1944年2月间的一天拂晓,平乡城内敌人伙同河古庙之敌三百多人包围了河南疃(因头一天公安局在此住过)。扑空后,随后又向狼屯扑去,又扑空,回头向里疃合拢而来。这天,大雾弥漫,百步不见人。我公安队岗哨发觉敌情后,敌人已逼近驻地。我公安队掩护一部分政府人员向北转移,撤到宁屯南的一个牧场,敌人已成三面围攻之势。我公安局三股长郭志彬负伤后仍英勇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三股长郭志彬、干事吴文林、班长范有善等当场牺牲;三股干事李光志、公安队长燕玉恒、分队长温玉臣、战士赵福存等六人被捕,在押犯人十几名被劫走,造成一次极其严重的惨案。

14. 胡近口截击战

1943年,有一次,据内线报告:敌弹药车将于2月19日经过胡近口。广曲县五、六中队战士埋伏于胡近口公路两旁。当敌人弹药车到来时发现日本宪兵队,情况

与报告不符。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两名战士牺牲。其中一名肚子被打破后,肠子流出肚外,还用手挖了一条沟把枪和子弹埋掉。中队长王新华负重伤。这次失利的原因,一是情况侦察不清,二是濠河大队配合不好。

15. 流上寨伏击战

1943年春天,县大队埋伏于流上寨村西大路旁,敌一个排包围了流上寨,被我活捉二十多人,全部收械。

16. 旧店战斗

公安局一股长张孟堂于1941年七、八月间,在驻地发觉敌人来犯,只身带领一个队员冲上前去阻击敌人,表现了不顾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俩同志同时牺牲。

17. 摧毁马兰头炮楼

马兰头村我地下党员刘风非,打入马兰头炮楼充当伙夫,作内线工作,争取了伪团长杨清献等18人。致使1943年7月间县公安队围攻该炮楼时,杨等携带枪支全部投诚,并在投诚前将死心塌地的韩丙贞枪毙。

18. 追击叛徒刘风刚

1942年6月,支队长刘风刚投敌到马兰头炮楼。在他带两个伪军去龙堂炮楼时,被我公安队打死在李庄。

重要事件

1. 一区区长宋德昌(宋长书)于1943年9月,被龙堂

敌人追至付庄村外盐土疙瘩里,负伤后还破口大骂敌人,后被敌杀害。

2. 1943年11月间,县级机关住在五区南营,被广宗敌人包围。政府、公安队、县大队都冲出重围,而工商局长贾亦农、监委陈学明、五区区长李铁民未冲出,后被捕。

3. 二区区长张金山,1943年秋在南辛庄打埋伏,县大队撤走后,敌人突然出发,被俘牺牲。

4. 张福卿到二区任区长时间不久,被杀害于北辛庄。

5. 县支队长王金奇、二区游击队指导员尹平安及县大队一连邢指导员,1943年10月牺牲于流上寨。

6. 二区公安助理李海同志,1944年1月间在北辛庄被七岔路敌人杀害。

7. 六区开辟沟北工作时,当天(1943年11月间)晚住在东铺村,拂晓被广宗敌人包围,助理员袁正身当场牺牲,其余失散,沟北工作终未开辟。

8. 县政府秘书袁香南,1943年探家时被敌人抓去,后牺牲。

9. 县武装科支队长李庭荣同志,1942年四、五月间率五区模范班,在阻击河古庙敌人的战斗中身先士卒,牺牲于许疃。

广曲县的撤销

根据形势的发展,上级指示于1944年8月间将广曲县合并给邱县(因当时邱县根据地较大,这样比较有利于对敌斗争)。历时四年多的广曲县党政军民以自己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在冀南的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附录四 重要文献

(一) 陈赓大将(1939年)日记摘抄

一月十八日

师十六日电,令我指挥六八八团、补团、七七一团、东纵三团(即八路军东进纵队第三团——编者注)、程支队(系我军在冀南地区新发展组建的一支地方武装。首任负责人为程启光同志,故称程支队。该部建制属当时的冀南军区——编者注)、先支三大队(一二九师先遣支队的简称。该支队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组成,李聚奎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编者注)、吴部(吴作起同志率领的一支游击队,活动地区在冀南——编者注),机动于曲周、广平、肥乡等一带。补团现已进至威县以西之高家庄(属广宗县),准备迎击平乡东进之敌。我决率六八八团明日向补团靠拢。

根英去师部。

一月十九日

今日进到马房营。令六八八团与补充团干部侦察

威、平间地形,随时准备战斗,打击平乡可能前进之敌;并拟定作战方案召集各团长面授任务。

一月二十日

平乡之敌百余人来河岸侦察,与我补团的一个连隔岸火战,敌死伤数人,退回城内。

一月二十二日

许世友同志调任本旅副旅长,东山调东纵任副司令。召集团级干部传达师的指示。旅直准备开香城固。

一月二十七日

(陈)再道率骑兵团、骑兵大队及青纵一团南下,准备配合我们侧击可能进攻威县或广宗之敌。师令我统一指挥之。

一月三十日

(王)新亭、(许)世友组织一小司令部出发。师电令东三团开束鹿。

下午为司令部直属队干部讲课——六中(全会)决议。约3小时。

一月三十一日

这几天敌人除每日以炮向我轰击外,无他动作。敌人不出,我无法进行战斗,只好以游击队深入敌后方。

下午仍讲课。

二月一日

今日曲周之敌汽车十余辆,炮数门,上午十时突向我古城营、后旧店袭击。我补团(缺一营)即由油房、马房营突击敌之右侧背,我六八八团由石井疃、贺固、南营突击敌之左侧背。敌顿时溃乱,向西逃窜。我补团即截击于燕张葛,激战数小时。敌又由西增援汽车数辆,炮一门,汇合残敌向我猛攻。六八八团突击失时,敌乘黄昏突围西窜。是役计击毁敌汽车二辆,目睹敌伤亡至少在一百以上。我亦伤亡一百二十余名,内营长一、连级干部四、营组织干事一、团教育股长一。

二月二日

得师电,谓进攻旧店之敌,昨晚宿营龙堂。我决心集中力量消灭此敌。拂晓,即令六八八团、补团集结东西李莲头。十时得侦察报告,龙堂无敌。决心率六八八团、补团进到威平大道间,配合再道部突击向威县前进之敌。

部队抵常阜村,见敌汽车九辆由西向威县进发,但距我尚约七八里,射程不够,当即以六八八团向威县接近,准备敌占威县未稳之际跟踪袭击。敌发现我企图,刚进威县,随即返回,向西窜去。我决心以六八八团、补团伏击于辛庄至南孝路之线,配合再道夹伏此敌,各团均按我企图进入埋伏处。

二月三日

据报,昨晚赵家寨之敌,步炮骑约一千五百余人,乘深夜由大道北通过我两个部队间偷入威县。决定今日部队在渭上营、琵琶张之线停止,并夜袭威县之敌。侦察报告,威县城墙拆不彻底,东西南城尚无法爬上。决定以六八八团之一部袭击此敌。

二月四日

师令我们开香城固。昨晚袭击未奏效,仅给敌人以消耗。上午进到香城固,与七七一团汇合。

(二)《冀南日报》

1939年9月18日,由冀南文化界抗日救国协会主办的《冀南日报》在广宗县抗日根据地创刊。该报为三日刊,石印四开四版。社长艾大炎、总编辑莫循,记者、缮写

员、石印工人、发行员、交通员、炊事员共 13 人，散居在槐窝、杜家庄、北杨庄和刘家庄一带的农村。报纸创刊时，条件异常艰苦，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农民家地桌、炕头就是编报的场所。编辑部只有 1 部收音机，用来收录时事新闻。莫循除写社论、评论及其他重要文章外，还兼编 1 个版面。每编完一期，大家一齐动手分发、卷束、贴标签。《冀南日报》除印一部分就近发行外，还制出纸型，由民兵、爱国商人以及儿童团员经过秘密交通站，星夜不停地传递到各个分区。

《冀南日报》一出刊，即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导，努力唤醒与引导人民群众团结抗日，因而声誉日隆，名闻遐迩。为进一步办好《冀南日报》，中共冀南区委决定从 1940 年 4 月 1 日起，该报由冀南区党委主办，并决定由莫循亲兼社长。在中共冀南区委领导下，报社机构不断得到加强与充实，社委以下增设了编辑部、印刷部、供应部、管理部，并设立了电台。到是年 9 月，编辑队伍发展到近 70 人，在各条战线上都有自己的记者，还有 18 名特邀记者，220 多名特邀通讯员，成为冀南根据地一支坚强的、战斗的文化纵队。与此同时，冀南 6 个专区均建立了分社，负责印刷发行工作，覆盖冀南全区的发行网建立后，报纸的发行量达到 7000 份。

1940 年秋，《解放日报》记者哈华到冀南采访，他看

到新出版的《冀南日报》后写道：“在犬牙交错、战争频仍的环境里，要出一张报纸，他们的困难，后方的新闻从业者是无法想象的。”他参观了报社后写道：“报纸由编辑编好，由通讯员秘密送到印刷厂里去。说起工厂，人们会很熟悉地想到机声震耳的机器房，可是在这里，你却在村庄的任何地方都找不着它们，它们被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当要印报纸的时候，从一个最不使人注意的地方，如粪土堆，或草垛、牛槽下弄开一个洞口，下去一些工友，第二天报纸就与读者见面了。”（1945年10月18日《解放日报》）

《冀南日报》的蓬勃发展，引起敌人的极度仇视，他们一面派出特务阴谋破坏报纸的印刷和发行，另一面出动重兵“围剿”报社所在村庄。每每皆因人民群众的掩护和保护而化险为夷。一次，敌人“扫荡”报社所住的村庄，在庄上“清剿”了三天，也没发现报社的踪迹。敌人鞭打未逃走的老弱妇孺，要他们说出工厂在什么地方。敌人把一个13岁的孩子，拴住一只胳膊吊在树上，把孩子的衣服脱光后死命地抽打，可这个小孩只是痛苦地掉着眼泪，什么也不说。敌人又抓来一位老年人，拴住他的双脚倒吊起来，并用刺刀刺遍全身。老人身上的血一滴滴落在地上，他只是默默地呻吟着，一句话也没有说。就这样，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为保护报社的安全付出了巨大的牺

牲。1942年“四二九”铁壁合围后，冀南的环境急转直下，出版《冀南日报》极为困难，即便印出来，发行出去也十分不便。《冀南日报》被迫暂时停刊，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9月11日复刊，1949年7月终刊。

《冀南日报》在极端困难和艰险的情况下，积极宣传了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消息，报道了全国抗战的形势及本区对敌斗争的情况，报道了根据地根据十大纲领实行民主、发展生产的政策，宣传了党在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各项方针。还开展了对敌伪的宣传、瓦解、争取工作。在宣传、组织、鼓舞群众去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抗日军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1945年10月延安《解放日报》曾以整版篇幅报道冀南新闻工作者浴血奋战的光辉事迹。重庆进步刊物《全民抗战》记者苗培时专程采访《冀南日报》，并撰写了《冀南人民的喉舌》一文，说：“在那种残酷的斗争环境，居然安装上机器，印成报纸，真是奇迹！”

(三) 黑红点

吴伯箫

(1944年10月3日)

编者按：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型文献资料《天下之脊》记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冀南抗日军民在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军事打击之同时，又对敌伪人员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尤其是广宗县的抗日军民还为境内敌伪军警宪特人员建立了“生簿”和“死簿”，创造性地用记“红黑点”的办法记录其“善恶”，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史称“黑红点”、“生死簿”或“善恶录”。1944年10月3日，著名作家吴伯箫采写了《黑红点》一文，将这一创造发明介绍到其他抗日游击区，促进了政治瓦解敌伪活动的深入开展，动摇了敌伪军的军心，加速了敌伪阵营的分化和瓦解，削弱了敌军的战斗力，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为即将开始的大反攻创造了条件。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有道理，但神是没有的。掌握善恶报的不是冥冥中有什么神，而是活生生的

人。这人是要多数的,群众,大家。大家说好的,是好人,因而有群众拥护的领袖。大家说坏的,是坏人,譬如说:“这家伙还不死啊!”那他就该离死不远了。古时候对专制独裁的暴君,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对常人,有成语叫“千人所指,不病而死。”

黑红点就是冀南敌占区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抗日政府,对汉奸、伪军、帮敌人当狗腿做坏事的家伙的善恶记录。老百姓有那些坏人底名册。哪个做一件好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红点;哪个做一件坏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黑点。抗战胜利后算总账(一九四二年这样提)。那时看红点多的,可以将功折罪,他还有活着做一个幸福的中国人的机会。若是黑点多,不必等抗战胜利,到一定点数,就要打死他。该打死一定打,他“皇军”老子也保不了险。(“皇军”自己谁保险呢?)因此,那名册老百姓也叫它生死簿。

本来,只要是中国人,还有良心、人心,好坏事总该是分清的。即便不讲大道理,难道就不能问问自己?做汉奸当伪军的,自己吃要吃得饱,穿要穿得暖,可是把乡里邻居粮食、衣服抢了,看着他们挨饿受冻,自己房子要住得讲究,住得舒服,可是把叔叔伯伯们仅有的几间草屋烧掉、捣毁,逼他们到旷野里任雨打风吹!最可恨,自己是娘养的,早晚也会娶妻生女,但是却奸淫人家的母亲、妻

子、闺女！丢掉祖宗底坟茔，邻舍底孤寡老弱，任野兽一样的强盗去践踏杀戮，自己却反转去孝敬那些强盗，帮助那些强盗，啜食一点人家分赃剩下的残羹唾余！世间还有比这再下流再无耻的事么？你心上长满了油，昧了良心的汉奸啊，要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该为子孙留条后路！

.....

正因为伪军伪官，并不都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有的只是贪图小利或一时糊涂，陷入了泥坑，我们老百姓、八路军才不惜用各种方法把黑红点的道理向他们宣传，挽救他们。我们在夜里敌人不敢出来的时候，去据点碉堡跟前喊话：“今晚上我们来给你们上课啦……”起初他们听了很恐慌，向我们放枪。但放枪我们还是喊：“某某，你听着……”我们指了名喊。“我们底名字他们都知道啊！”为了好奇，他们也不得不武装着听讲。其实，对这些家伙，我们不但知道他们底名字，并且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父亲是谁，家有几口人，甚至他们当伪军是谁的保人，使什么枪，有几粒子弹，我们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我们说：“某某你太坏了！那一天你打了谁，那一天你骂了谁，那一天你到哪里抢了谁谁谁家里几匹布，几百斤粮食，几只鸡……”碉堡里就往往沉静下来，有时听得到一两声嘘唏，因为说得太对了。这时我们就趁势告诉他们：“不要

打骂老百姓,不要枪杀老百姓,不要糟蹋人家底妇女!你们做的坏事我们都记着的,要改,不改就搞你……”

慢慢地伪军动心了,对喊话也表示了欢迎:“来吧!靠近一点,我们不打枪。”有的还丢下烟卷来。对提出了名字的最坏的伪军他们也给予孤立:“唔,你上了生死簿了,我们再不和你在一起,背霉气!”被提了名字的就赶快表示态度:“我再不做坏事了。”“我从今后改了行不行?”

.....

宣传不够,老百姓就进一步警告他们。

警告再不行,就消灭他们!——黑红点是兑现的。

广宗董里集,有个伪警察所长,叫张某,土匪出身,人称“张八爷”。因为杀人不眨眼,又叫“张剥皮”。他曾三天里边杀死四十三个好百姓。这一带人都恨他入骨。我们抗日政府就贴了布告,宣布他几大罪状,把他做的坏事一股脑儿都揭露出来。明白告诉他,那一天要打他。——这家伙住在碉堡外边,每天夜里回家睡觉,并且经常在董里集上一家小酒馆喝酒,往往喝得酩酊大醉。那天凑巧傍晚他又在那家酒馆喝酒,我们武工队就在酒馆附近埋伏了。等他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酒馆掌柜仓皇地进去告诉他:“不好,八路来了!”他慌里慌张地跑出来,嚷着:“八路在哪里?”我们武工队啜的一枪:“八路在这里!”他就像真的“醉”了一样,一头栽地,再也不

起来了。

这个坏家伙死了,敌人又派了一个新所长来,更坏:硬要叫董里集的村长去给“张剥皮”祭灵。可是灵没祭成,他自己底灵魂却又跟着我们武工队底枪声投入地狱了。

黑红点就这样有灵验。因为他不是鬼神的指使,而是人民大众的裁判。红点,不是焚香叩头能求得来的;你要做好事:坚决抗日,爱护群众。黑点,也不是吃斋念佛能禳除得掉的:你要不做坏事;不帮助敌人,不掠夺、打骂、捕杀百姓。这样伪军伪官就不得不打打算盘,伪军伪官底家属也就不得不替他们底不肖子孙、刁夫贼父捏一把汗了!于是有伪军底妻子到碉堡去叫她丈夫的事,有伪军底母亲到据点去哭她底儿子的事……李家屯炮楼里的伪中队长听说老百姓提出来要搞他,他赶紧声明:“往后不再做坏事就是!实在我也很难,譬如某村底村长是暗八路(共产党),难道我不知道?他来了我也没把他怎样……”有的更具体地提出了保证条件:一、到拔碉堡的时机来了,不用拔我就带弟兄们投降;二、抗日人员可以随便过路,我们看见也装没看见……慢慢有了“伪属协约书”。只要伪军父兄能确保他底子弟不烧不杀,不抢不捉,和我们打仗枪口向上,那么老百姓就确保他家底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抗日居民一样。为了郑重,这“协约书”

特别由抗日县政府盖印保证。老百姓和抗日政府又给做好事多的伪军发“回心抗战证”，凡带证的回家或被俘都一律不杀。但是发了证后再做坏事，就宣布无效，也并不迁就。

.....

告诉那些替敌人说话、替敌人跑腿、替敌人做事的人吧：

“不要做坏事啊！你底名下会多一个黑点呢。”

老百姓底评判，是最后的合理的评判。（节选自上海文艺出版社《烟尘集》）

（四）冀南军区司令部在葫芦

1947年9月，国民党军队在攻占大名后，气势汹汹向北推进，准备攻占我冀南解放区。为领导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陈再道、王光华、刘志坚等冀南军区首长率领军区机关转移至广宗县葫芦一带农村。军区司令部设在张葫芦村滕丙行家，政治部设在姚葫芦姚国乾家，警卫营驻韩葫芦村西基督教堂，军区电台架设在赵葫芦西头街北赵云旺家，供给处及后勤部队分别驻扎在李樊村、贾樊村、杨樊村等村，军区干部家属驻在王胡寨、张伏城、卫伏城等村。

1947年10月下旬，冀南军区在姚葫芦村召开重要会

议,研究部署自卫战争作战计划和南下事宜。会后,军区所属两个旅随二野十纵挺进中原,开辟新区。次年7月21日(农历六月十五),冀南军区在赵葫芦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改编事宜,宣布冀南军区所属部队改编为东进纵队。尔后,东进纵队之一部北上天津、北平参加平津战役,另一部分南下陇海线,参加淮海战役。

冀南军区在葫芦期间,所属部队先后参加了邯郸和临清的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确保了冀南解放区军民的安全。此间,军区还在葫芦村成立“子弟学校”,除培养部队干部子弟外,还招收周边农村农家子弟入学,为解放后葫芦小学的兴旺奠定了基础。

(五) 广宗县抗日政府布告

民字第壹号

为布告事案奉

专署令各开「关于地区分并根据行署指示令经本署讨论决议将邱县所属原广宗县村庄仍划归广宗」等因奉此道经会同邱县接收清楚兹为领导便利当将全县境重新划归五个区并委任刘卫华同志为第一区区长刘健同志为第二区区长李谦同志为第三区区长赵济川同志为第四区区长梁忠一同志为第五区区长除分令并飭各该区长到职

执行职务外合将各区所辖村庄开列于后俾众周知

此布

县 长 孙云英

广宗县(抗日)政府(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

(六) 广宗县抗日政府通令

民秘字第一号

令各区村

一为重新划分区村并确定各区长由——

为令遵事案奉

专署令各开「关于地区分并根据行署指示令,经本署讨论决议,将邱县所属原广宗县村庄仍划归广宗」等因奉此遵经会同邱县接收清楚,兹为领导集中当将全县境重新划归五个区,并划定张尹村、张魏、件只以北之村庄为第一区,调前任四区长刘卫华同志为第一区区长。马鲁湾、柏社集、前清村、徐家庄、谷常相、王常相、陈家庄以北之村庄为第二区,仍由第二区区长刘健同志继任。小固堡以北贺家庄、洪家庄、姚家庄、周家庄、大小王村、周田庄、西牛里庄以东村庄,划为第三区,由第三区长李谦同志继任。侯家寨、赵家寨、东西安上以北及刘全寨、李家

庄、夏家庄、白马刘家庄以西村庄为第四区,调前任五区区长赵济川同志为第四区区长。其余村庄为第五区,区长仍由梁忠一同志担任,除布告并令各该区长到职执行职务外令仰各区村知照为要!

此令

县 长 孙云英

广宗县(抗日)政府(印)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四日

(七) 广宗县敌祸天灾损失调查统计表

(1946. 3. 1)

单位:人、间、头、只、件、辆、斤、元

		敌祸损失		天灾损失			
人	被杀人口	9771	水灾	被淹亩数			
	负伤人口	1436	旱蝗灾等	被害亩数	403000		
	被拷打者	60344	死逃人数	死	9158		
	被抓壮丁	2887		逃	6261		
	被征劳役	29178					
	被奸淫者	3180					
	因奸得病	200					
	冻饿死者	2424					
口	造成难民	27952					
	鳏寡孤独	1453					
	财	烧毁房屋	21527				
		被抢粮食	40723023				
		被抢牲畜	7524				
		衣服被褥	43472				
		被抢鸡鸭	325622				
		被毁器具	327834				
被毁树木		27813					
被抢猪数		27755					
被抢羊数		1939					
被抢车辆		2034					
对敌负担	被征小麦	6688000					
	被征米粮	32250000					
	被征棉花	376200					
	被征铜铁	167244					
	被征税款	41800000					
	敲诈勒索	5250000					

(八) 广宗县政府通令

财字第十三号

令各村区公所

——为督造公平负担并附发冀南三十五年度公平负担暂行办法仰即遵办由——

查夏收在即兹为了准备麦征工作保证军民供给,目前急须督造公平负担,以利征收,最近行署颁发新修正之三十五年度公平负担暂行办法又进一步公平合理随令附发。仰即遵照此办法督促填造,于六月十日前造妥,区于十五日前总结,并将总结表送县以便汇报事关军民供给问题,切勿延忽为要!

此令

附公平负担办法一份

县 长 孙云英

广宗县政府(印)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九)(民国)三十五年度公平负担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办法依据新修正冀南区公平负担办法本简单易行公平合理之精神制定之。

第二条 本区之农业及农村工商业负担均依本办法计算(城镇工商负担,另有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对农工商业之计算征收依下列规定:

一、农业以人为计算单位,以户为征收单位。

二、工商业之计算与征收均依户为单位。

三、以农业为主兼营工商业或以工商业为主兼营农业之民户其工商业部分均并入农业计算。

四、农工商业之计算均以标准亩为单位。

第二章 工商业之负担与免负担

第四条 下列收入一律负担:

一、房租收入。

二、公营私营以及公私合营之工商业和手工业作坊

之收入。

三、大批羊群之收入。

第五条 下列各种收入一律免负担：

一、家庭手工副业及畜养(牲口、猪、兔、鸡、鸭等)之收入。

二、其流动资本在五千元以下所经营之各业收入。

三、经政府批准,□□以村为单位之合作社经营收入。

四、经政府批(准)备案之交易合作社经营小组机关合作社减半负担以一户一人计算不累进。

第三章 计算折合和扣除

第六条 土地收入折合依下列规定：

一、土地收入：以旱田二百四十方步一亩之收入为一标准亩,其大亩小亩均须折成二百四十方步之旱田亩,一亩按一亩计,收入少者不折除,多者亦不累加。

二、砂碱洼地依上述标准按二、四、六、八折合。

三、井浇地和菜园依上述标准亩每亩按一点二亩、一点四亩、一点六亩折合计算,河浇地按一点二亩、一点四亩、一点六亩、一点八亩、二点零亩折合计算(砂碱洼地用河水浇者,以上述标准亩折合)

第七条 工商业负担之折合依下列规定：

一、属于工业者其纯利每十五市斗谷折一标准亩。

二、属于商业及房租收入其纯利每十市斗谷折一标准亩。

三、属于工商混合业者,其纯利每十五市斗谷折一标准亩。

四、此条所称收入指阳历一月至六月底之收入,收入折谷按时价作计算。

五、个人经营者合于本户累进计算合作社及经营小组以一户一口计(不累进)。

第八条 长年雇工在其雇主家内,扣一亩基本地。

第九条 牲口不论牛马骡驴每头扣标准地一亩。(兼营商业者按商业计算不再扣)。

第十条 租佃地由地主一方负担,地主如系“法人”应由该“法人”负担,但学田官产不负担,典当地列入承典人地亩累进,计算负担。

第四章 免征点最高率级数累进之规定

第十一条 免征点:

一、不分男女老幼在家者,每人和基本地一亩其余按级累进负担。

二、全家每人平均地(标准地)不足三亩者,每人除基本地一亩半(标准亩)。

三、全家老弱残废又无生产能力(抗工军工人员均不算作在家之生产力),每人平均土地不足五亩者(标准亩)每人除基本地二亩半,每人平均不足十亩者每人除基本地二亩。

四、烈属不分阶层,其同居之直系亲属各多扣基本地一亩。

五、抗日军人、抗日工作人员家属(后简称抗属)除应扣之基本地外,其同居之直系亲属及本人,每人多扣基本地半亩。日本投降后,参加之工作军人工作人员(简称军工属)只在家计算人口,除免征点并不算本人之劳动力,其直系亲属不另多扣除基本地,退伍荣誉军人按抗属计算。

第十二条 本办法级数规定一亩一级,第一级负担一亩算一亩为不累进,自第二级起按累进法计算到二十一一级为止。

第十三条 累进率为六厘,每高一级多添六厘,以二十一一级为最高率,其二十一级以上之亩,每亩均以二十一一级计算负担。

第五章 人口计算

第十四条 不在家者,不计人口,但参加抗日之军人工作人员及新参加之军工人员,有证明者计算人口。

第十五条 雇工店员工厂工人,应列入其本家,如系长年在外者,只计人口,不除免征点,其他外出者,不计人口。

第十六条 寺院教堂及庙地以一户一人论,不除免征点。

第十七条 凡财产在一区内者,采(用)属地办法,均在其所住村合并计算,统一征收,在数县或数区者,采(用)属地办法,除住在地按其人口计算外,其他处之土地及其他收入,均按一户一人计,不除基本地,但邻县邻区之插花地得采(用)属人办法。

第十八条 凡财产在本区域内,而人口全在外区域者,采(用)属地办法,按一户一人论不除免征地,其人口返乡后,即算其返乡人口,并除基本地。

第十九条 人在本区而财产在本区外者,采(用)属人办法,如有邻区政府证明,在当地已纳税者,得呈请县府,退除其在外区收入之负担。

第六章 计算方法

第二十条 将全家地亩及工商业收入等折合成标准亩后(其收获量比标准产量多或少者,得再以第六条办法折合),按第五章规定条件,扣去全家人口基本地,然后再以全家人口数除之,即得出每人平均地亩数,每人平均地

亩之零数地不足一分者不计。

第二十一条 例题及算式

(一)某户全家有六口人,有青壮年共地四十亩,其商业收入二千六百元(市价十元钱一斤谷,市斗每斗十三斤)问其全家负担地亩若干?

(二)题解:此四十亩地为已按市尺折成之标准亩(如未折合者须先折合标准亩)再将商业收入折地二亩,合并起来共标准地四十二亩,除去全家基本地六亩外,下余三十六亩,以全家人口除之,即得每人平均地数六亩,于是即知其为六级负担。

(三)算式

$$\begin{array}{r} \text{每人负担亩数} \\ \hline 1 \text{ 级 } \quad 2 \text{ 级 } \quad 3 \text{ 级 } \quad 4 \text{ 级 } \quad 5 \text{ 级 } \quad 6 \text{ 级} \\ \{1 + (1 \times 0.06 + 1) + (2 \times 0.06 + 1) + (3 \times 0.06 + 1) + (4 \times 0.06 + 1) + (5 \times 0.06 + 1)\} \text{全家人口} \times 6 = 6.9 \\ \times 6 = 41.4 \text{ 亩。即全家负担亩数,各级累进算法依此类推。} \end{array}$$

第二十二条 民户之财产收入,以自报为原则,经群众评议后,自报确实者可发奖状(县自制),匿报查出后,除追交应纳负担外,科应纳税额一倍至五倍之罚金。

第二十三条 兄弟分居,轮流供养父母者,父母列入其一家不得计其双人口,替己地得列入基本家合并计算。

第二十四条 地亩、财产、人口之更动,以每年调查评议时为标准,中途不得变更。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一日起施行,前颁之公平负担办法以及各专署自定之负担办法,应立即废止。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必须呈请行署修改之,任何专县不得擅自修改。

(十) 1947年9月广宗县民兵武器弹药统计表

项 目 \ 区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五区
全区 人数	男	12038	10760	6775	0	0
	女	12127	10804	7050	0	0
原有		570	651	402	0	0
现有	共 有	516	528	318	369	235
	党 员	189	284	129	162	91
	非党员	327	219	189	207	144
家庭 成分	赤 贫		3	1		
	贫 农	288	252	128	244	213
	中 农	226	267	189	125	22
	富 农	2				
	地 主		1			
本人 出身	工 人	59	61	33	14	6
	农 民	432	424	267	338	215
	商 人	6	11	3		7
	学 生		2	1		
	退伍兵	11	13	4	2	3
	伪 军	8	4	10	12	4
	伪人员				3	

续表

项 目	区	一区	二区	三区	四区	五区
		大 枪	116	98	49	53
武器 弹药	机 枪					
	盒子枪		3	3		
	短 枪	24	35	18	24	1
	冲锋枪	1				1
	掷弹筒			2		
	单打一	26	14	15	15	8
	手榴弹	175	50	11	31	19
	地 雷					

说明:(一)原有指五四指示前(即土地改革前之数);
 (二)短枪包括八音、底把、六轮、土造手七枪等;
 (三)一、二、三区之村庄也不全。

附录五 南下干部名表

1947年6月广宗县(部分)南下中原干部名表

姓 名	性别	籍 贯	南下前职务	南下后曾任职务
王润泽	男	定县	县武委会主任	河南省政府机关党委副书记
王朝柱	男	旧店	五区区委委员	河南信阳地委组织部副部长
王瑞杰	男	五屯	二区武装部长	湖北省化工局党委书记
孟长庚	男	洗马	县委干事	武汉市武昌区副区长
谢才卿	男	南宫县	二区副区长	河南省新蔡县税务局长
牛汗福	男	牛里庄	四区干部	湖北省丹江口水库党委书记

续表

姓 名	性别	籍 贯	南下前职务	南下后曾任职务
柏长青	男	砖窑	四区干部	南京市锅炉厂党委书记
李朝存	男	董里集	一区干部	安徽省霍邱县财经局长
牛保印	男	牛里庄	四区干部	河南省商城县委副书记
李宏申	男	牛里庄	四区干部	河南省商城县委组织部长
李西振	男	李家庄	一区干部	河南省固始县委副书记
贾培贤	男	东召	二区干部	河南洛阳
邢恒军	男	邢家庄	一区干部	河南省罗山县财委主任
程 成	男	金塔寨	二区武委会主任	安徽省霍邱县副县长
史好龙	男	不详	四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市公安局股长
牛明亮	男	洗马	四区干部	河南省罗山县银行工会主席
王现民	男	北塘疃	五区干部	南下后参军
张栖霞	男	董里	一区干部	南下后参军
毕芳国	男	毕家庄	一区干部	河南省金寨县区干部
贾文亮	男	件只	一区干部	河南省商城县区干部
祝西昌	男	魏村	二区干部	河南省商城县区干部
杨保金	男	旧店	五区干部	南下后参军
许印堂	男	王胡寨	三区干部	河南省商城县干部
李胜福	男	李磨	三区干部	安徽省金寨县干部
李海峰	男	李怀	三区干部	河南省霍邱县干部
赵保安	男	赵伏城	三区干部	河南省公安局长
董振海	男	北董里	一区干部	安徽省金寨县干部
吴品端	男	西宋	二区干部	唐河县委副书记

续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职务	南下后曾任职务
刘星堂	男	三杏村	三区干部	不详
宋丙海	男	宋村	二区干部	不详
王胜南	男	件只	二区干部	不详
李文远	男	北葛村	二区干部	不详
李民	男	东召	二区干部	不详
李洗马	男	洗马	四区干部	不详
王支书	男	件只	一区干部	不详
周陆民	男	琵琶张	五区干部	不详
周陆海	男	琵琶张	五区干部	不详
尹保五	男	牛里庄	四区干部	不详
王秀仁	男	旧店	五区干部	不详
张店奎	男	漳逮	五区干部	不详
孙连海	男	东董里	一区干部	不详
张金贵	男	油坊	五区干部	不详
李宏云	男	大柏社	四区干部	不详
郎守荣	男	曲周县	五区书记	不详
王玉莲	女	曲周县	五区书记	不详
李杨	男	城南	四区干部	不详

1947 年 9 月广宗县(部分)南下中原干部名表

姓 名	性别	籍 贯	南下前职务	南下后曾任职务
肖 英	男	三杏村	县委书记	北京市市政府副秘书长
王 林	男	三杏村	组织部长	河南省安阳地委副书记
常 青	男	核桃园	宣传部长	武汉市轻工局党委书记
薛中光	男	小辛庄	文教科长	山东济宁推土机厂党委书记
孙学文	男	吉兴古	干 部	河南开封市委副书记
李 星	男	东 召	公安股长	武汉市江汉区委书记
韩静德	男	西 宋	二区武委会主任	广西省公安厅处长
孙建三	男	东董里	一区干部	河南省驻马店地委宣传部长
刘西恩	男	北刘庄	县委干事	武汉钢铁公司纪委副书记
毕荆北	男	七斗店	一区副区长	河南安阳地委组织部长
路明振	男	东董里	一区干部	郑州市商业局食品公司党委书记
杨西璞	男	后清村	四区干部	唐河县委书记
霍彩霞	男	东董里	一区干部	河南省南阳地区物资局长
韩玉峰	男	件 只	五区干部	河南省开封市电机厂书记
张心年	男	董里集	一区干部	河南省开封市电机厂书记
夏振河	男	楼斗寨	公安干部	南阳地区电业局党委书记
刘贞吉	男	冶 村	二区干部	郑州市农机局处长
孙正善	男	北李庄	一区干部	河南省泌阳县商业局长
吴可忠	男	槐 窝	一区干部	河南省方城县委副书记
刘志刚	男	三杏村	一区干部	郑州市房管局所长
刘清勤	男	北刘庄	一区干部	湖北省宜昌市某学校副校长
马月英	女	陈湾头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商业局工会主席
韩建华	男	件 只	一区干部	武汉市化工局处长
尹玉光	女	威县元寺	三区干部	河南信阳地区供销社副主任
吴可建	男	槐 窝	二区干部	河南安阳市安置办主任
肖宝三	男	三杏村	公安干部	河南省南阳地区农科所长

续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职务	南下后曾任职务
张光先	男	李怀	三区干部	河南省确山县公安局副局长
郭玉英	男	宋村	二区干部	河南省潢川煤炭公司经理
范林中	男	城南	五区干部	河南驻马店地区农机局副局长
王朝臣	男	斥漳	五区干部	河南泌阳梅林区干部
卫丙军	男	小辛庄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梅林区干部
任保五	男	不详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梅林区干部
赵书田	男	巨鹿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梅林区干部
方金城	男	山东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梅林区干部
王宝申	男	李怀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春水区干部
卫丙五	男	小辛庄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春水区干部
贾先庚	男	东召	二区委员	河南泌阳牛蹄区区长
孙正西	男	北李庄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牛蹄区干部
李双印	男	南宫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王店区干部
李金领	男	李怀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王店区干部
李西申	男	牛里庄	四区干部	河南泌阳王店区干部
姚老用	男	葫芦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王店区干部
阎文	男	李怀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大店区干部
赵清河	男	大王村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大店区干部
刘松波	男	刘家庄	四区干部	河南泌阳大店区干部
赵五里	男	赵家吾	四区干部	河南泌阳大店区干部
杨仁	男	城内	四区干部	河南泌阳大店区干部
吕兆本	男	大柏社	四区干部	河南泌阳大店区干部
张寿奎	男	孔家庄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大店区干部
乔书义	男	乔柏社	四区干部	河南泌阳大店区干部
王洛子	男	王湾头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大店区干部

续表

姓 名	性别	籍 贯	南下前职务	南下后曾任职务
卫小苗	男	卫家庄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大店区干部
赵明勋	男	赵伏城	三区干部	河南省平玉县委书记
梁化平	男	贺 固	二区区委书记	河南洛阳地委副书记
刘庆超	女	贺 固	县委干事	河南洛阳供销社副主任
贾秋生	男	件 只	二区委员	郑州市第五棉纺厂党委书记
张占奎	男	王常相	三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地区供销社主任
马玉生	男	件 只	二区干部	河南潢川人武部长
郭化民	男	件 只	二区干部	河南省驻马店党校副校长
吕思江	男	件 只	二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吕兆彩	男	大柏社	四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宋振华	男	宋 村	二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张孟乐	男	小柏社	四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段玉林	男	五 屯	二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王春盈	男	郭 庄	二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南书贵	男	东 召	二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赵新蕊	男	件 只	二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杨风举	男	后清村	四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鲍书林	男	西石井	五区干部	青海省劳改局干部
卫革新	男	东董里	一区干部	河南信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王晓光	男	件 只	二区干部	河南信阳公安局副局长
武振庄	男	件 只	二区干部	河南桐柏县商业局副局长
韩景顺	男	金塔寨	二区干部	河南潢川县商业局副局长
李 谦	男	荣尹村	三区区长	河南泌阳县马古田区委书记
栗文明	男	槐 窝	三区武委会主任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区长
贾长恩	男	巨鹿县 河头村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干部

续表

姓 名	性别	籍 贯	南下前职务	南下后曾任职务
吴元忠	男	槐 窝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干部
郭振跃	男	南 街	四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干部
葛金玉	男	赵葫芦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干部
吕朝华	男	北葛村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干部
王长华	男	板 台	二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干部
李小三	男	北葛村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干部
韩清河	男	西 宋	二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干部
毕立存	男	柏 城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干部
姚梅玉	男	北葛村	二区委员	河南泌阳县马古田区委副书记
赵三梅	男	前枣科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马古田区委副书记
李占文	男	前清村	四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马古田区委副书记
张鸿毫	男	燕红龙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马古田区委副书记
王再河	男	赵家寨	五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马古田区委副书记
高翠春	男	高家庄	五区通讯员	河南省泌阳县马古田区干部
赵正中	男	庄 头	二区干部	河南省泌阳县马古田区干部
侯某某	男	不 详	五区干部	河南省泌阳县马古田区干部
张洛芝	男	司马庄	一区干部	河南省泌阳县梅林区干部
周治中	男	宋 村	二区干部	河南省泌阳县梅林区干部
李口庆	男	北李庄	一区干部	河南省泌阳县梅林区干部
张西林	男	董里集	一区干部	河南省泌阳县梅林区干部
刘立坤	男	三杏村	一区干部	河南省泌阳县梅林区干部
李洛根	男	北李庄	一区干部	河南省泌阳县梅林区干部
马庆林	男	威县马庄	三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刘清思	男	件 只	二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徐志刚	男	不 详	三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续表

姓 名	性别	籍 贯	南下前职务	南下后曾任职务
杨朝文	男	李 怀	三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阎银全	男	件 只	二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王英全	男	李 怀	三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李德福	男	徐家庄	四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王风岐	男	件 只	二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刘永芳	男	冶 村	二区干部	河南省信阳县干部
董之云	男	董里集	二区通讯员	河南省信阳专区公安局侦察员
高洛印	男	小刘湾头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区干部
刘西堂	男	北刘庄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干部
张兴琐	男	北刘庄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牛蹄区干部
徐泽世	男	不 详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春水区干部
王润生	男	杨家庄	一区委员	河南泌阳县区委书记
李振书	男	三杏村	一区通讯员	泌阳县委通讯员
卫朝文	男	董里集	通讯员	河南泌阳县委通讯员
荣祥瑞	男	荣尹村	通讯员	河南泌阳县委通讯员
荣旺德	男	李 磨	通讯员	河南泌阳县委通讯员
陈超连	男	北董里	通讯员	河南泌阳县委通讯员
薛文奎	男	小辛庄	通讯员	河南泌阳县委通讯员
李际申	男	李家庄	通讯员	河南泌阳县干部
侯玉选	男	侯 寨	五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王店区干部
李希深	男	不 详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王店区干部
周旺镜	男	王湾头	二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王店区干部
周俊江	男	红 庙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王店区干部
张心海	男	城 内	四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王店区干部
李镜海	男	徐家庄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马古田区干部

续表

姓名	性别	籍贯	南下前职务	南下后曾任职务
段玉林	男	大王村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马古田区干部
贺光华	男	贺南苏	四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马古田区干部
周必岩	男	王湾头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梅林区干部
卫含辉	男	小辛庄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梅林区区长
王丙瑞	男	小辛庄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梅林区干部
程书田	男	北刘庄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梅林区干部
刘志风	男	北刘庄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梅林区干部
荣恩波	男	荣尹村	二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大店区干部
赵合义	男	荣尹村	二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牛蹄区委书记
孙立芳	男	东董里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牛蹄区干部
杨山根	男	东董里	一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牛蹄区干部
王怀银	男	李怀	三区干部	河南泌阳县春水区干部
李国江	男	北葛村	五区区长	河南泌阳县春水区干部
李华一	男	南苏	四区干部	马鞍山钢铁公司经理
苏建革	男	不详	三区武委会主任	西安园林局副局长
韩章	男	杨家庄	县武委会主任	信桐县委副书记
郭亚光	男	件只	二区干部	郑州社科院秘书长

从外地南下的(部分)广宗籍干部

姓 名	性别	籍 贯	南下前工作部门及职务	南下时间	到达地区
乔晓光	男	乔柏社	中共冀南区委副书记	1949.2	湖南常德
王祝光	男	北杨庄	县委书记	1949.8	湖南常德
王振江	男	东董里	《冀鲁豫日报》社 办公室主任	1949.3	江 西
肖一舟	男	三杏村	冀南四专署专员	1947	桐柏地委书记
王含馥	男	董里集	冀南行署民政处长	1949	湖南常德专署专员
袁 勃	男	刁家营	《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1950	昆 明
李良田	男	董里集	中共平乡县委书记	1947.9	桐柏山区
张清文	男	柏 城	平乡县干部	1947.9	桐柏山区
李珍之	男	广宗县	平乡县政府民政科科员	1947.9	桐柏山区
吴可善	男	广宗县	平乡县干部	1947.9	桐柏山区
李清云	男	广宗县	平乡县干部	1947.9	桐柏山区
史青来	男	广宗县	平乡县民兵队长	1947.9	桐柏山区
褚保录	男	小柏社	平乡县公安局干部	1947.9	桐柏山区
郭林振	男	广宗县	平乡县干部	1947.9	桐柏山区
璩福珍	男	董里集	平乡县干部	1947.9	桐柏山区
景广卿	男	东 召	平乡县四区干部	1947.9	桐柏山区
侯金城	男	砖 窑	八路军冀中军区	1947	大别山

后 记

本书的编纂工作是在中共广宗县历史编纂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编纂完成的。具体工作由县委党史办公室主任吕宗庄主持,特邀县志主编谷华池执笔。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领导刘立生、李振军、张志英、李群锁、赫青栋、陈国平、刘丽香、赵凤山的热情关怀和悉心指导。广宗籍正部级离休干部肖英,中共邢台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立海、副主任王银翠,邢台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张西服,党史专家南振国,著名学者杨凤奎等不吝赐教。此前县委党史办先后组织人员南下北上,征集到一大批曾经在广宗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干部、老战士的回忆录及早期党组织活动资料,充实了党史编辑内容。原党史办领导李志勋、刘兴会、史书栋、周连方、董秀珍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县政协文史科长王连卿、旧店校区教师周振河、《广宗晚报》编辑吕兵等提供了一些重要资料。高永丽、张国清、李辉、刘贵雪、李文亚、肖春等参与了编写和文字录入,加快了编纂进度。陈玉峰参与了本书的校对,贺相佳、乔继威、梁智晓、张科妍等给予技术

支持,提高了本书的质量,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革命斗争原始资料遗失较多,大多凭记忆而来,加之编写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赐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编 者

责任编辑：王颖
美术编辑：于艳红
责任校对：余尚敏

ISBN 978-7-202-06036-0



定价：40.00 元